

2011.4

甘肃史志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甘肃省向国家方志馆捐赠志鉴



10月11日至14日，中国国家方志馆接受赠书仪式暨修志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全国13个省（市、区）的修志同仁齐聚北京，共同向国家方志馆捐赠志鉴，为国家方志馆的建成贡献各自的力量。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田嘉、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李富强，会议由

中指组办公室副主任刘玉宏主持。田嘉代表中指组接受捐赠，向参加捐赠的各省（市、区）及个人颁发捐赠证书并作了讲话。各省就志书出版和征集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金庆礼代表甘肃省参加此次捐赠活动。此次甘肃省共捐赠首轮省志61卷118册，二轮省志3卷4册，首轮市（州、地区）志8部42卷66册，二轮市（州、地区）志2部4册，首轮县（市、区）志69部141册，二轮县（市、区）志12部23册，省内三级年鉴66部72册，地情资料和其他资料89部132册，共计344卷560册。

闲话“信仰”

钱 旭

清朝时来华访问的英国使者马尔葛尼评价中国人说过，这个国家没有信仰，如果有，那就是做官。后来，一些有理想、有信仰的中国人立志变革，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也甩掉了“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帽子。

不知从何时起，信仰问题又一次成了热门话题，“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字眼每见诸媒体，很多人为之担忧、为之呼吁。本人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只有一些粗浅的理解，不妨说说。

从定义来看，所谓信仰，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某人或某物的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换句话说，信仰是人们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从功能来看，信仰是一种精神纽带，是一个组织或阶层，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精神动力，具有生活价值的定向功能，社会秩序的控制功能，社会力量的凝聚功能，行为选择的动力功能，等等。从信仰和道德的关系来看，信仰是人们对于世界及人生的总看法和总方针，而道德则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为。信仰是一种意识，道德是这种意识的表现和反映。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再把信仰两个字分开来看：信指认可、认同、信服、依赖；仰指仰望、仰慕、崇拜、敬畏。可见，信仰是建

立在“信”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信，信仰就无从谈起。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信仰危机”的原因了。当下，要解决信仰危机的问题，必须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要解决好“谁信”的问题。经常听到有人说：你讲的这一套，谁信？你都不信，还让我信？鬼才信！而要让人信，所讲的事情必须是真实的、可信的，虚虚假假的东西，自然没有人信；讲道理的人必须对自己所讲的东西真心信奉，并且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别人才能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万万不行的。你所讲不真，所行不效，别人会以为你在欺骗人、愚弄人，会心生疑虑，产生反感甚至敌对情绪。试想，一个贪图享乐、私欲膨胀的人，给别人讲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道理，谁信？

二是要解决好“信谁”的问题。还有人说，今天讲一套，明天讲一套，这个讲一套，那个讲一套，该信谁？谁都不可信了。所以，不要只在名词上追求华丽，标新立异，而最关键的是要把最基本的道理讲明白，把最基本的东西坚持下去，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让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反之，今天一个新名词，明天一个新提法，今天提出价值体系，明天提出道德框架，让人眼花缭乱，记都记不住，何谈相信和遵从？

我的观点是，先解决“信”的问题，再解决“信仰”问题。信了，信仰自然就有了。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1年第4期
(总第8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9133 号

卷首语

闲话信仰 钱旭(1)

工作论坛

充分发挥地方志

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金庆礼(4)

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车安宁(7)

坚持依法修志 科学编纂年鉴

切实增强地方志工作服务发展的能力

..... 蒋晓强(9)

政策法规

金昌市地方志工作条例 (11)

续志研究

浅谈城市区志资料征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徐玉英(15)

浅谈城市区志的创新与科学发展 陈启刚(19)

处理好历史争议人物 增强新方志的看点

..... 魏柏树(23)

经验交流

修志行文随笔(续) 张志纯(25)

篇目选登

古浪县志篇目 (28)

旧志整理

平凉历代府志简介 (33)

明嘉靖《秦安志》简介 (35)

史地考证

徽县城故址河池县城位置考 曹鹏雁(36)

录

- 解读肩水金关汉简 桂 霞 王 兰(38)
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辨识及碑文辨析
..... 焦红原(41)
中国航天第一港——东风航天城 王 兰(48)

史海钩沉

- 父亲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张凌青采访录 周学海(49)
论甘肃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 李荣珍(54)
辛亥革命在甘肃最壮丽的一幕——秦州起义 (55)
一野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记事
..... 荷 重(57)

历史回眸

- 甘肃民国大事记(1931—1934年) (60)

陇原人物

- 方志学家傅学礼生平考述 杜志强(67)
甘肃辛亥革命领袖——慕寿祺 (71)

工作纪实

- 甘肃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就业援助保障工作纪实
..... 赵淑琳(73)

乡土民情

- 金塔方言浅释 桂发荣(77)

简 讯

-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中心组
认真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14)
白银市方志馆被正式列入“三馆一中心”规划 (47)
“崇信史志网”开通 (56)
兰州市地方志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台 (79)



《甘肃史志》编委会

- 主 任:金庆礼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 主 编:金庆礼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期责编:陈 谦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51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子邮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充分发挥地方志在文化事业 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金庆礼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一次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研究部署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了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全面记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具有“文化之源”、“文化之矿”的地位和作用。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我省文化大省建设进程中,地方志的作用应当得到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

一、充分发挥地方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对接中的桥梁作用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源远流长的史志文献堪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我国现存方志 8500 余种,10 万卷以上,约占古籍总数的十分之一。甘肃历史上共编修各类志书 320 多部,存世 238 部。上世纪 80 年代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共编纂省志 1 部 71 卷,地区和市州志 9

部 78 卷册,县市区志 83 部,总计 232 部卷,总字数达四亿多字。二轮修志自 2004 年启动以来,已终审出版省志 4 卷,市州志 4 部,县市区志 27 部。与此同时,各地各单位还编辑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各种专业志、部门志、厂矿企事业单位志、乡镇志、江河山川志以及大量的地方和行业部门年鉴。这些史志文献的出版发行,极大地丰富了甘肃历史文献的规模和藏量,为各地研究地情、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信,同样也在推动我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充分发挥地方志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教化作用

地方志不仅记述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而且还记述包括文化活动、社会风俗、优良传统、名士英模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这些记述印记着时代的脚步,记录了时代的年轮。特别是近年来编纂出版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承载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艰苦创业的历史、曲折前进的历史,诠释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最好教材。通过了解各地的自然禀赋、风土人情,可以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通过了解各地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和英模事迹,可以加深人们对于“人一我十、人十我百”的“甘肃精神”和“爱国、守法、诚信、敬业”的“陇人品格”有更为深

刻的认识认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完善的进程中,地方志“正纲常,笃伦理,善教化,厚风俗”的功能也一定会得到最大的发挥和释放。

三、充分发挥地方志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素材的功能和作用

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繁荣文化创作。历代史志都用不少篇幅记述当地的文化、社会、民族、宗教、民风习俗等人文资料,包括不同的社会风俗、文艺作品、民间传说、奇闻轶事、司法案例、人物传记等等。而这些内容向来都是文艺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发展文化产业,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挖掘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这些年来先后推出的陇剧《西狭长歌》、剧本《天山雪传奇》、电影《月圆凉州》等一批优秀剧目就是立足甘肃真实的历史创作的。近年来各地筹建的创意文化产业园、农耕和民俗文化产业园、民族文化产业园和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也是立足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来展开的。同时,加大对伏羲文化、秦文化、三国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长城文化、民族文化深刻内涵的整理挖掘,也是我们要建设文化大省必须要做的功课。而历代数以千计的各类地方志书也就成为了最基础、最重要的挖掘载体。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地方志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素材的功效和作用,也会得到不断的增强和提升。

四、充分发挥地方志提供公众文化产品的作用

随着地方志工作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展,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认真做好修志编鉴中心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地方志部门的人力优势,以志书及志书编修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地情资料为基础,积极组织编纂了如《天水菜肴》、《天水民居》、《天水古树》、《张掖概览》、《武威通史》、《永靖雉文化》、《平凉名人书画集》、《白银古代史略》、《庆阳历史文化丛书》、《山水陇南》丛书等一大批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情文化丛书,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不仅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为了跟上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的步伐,近几年来各地也建立了一些地方志网站,如

天水方志网、武威史志网、古浪、正宁、崇信史志网等,一方面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实现地方志书的数字化、网络化,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挖掘各地历史文化内涵,设立了一些如地情地貌、资源环境、名胜古迹、文化遗产、乡土民风、名人轶事等栏目,充分展示各地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概况,这些地情网站建立后,点击率很高,访问量很大,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产品只要符合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它就有了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反映出地方志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大对地方志工作的条件建设和支持力度。目前,国家方志馆已建成,有一半以上的省市区和一部分市州、县也建立了方志馆,为公众读志用志搭建了很好的平台。随着各类史志成果的不断出版发行和承载平台的不断完善,地方志工作部门为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各类精神文化产品的功能和作用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体现和认可。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策,为地方志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要贯彻好、落实好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推进我省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地方志工作部门自身积极努力之外,还需要各方面进一步的关心和支持。

一是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支持力度。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2009年《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颁布施行。这两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地方志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为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其放在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切实做到“一纳入、五到位”,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为地方志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是通过筹建甘肃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充分展示甘肃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区域人文资源。甘肃历史悠久,地域特色突出、文化底蕴深厚,古籍典藏众多,但是甘肃留给许多人的印象除了敦煌莫高窟、黄河水车这些知名景点外,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土孤山、经济文化滞后等等这样的悲凉贫瘠印象。为了使省内外能更全面,系统地了解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包罗万象的地域特征、纷繁多样的乡土民情等等这些甘肃亮点特点,很有必要在省会兰州建立一个全省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它要有别于博物馆、图书馆这些文化场馆,其主要功能定位为展现甘肃悠久厚重的历史变迁、点多面广的秀丽风光、纷繁多样的民俗风情、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规模庞大的文化典藏等等,采取沙盘、挂图、实物、模型、雕塑等形式,利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分门别类地展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地理、气候、物产等情况。作为甘肃历史和现状全貌的一个窗口,以综合的、集中的形式更好地宣传和推介甘肃,让更多的人认识甘肃、了解甘肃。

三是通过有计划的整理校点历代甘肃古书旧志,进一步挖掘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我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古籍文献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列入文化建设重要内容。地方志书是古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努力,我省现存的230多部旧志中,已整理、重印90多部,还有140多部尚待整理。除地方志书外,我省还存在大量的甲骨拓本、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碑刻书画、族谱家谱等古籍文献,这些古籍整理出版,推陈出新,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建议对全省一些实用价值高、影响范围广的古书旧志通过财政立项、课题承包的方式,有计划的点校整理,进一步挖掘甘肃历史文化底蕴。

四是通过加强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高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市场,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没有旅游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活力。近年来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

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模式,到处涌动的旅游热潮甚至成为一道别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但相比较于目前的旅游市场和甘肃众多的旅游景点而言,旅游中体现的文化内涵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表现在景点雷同或以假充真、求洋求新,景点原有的文化内涵发掘不够等等。而被称之为“地方百科全书”的地方志的记述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它既具备旅游产业所不可或缺的对象素材,又具有旅游学科自身难以深入把握的边缘素材。开发地方志旅游资源,挖掘其中社会文化的古韵土味,以内在的文化肌理来吸引人、感染人可成为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前些年针对嘉峪关旅游曾有“听来听取,不过是两只燕子一块砖,中间是个土圈圈”这样的感叹。表达了对嘉峪关旅游文化底蕴不深的感叹。而近年来有嘉峪关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近百万字的《嘉峪关志》,则翔实记述了嘉峪关城楼的修建始末、历史沿革、作用价值、文物古迹、文化特色、历史传说、名人轶事等等大量的内容。如果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真正对接,将志书中的有关内容实景再现或者在文字、图片中充实其文化内涵,效果会迥然不同。如果更多的旅游景点都实现了这种对接,甘肃文化的影响力,旅游的魅力和活力就会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实现其真正的价值。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车安宁

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讨论颇为热烈,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是一种新的概念,目前各个国家的表述都不尽相同,但主要都是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特色旅游、专题展览、特色建筑、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是当今世界一个具有领先趋势和层次较高的产业集群,它不仅耗能低,消耗资源少,附加值高,并且还具有文化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的特点。因此,它不仅引领当今各类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且是一个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标志。据估计,目前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一些发达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将文化创意作为产业列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全国各大城市也都相继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使我国文化产业在近年获得高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后,文化创意领域的发展也得到了空前的鼓舞和高涨。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

到,中国现代的文化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而文化产业涵盖的内容十分庞杂,行业也相当的分散。中国目前无论是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上,还是产业发展的现实中,以及各级政府的宏观规划和指导方面,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本文基于个人看法,谈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当遵循的几点基本原则

1、应当有利于整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而不应顾此失彼,一说发展文化产业,就不顾国情,一拥而上,以其巨大的投入来换取低效益的发展,在这方面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

2、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满足和丰富群众健康的文化生活为先,有助于大众的道德教化和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这是前提,而绝非是单纯为了追求发展一个产业,或为了GDP的增长而发展之。

3、有利于整个社会智力的开发。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发展本身需要智力的支撑,需要创意,需要新的思维方式,需要多种新的理念、多种知识的融合与碰撞;二是有益于消费者的智力启迪。

4、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传承和改造、提升,并形成新的文化聚合力和影响力。

5、有利于原有生产力的利

用、改造、提升、整合与转型;有利于形成新的社会生产力,并影响和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

6、有利于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并与其他产业链交叉,从而扩大国民经济的产业门类和产业规模,进而扩大就业。

二、如何认识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和前景

1、所谓文化产业,古已有之,如:中国书法、画卷、古董收藏、民间剪纸、皮影、香包、茶道器具、诗词曲艺、戏剧、服装、刺绣、雕刻、工艺编制、艺术烹饪等等,都属于体现文化的智力劳动,且具备产业性质。如果说它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那么,中国成语“洛阳纸贵”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只是那个时候不叫文化产业而已,也没有这个概念。

2、现代概念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国较弱,尤以现代高科技和现代传媒为载体的文化产业形态,中国刚刚起步。其现代理念的品牌项目则更是不及发达国家。

3、中国发展现代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支撑,五千年的文明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学遗产,还有各类民间风俗、礼仪、传说、宗教、手工艺术等,还有多姿多彩的自然地理地貌,这些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

4、在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普遍有了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以说,前景广阔。

三、如何发展中国现代的文化创意产业

1、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但是,它与一般的传统制造业完全不同,所以绝对不能照搬,事实上,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允许照搬。因为目前世界各国都注意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显然简单的照搬或复制已经无法生存。因此,要务必体现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特色,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路子。

2、文化创意产业的覆盖面要大,外延要拓展,不应局限于现有的创意模式,要最大限度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和体现中国文化元素。不仅要发掘物质形态的文化,还更要注重发掘非物质形态的文化。

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在文化创意中,还应注重少数民族文化宝库的发掘和利用。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民族特色。

4、要善于找到文化发展项目与普通民众最大需求的结合点;要善于找到雅俗共赏,引导民众培育高雅情趣的制高点。

5、要善于找到中国项目与国际需求、合作的结合点。以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6、不能急于求成。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性,文化产业发展应当遵循自身的规律,从酝酿到规划,从基础到成熟,从策划到上市,从引导到监管,都应有一个正常的过程。

7、政府要做好宏观规划,建立相应的发展机制,做好引导鼓励的工作,切不可包办代替。

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注意和把握的几个方面

1、切忌低级、庸俗化,特别是不能为了追求商业化,把不健康的理念融合进文化创意产业中,如:宣扬暴力、色情、世俗、迷信、金钱至上等内容。

2、切忌把青少年作为这个产业消费群体的被开发的主体对象,使广大青少年成为一些项目的痴迷者,影响身心健康!

3、切忌照搬外国的概念、模式,乃至模仿情节、人物和动作,一定要有自己的创造、创新和创意。

4、切忌重复。这与“一条创意,多重使用”不一样,是指不能简单重复和重叠。比如,一部电视剧看好,就再重拍一次;一个工艺品好,就低级无限复制;假古董漫天飞等等。

5、切忌质量差。目前中国的一切产品和制作,可以说都打上了质量差的时代烙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忌讳不下功夫,粗制滥造,量大而没有生命力。

6、切忌把一切消费品都打上“文化创意”的标签,借以大肆推销、贩卖简单商品。

7、切忌把各级政府拖进“文化创意”的圈套,乱花钱,乱搞“创意”。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坚持依法修志 科学编纂年鉴

切实增强地方志工作服务发展的能力

蒋晓强

“十二五”时期,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既要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也要为现实经济社会服务;既要满足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对历史参考借鉴的需要,也要满足各类投资者全面了解天水地情的需要;既要满足科学研究对史料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群众了解天水乡土风情文化的需要。面对需求的多元化,必须对传承历史、反映地情的志书、年鉴等重要载体不断创新,不断拓展地方志工作的领域和空间,多出成果,积极为现实服务。要紧跟时代步伐,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正确处理好编修地方志与编纂综合年鉴、大量收集资料与科学取舍资料、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积极整理和研究地方历史,为推动天水跨越式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一、坚持依法修志,扎实推进《条例》和《规定》的贯彻落实。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地方志机构的工作职责、社会各界对地方志工作的支持义务和地方志书质量的保证措施,对地方志工作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以法律条文予以规定,为开展地方志工作提供了最权威、最有力的依据。要广泛开展《条例》和《规定》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赢得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形成良好的修志工作氛围。要

对照《条例》和《规定》,认真查找当前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找准影响地方志发展的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真正把《条例》和《规定》落到实处。地方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不断加深理解,全面掌握有关规范性要求,不断提高修志工作水平。

二、突出主体工程,全力推进二轮修志工作取得新进展。

编纂志书是二轮修志的主体工程,要科学统筹安排,把志书编纂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全市二轮修志普遍进入撰稿阶段,大多数县区和单位组织领导得力,业务开展正常有序,总体进展良好。但要在2013年基本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难度相当大,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千方百计抢抓进度,突出重点,攻克难点,整体推进。要把完成市志上报稿作为修志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工作进度,克服困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好攻坚战、攻坚战,力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修志任务。志书的生命在于质量,要及时审查修改完善不合格的志稿,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保密关,力争所写的志稿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体例完备、特色鲜明,真正反映出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主要成绩和地方特色。地方志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地方志书编纂方案,推动二轮修

志工作任务的落实。

三、科学编纂年鉴,切实增强地方志服务现实的功能。

地方综合年鉴是反映各行各业年度发展情况的综合性大型地情信息库,是展示各级各部门年度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是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编辑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和基本任务,是一项常规性工作。年鉴信息量大,集资料、数据、知识于一体,编辑出版周期短,更贴近现实,具有服务发展的显著优势,必须高度重视年鉴编纂工作。要积极为编纂综合年鉴提供资料,凡是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要报送地方志部门存史入鉴。要建立健全机制,履行管理责任,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一年编纂一鉴,推动年鉴编纂和出版发行工作正常化、规范化,也为今后编纂地方志书积累资料,打好基础。在修志编鉴的同时,地方志部门要增强服务中心工作的意识,加快构筑志鉴开发利用平台,开发史志信息资源,打造数字方志,广泛开展读志、用志和宣传志书活动,让志书深入千家万户,真正让地方志成果为各级各部门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四、加强组织领导,为修志工作提供坚强保

障。

地方志书是“官书”,修志是政府行为。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切实将修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任务中,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要严格落实修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调整充实史志编委会和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修志工作,分管领导切实履行职责,把具体任务细化到人、责任到人,将各项编修任务落到实处。史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提供资料和稿件,发挥职能和专业作用,各负其责,把好关口,全力配合地方志部门做好总纂工作。财政部门要把修志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有关单位也要安排一定的经费,各承编单位要将懂业务、文字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修志队伍中去,做到“有钱修志、有人修志”。要加大对修志工作的督查和指导力度,采取随机抽查、季度检查、年度考核等方式,定期通报进展情况,确保二轮修志工作顺利进行。

(作者系中共天水市委常委、秘书长,天水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2011年3月14日,金昌市市长张令平签发第43号金昌市人民政府令:《金昌市地方志工作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第一条 为规范金昌市地方志的编纂、管理、开发和利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志工作适用本规定。地方志工作是以地方史志为中心而进行的组织管理、编纂整理、研究咨询、开发利用等活动。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志,包括以市、市辖县(区)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志书、专业志、地方综合年鉴(专业年鉴、月鉴等)及相关地情资料文献等。

地方综合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人文、经济、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市志可以编纂综合志,或由若干分志组成。县(区)志为综合志。

专业志是指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特定行业、部门、院校、企业、特定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地记载特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专业年鉴是指系统地记载特定行业、部门、院校、企业诸项事物发展面貌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月鉴是指按月载录特定行政区域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发生的大事、要事、热点、焦点、难点等情况的资料性文献。

地情资料文献是指系统地记述或载录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或人文等方面情

《金昌市地方志工作规定》

况的资料性文献。

第四条 市、县(区)地方综合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编纂任务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业务上受上一级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指导。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应做好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的准备。综合年鉴按年度编辑出版,其他专业志、专业年鉴、综合性地情文献的编纂间隔时限根据实际情况,由编纂机构自行确定。

第五条 地方志编纂工作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和社会各界协作、专家参与、众手成志的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市修志工作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单位要将地方志工作作为政务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编委会主任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第六条 市、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是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主管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 (一)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 (二)拟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规划,制定地方志书、年鉴、地情文献编纂方案及业务规范;
-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查地方志工作,培训地方史志工作队伍;
- (四)组织编纂、审查、验收地方志书、年鉴;
- (五)征集、保存、整理地方志文献、旧志和地情资料,开展地方史志学术研究、对外交流和地情宣传;
- (六)开发地方志资源,开展地情研究,积极开

拓社会用志途径,为现实服务;

(七)完成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以市、县(区)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分别由本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规划组织实施,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编纂。

除以市、县(区)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外,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可编纂出版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地方志书及地情类书籍,编纂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或者注册登记关系报地方志工作主管机构备案,地方志主管机构应当对其志书编纂活动进行业务指导。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修志机构与队伍的建设。编纂地方志是一项专业性、连续性较强的经常性工作,市、县(区)人民政府要设置常设的主管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各级修志机构应当加强修志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培养,建立一支德才兼备,专、兼职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的相对稳定的修志队伍。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乡镇应有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地方志的编纂任务。

第九条 地方志机构要结合当地实际,做好地方志参编人员的培训工作,通过外出进修学习、组织业务培训、召开研讨会、评稿会等方式,不断提高修志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办好地方志刊物,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第十条 各单位在修志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可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有修志专长的人员直接参与编纂工作。也要注意吸收熟悉当地或本行业情况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修志。

第十一条 各级修志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十二条 地方志工作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办公经费、业务经费(含培训费、资料费、编审费、出版费、稿费)。

第十三条 地方志机构或者承担地方志编纂任务的单位应参照国家版权局《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相关规定和各自实际,向提供地方志资料

和直接参与编纂地方志书的个人支付资料费、撰稿费、编辑费、审稿费。

第十四条 市、县(区)地方志机构可根据修志工作需要聘用临时性修志人员,费用纳入修志工作经费预算。

第十五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征集相关的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含中央及各省、市驻金单位)和个人有义务为其提供志书、年鉴、月鉴、地情文献等所需的各种资料。

第十六条 凡本辖区内承担市、县(区)地方志编纂任务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达到以下要求:

(一)明确具体承担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部门和人员,保障经费和工作条件。

(二)按照本行政区域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拟定的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按时完成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及其他综合性地情文献资料的报送和文稿的编纂任务。

(三)在业务上接受本级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对本系统、本行业、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地方史志工作进行组织、指导和协调。与其他系统、行业、部门、企业的地方史志工作开展合作和交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采取查阅、摘抄、复制、采访、调查、征集等方式及时征集、规范和保存包括纸介质、电子文本、音像制品、实物和口述资料在内的各种地方志资料,建立稳定长效的征集渠道和制度。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开放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为执行本单位地方志编纂任务或者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收集、整理的文字、图表、照片、音像、电子文本、实物等资料及形成的地方史志文稿,由所在单位进行管理,并依照相关规定集中归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其散失、损毁或者据为己有。

第十九条 鼓励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向地方志工作机构提供地方史志资料。

第二十条 志书出版必须严格遵守审稿程

序:即初审、复审、终审“三审”定稿制度。市志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初审,市政府复审,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通过后出版;县、(区)志由县、(区)志编纂委员会初审,县、(区)政府复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通过后出版。市属企事业单位志书及乡、镇志由县(区)地方志机构负责终审。

第二十一条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定,应当吸收有关保密、档案、统计、历史、法律、民族、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审稿。

第二十二条 坚持评稿制度。志稿送交审查前,承编单位要召开志书编委会成员、有关领导、专家和知情人士参加的志稿评议会,听取意见,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第二十三条 审查地方志书,除重点审查地方志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外,还应当审查是否符合下列业务标准:

(一)志书体例:正确运用志书体式体裁,符合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做到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分类准确、归属得当。

(二)资料内容:全面系统、取舍得当、准确翔实。纵不断主线,横不缺主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行业特色。

(三)行文规范:地方志运用语体文记述,表述准确、文笔流畅。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和数字的使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各级审查验收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志稿,要提出审稿意见,并指导修改或重修。终审机构应在审查验收结束后,出具志书正式出版发行的批复。

第二十五条 送审单位应按照审查验收单位的审验意见,对志稿进行认真修改,如有不同意见,应向审查验收单位陈述,共同协商,达成一致。

第二十六条 已通过验收的地方志书,未经原审验单位同意不得擅自修改。

第二十七条 各级地方志主管机构应加强对地方志书的印刷装帧质量的管理。按照国家新闻

出版署对公开出版物的标准要求,并遵守上级地方志机构提出的统一规范出版志书。实行对公开出版志书印刷装帧质量查验制度。志书在印刷装订前,须将样书提交志书审验单位查验,经查验合格后才能装订出厂。

第二十八条 志书编校、设计、印制均应符合国家《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内容依次排序为:扉页、版权页、插页、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编辑人员名单、审查验收单位及人员、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专篇、附录、索引、编后记。篇、章、节、目序号和表格使用要规范。应使用标准简化字。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志书装帧设计必须遵守《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全省第二轮志书统一装帧的通知》(甘志办发〔2007〕41号)要求。首次印数不低于1000册,应留存备用志书。

第三十条 各级地方志机构要积极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编辑出版年鉴和各类地情资料,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归档和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各级编纂单位要向市级地方志主管机构上报备案材料和志书。备案材料包括:各部门、各单位地方志编纂规划、工作计划与总结、统计材料等。在志书出版后3个月内要向市级地方志机构报送样书和样书电子文本:全市规划内出版的志书每种20册;各单位编纂的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村志、专志等10册;各级地方志机构编辑的年鉴、地情资料等10册。并向本级和上级方志馆、国家综合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无偿提供馆藏书。

第三十二条 地方志工作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将收藏陈列的地方志向社会开放。加强地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通过建设资料库、方志馆、地方志网站等方式,为社会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

第三十三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属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地方志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

合年鉴的,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查处。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拒不接受地方志工作任务,或虚报、瞒报资料,不接受地方志书审查验收单位提出的审稿意见,或在志稿审查验收合格后擅自修改志稿内容造成志书质量出现问题的单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地方志机构工作人员未将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地方志文稿依法归档,造成损毁,或

者将其据为己有、出让、出租、转借的,由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编纂地方志涉及军事内容的,还应当遵守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志编纂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乡镇志、村志及其他专业志、专业年鉴等地方志文献的编纂可参照本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规定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金昌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中心组 认真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10月26日下午,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办党组书记、主任金庆礼主持并讲话,副主任车安宁,党组成员、副主任钱旭,各处负责人参加了学习。会议学习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了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基本原则、政策措施和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金庆礼在发言中指出,十七届六中全会主题重大、内涵丰富。全会就新时期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重要部署、重要举措,对于深化文化体制创新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为包括地方志事业在内的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独有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地方志工作者肩负着重要使命。充分认识地方志“文脉之源”、“文化之矿”的地位和价值,有效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加快地方志文化事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为整个文化创造提供有力支持。

金庆礼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志工作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史志办和各级修志机构要精心组织、精心安排,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办党总支和各处室要制定学习计划,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认真学习全会公报和《决定》,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集聚共识。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加快推出更多更好史志成果结合起来,同建设文化大省战略任务结合起来,同更好地报务改革发展结合起来,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有效的举措推动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二是要突出重点内容。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属于公共文化事业范畴。要正确认识地方志工作的文化事业属性,深刻领会《决定》关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论述,准确把握地方志工作与整个文化战略全局中的关系,以更加高度的文化自觉、更加准确的社会定位融入文化改革发展。三是要紧密联系实际。要用全会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站在把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的高度,增强加快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当前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保证第二轮修志任务特别是年度任务的按期完成,抓好修志等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增强地方志工作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加快搭建读史用志平台,加强史志成果的宣传展示,增加方志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浅谈城市区志资料征集应注意的

几个问题

徐玉英

城市区志是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来城市志中的一种志体,是城市志的重要补充。要使城市区志编写更符合城市志的特点,发挥存史、资政、教化、为民的功能,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资料的全面收集、征集、搜集的问题。这是第一手最基础的工作,必须要集中精力,高度重视,多方协调,过细工作,才能达到全面、准确、真实、可用的目的。本文就秦州二城区志编写资料征集,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践和读志学习的体会谈一点看法,与各位同仁共商。

一、资料征集的形式

城市区志是一个城市的地情书,也是对一个城市一个时期全方位的资料汇编。资料是构成志书的材料、原料、基础。资料对志的重要性,正如砖、瓦、水泥、钢筋对于建筑物一样,没有资料,就无法进行编纂,就寸步难行,就无米下锅。因此,城市区志需要大量的、充实的、丰富的资料。其资料来源十分广泛,如图书、报刊、档案、广播电视、实物、口头传说等等,都是志书重要的资料来源。所有的资料按照已经存在的形式来区分,不外乎有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三大类。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资料,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和补充。

1.文字资料。文字资料数量特别大,内容特别

丰富,是编修志书的重要资料。文字资料的种类有档案、图书、报刊、杂志、私人著述、工商业资料及其它图书文字资料等。

2.口碑资料。又称活资料,是指存在于人们脑海中,流传于人们口头上的资料,能够为一些湮灭的史实提供重要的线索,历来为修志者高度重视,成为志书不可缺的重要材料。口碑资料有当事人回忆和民间歌谣、谚语等。

3.实物资料。指对实地、实物的考察、拍照、录像所得的资料,形象生动。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事件和事物的面貌、本质和特征,是历史的见证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实物资料有建筑、产品、用具、录音带、录像带、图片、地图等。

资料的形式不同,相应有不同的征集方法,但也要相互结合,不能分离。比如,在征集过程中把查阅档案资料与了解口碑资料结合起来。档案资料不能不查,但也不能只限于档案资料。据笔者了解,目前的档案资料很不完整,档案内容有许多空缺。档案中有的,许多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许多有价值、有深度的资料,档案中又没有。比如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许多情况,工人问题,农民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等,档案中没有或者极少。怎么办?根本的办法就是单独或与统计局等单位结合,搞社会调查,找当事人调查,查“活档案”,

搜集档案中没有而志书中又很需要的重要资料。只有广征博采、兼收并蓄,尽可能全面地征集各类相关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编纂出高质量的志书来。

二、资料征集的种类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既是整个地区发展的主导,又代表了该地区的总体形象。所以城市区志要全面反映出该城市的建置区划、区域环境、人文概况、建设成果、管理要素、经济指标、亮点特色等,就要从这些方面全面收集资料。按照城市区志编写规范,资料征集大概分为以下10类:

- ①地理类
- ②经济类
- ③政治类
- ④文化类
- ⑤人文类
- ⑥卫生类
- ⑦特色类
- ⑧社会类
- ⑨管理类
- ⑩其它类,如杂录、传说、风俗等。

这样划分,是便于资料的征集、梳理、汇总和管理。既能避免遗漏,又能广泛搜集。比如经济类资料的收集,就涉及到农牧业、工业、商贸业、流通业、金融业、电子通信、机械制造、化工、建筑建材、医药、食品饮料、农产品深加工等诸多行业。目前,由于城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所涉及到行业的企事业单位都改制成股份制,企业性质为国有、集体、私人控股;加之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对企业的经营进行约束干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处于磨合理顺的特殊阶段,从而短期内形成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联系沟通管道梗塞不畅,修志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很难得到企业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出现经济部类资料收集被动局面。如果遵循现有的修志模式依靠政府各职能部门供稿,经济部类资料肯定难以收集全面。如果仅仅依靠市、区工信局、商务局、计划局等职能部门所管理的一些企事业单位提供

的资料来反映该市、区经济发展轨迹,取得新成就和积累的经验,势必会造成以偏概全,以点概面,修出的志书对该市、区经济发展的反映只能是以管窥豹。所以,要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市、区经济变化发展的全貌,就要从经济结构的每个细胞入手,从每个经济细胞的生成、成长、发展的每个阶段全面征集资料。经济类资料的收集相比之下,还较为容易,文中所列其它类别的资料征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要全面系统地征集必定困难很多。但要写出一部真实、全面、实用的城市区志,资料征集就是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搜集资料,想方设法掌握第一手资料。

三、资料征集的方法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对市区修志工作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省市出台了相关法规或政府规章,市县区也大都制定了工作规章或实施办法,依法修志效果非常明显,资料征集工作有了极大的变化,突出的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 1.行政推动征集资料。依靠党委政府转发文件,强化资料征集。
- 2.社会公开征集资料。
- 3.专业调研征集资料。
- 4.调查走访征集资料。
- 5.聘请当事人提供资料。
- 6.其它手段征集资料。如定向有偿征集等。

这些征集手段都要全力展开运用,才能达到全面、真实收集资料的目的。按照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运行现状,资料征集仍然是依靠行政推动来展开,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资料征集的范围、质量、时限等都很不理想。但行政征集仍旧是可依赖的重要手段。在行政推动模式下,市区资料征集要注重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注重强化街道、社区资料征集

目前的现状,市区各政府职能部门与市区企事业单位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街道社区,通过街道社区向驻区企事业单位征集修志资料是市区修志工作征集资料很有成效的途径。特别是近几年有关修志资料征集工作,注重社区依靠社区的做法

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做法的优点是只要是现存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事业单位,通过街道社区都能征集到所需要的修志资料。比如2007年,秦州区二轮修志工作启动,截止2010年底,负责续志经济部类供稿工作的区工信局、商务局、计划局等单位4年来提供的资料不到其供稿任务的10%。主要是这些单位之前所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现在绝大部分破产倒闭,仅有少数破产改制成股份制企业,因此实际上管理的企业没有几个,徒有虚名,无法提供有用的修志资料也在情理之中。相反,在二轮修志工作中没有安排具体供稿任务的街道在二轮修志工作大会结束之后,由于工作需要,临时召集各街道相关负责人员对一些所需修志资料征集工作进行安排之后,各街道都能够完成资料征集工作任务,且所征集到的资料质量远远高于目前工信局、商务局、计划局等单位利用4年时间所收集到的资料,从效率、质量两方面相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方面主要是各单位对于修志工作认识态度过于现实,短期内难以创造经济效益,不理解,不支持。客观方面工信局、商务局、计划局等单位征集资料确实有困难,虽然之前工信局等部门管理很多区属集体、街道、乡镇企业,但档案等原始资料缺乏规范管理,资料损害丢失非常严重,往往重要的档案等资料伴随着企业的破产倒闭而消失。另外部分企业生命周期很短,很多乡镇企业3到5年就倒闭了,由于没有制定相关的档案等资料管理法规,企业一旦倒闭,档案资料就无从查找,街道集体企业也是如此。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水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家电销售企业天水光明家电公司,现在早已破产倒闭,这样的经济现象很多。因此,当前利用街道社区征集经济部类的修志资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另一方面通过街道社区征集到的修志资料在此之前能够系统、客观的反映秦州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和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当前在秦州区从事经济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事业单位大部分都是1985年之前成立的,经历了1985年以来政府主导的各种经济改革活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浪潮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秦州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中流砥柱;不管是从吸纳就业,还是利税贡献上讲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统计部门每年的统计口径常有所变化,很难系统的分析比较现存企业在秦州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但是从个别年份的一些经济数据还是能充分反映这一点的。1985年,天水市(包括秦城、北道区)所属企业488家工业总产值2.6亿元,驻秦城区部、省级企业21家(不包括天水地区所属企业)工业总产值2.2亿元,单从工业产值比较驻区部、省、地级企业是驻区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两倍;现在原天水市所属企业90%以上的被市场所淘汰,而驻区部省级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成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1995年,秦城区所属商业经济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亿元,市直商业经济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亿元,同样这些商业经济单位基本都存留下来,改制成股份制企业;秦城区所属工业经济实现产值1.58亿元,市直工业经济实现产值4.99亿元。2003年,秦城区国税收入179亿元,其中中央、省级企业国税税收为1.4582亿元,市直(含部省级)限额以上工业企业产值49.27亿元。2005年,统计部门实行区域统计,秦州区国税收入2.14亿元,中央、省级企业完成国税1.74亿元,占8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37.4亿元,部省市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22.3亿元,占60%。2006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42.3亿元,部省市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2亿元,占53%。另一方面,从工业企业统计资料看,市直企业(含省、部级企业)从1985—2007年从未出现过破产倒闭的企业,少数是政策性破产之后进行兼并重组成股份制企业,其余大部分改制成股份制企业。因此,集中对这些企业进行记述既能反映秦州区经济发展的主流,也能清晰的反映秦州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能够突出改革发展这条历史主线。通过这条主线可以全面系统的体现秦州区经济在30年的改革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经验教训,为今后发展社会经济提供参考,从而发挥志书资政的功能。

二是注重强化乡镇资料征集

众所周知,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秦州区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社会经济取得瞩目成绩,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所以志书在记述好“一个中心”的同时,更要体现经济建设这个“因”产生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这个“果”。秦州区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且集中了大量的耕地等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1986年,秦城区有农业人口 359306 人,城市 137818 人,人口比例为 2.6:1。一直到 2001 年,农村人口始终超过三分之二;当年农业人口 425959 人,城市人口 202841 人,人口比例 2.1:1。至 2002 年,由于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秦城区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年农业人口 291019 人,城市人口 341681 人,人口比例为 1.17:1。至 2006 年,城乡人口比例持平。显然在二轮修志的时限内全区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农村,要体现人民生活水平变化必须对农村经济加以重点记述。全市首轮修志虽然对农村经济有所反映,但是由于供稿单位是市、县(区)农业、林业、畜牧等部门,主要对种植业、养殖业、果品业、乡镇企业等农业经济进行记述,但实际上自 1985 年天水市实行市管县体制以来,农村主要的经济支柱是劳务输出,俗称搞副业、打工。长期以来政府导向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果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产业化经济,并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进行扶持;反之对于劳务输出的扶持力度很小,直至最近几年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对劳务输出市场进行培育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区统计部门对农村劳务输出统计上的空白,时至今日对于农村劳务输出很难有一个精确、权威的统计数据。据统计、农业部门的相关资料,2010 年秦州区农业总产值为 12 亿元,其中全年输转劳动力 10 万人(次),劳务收入达到 9 亿元,占 75%。其实从 1985 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成为秦城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当时每个村由生产队组织了建筑队外出务工,其中平南、齐寿等乡镇的建筑队发展最为迅速,到 1989 年,这些乡镇每一个村就有两个以上的包工头。外出

务工农民工经济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包工头管吃住,每人月工资相当于 3 个教师的工资,而且教师工资不包含生活费;至 2010 年工资差距缩小,一个建筑民工的工资相当于 2 个教师的工资。同时城郊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像甘肃省明星乡镇企业,比如:秦城(藉口)暖气片厂的企业,但是这些乡镇企业对本村、本乡的经济贡献远远低于包工头所组织的建筑队。1990 年,秦城暖气片厂产值 256 万元,而平南包工头李吉胜带领的秦城区第二建筑公司产值达到 4160 万元;一般一个在上海从事建筑行业的包工头一年的纯收入就达到 100 万元,农民工月工资也达到 700 元以上。因此要反映农村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变化的过程,必须对劳务输出等社会现象和民工、包工头等群体进行重点记述。

尽管这些年来区档案部门开展过几次大规模的农村建档工作,然而各乡、村归档立卷的档案资料能够具体反映农村劳务输出、群众生活的却寥寥无几,几乎空白。在征集这方面资料时,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对农村经济和农村群众生活发展变化进行全面调研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较为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调查表下发各乡镇,由各乡镇填报汇总。在调查资料的制定上也可以参考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特别要植入能够直观的反映群众生活变化的调查表格等资料。

城市区志志书资料征集的确是志书编修中非常棘手但又非做好不可的工作,各地都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可以借鉴。笔者上述的资料征集的形式、分类和方法,只是资料征集中操作性较强的常规之举。依笔者实践看,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特别重要的关键要素是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需要城市区志工作者主动出击,强化宣传,多做各级领导的工作,不厌其烦,取得支持。切实把资料征集的基础性工作提上日程,安排人力、物力、财力,按要求提供全面的、真实的、可用的资料。再加上其它方法渠道搜集资料,就能够为城市区志编修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秦州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浅谈城市区志的创新与科学发展

陈启刚

城市区志,是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中日渐发展形成的一种新的志体类型,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特的现行行政区划为叙述范围,独立反映城市的某一区域的历史发展状况和现实状况及特点,不仅可以独立成志全面记载现行区级行政区划的历史发展状况,而且还可以弥补现行区级行政区划因不同原因在城市志中未能涵盖或涵盖不全的缺漏。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以来,全国很多省会城市(含直辖市)以及一些经济及文化等发达的地级城市的地方人民政府,都将本城市所辖的各区区志编修纳入修志工作计划,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各地编修出版的城市区志,已经成为展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就的重要载体,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充分发挥出了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随着全国大量城市区志的编纂出版,城市区志在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也日益凸现。

进入21世纪后,全国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已全面展开,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区志,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城市行政区划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将其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纳入城市及城市行政区划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也高度重视对城市区志编修工作的业务指导,使城市区志编修工作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时期。

白银市境内地方志的编纂始于明朝,盛于清

代,共编修县志10种。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始于1981年,而白银市的主体工作始于1991年,首轮志书结束于2002年末,二轮修志始于2005年,截至目前,全市已编辑出版综合性志书9部(其中市志2部、县志5部、区志2部)、各类部门志和专业志书20余种,总字数在2500万以上,蔚为大观,已成为全市一种主体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白银市开展首轮修志工作时,作为工矿区的平川区被纳入全省地方志编修方案和规划,《平川区志》1990年始修,2000年出版发行,全书52万字。但没有将白银市行政驻所白银区纳入全省地方志编修方案和规划,主要是考虑《白银区志》和《白银市志》有过多交叉和重复,为了使全市修志形成一个整体,经协商后决定增修《白银区志》,1994年始修,2002年出版发行,全书85万字。全市二轮修志开始至今,《白银区志》(1997—2008)已经通过评审,《平川区志》(1996—2005)正在组织评审,有望于年内出版发行。

城市区志在编纂中遇到很多困难和困惑,譬如对市级机构如何处理,如何续承前志,如何突出特色,如何避免大政治大经济格局,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如何真正录入有历史价值的信息等等。这就要求,城市区志的编纂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用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准确地记述城市区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从而实现城市区志编纂工作在形式、内容及方法上的发展和创新,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困难。

一、城市区志的编纂工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的原则,紧扣时代主旋律,突出地方特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自然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区志创新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所谓的发展观,就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对社会发展一般进程的理性认识,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科学的发展观,则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解决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基本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素是发展,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其着眼点是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要影响。城市区志记载了城市区从生态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各方面的情况,对城市的优劣势进行了综合概括,是社会各界了解城市区情的百科全书,是以政府官方的名义总结一定时限内施政方略、政绩和业绩,它收录的信息资料是由政府各有关部门经过严格的筛选所提供的,详实可靠,具有代表性,并且都经过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审核,具有官方的权威性。而政府官方若要推行正确的施政方略与工作方向,就必须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为引导,才能有正确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我们编纂城市区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忠实地记载政府的施政举措,以及各方面、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譬如《平川区志》(1996-2005)就突出了作为工矿区的平川区在煤炭、电力、陶瓷三方面的明显优势,凸显了平川区今后的发展方向。《白银区志》(1997-2008)突出了白银区作为白银市行政驻所、作为全市中心的地位,重点突出了面对资源枯竭,全区人民锐意进取、改革的举措,尤其是在城市基础建设、招商引资、产业承接和转移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全面转型、跨越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城市区志创新要体现时代特点。

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和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城市区是改革开放最活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区域经济学研究表明,城市区对周边地域具有重要辐射作用,城市区经济的繁荣能够带动临近地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相应带来文化的繁荣。2009年10月19日,甘肃省委十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和“五个大幅度提升”的奋斗目标,其中“中心带动”,就是支持兰州率先发展,建设兰州—白银都市经济圈,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这一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是甘肃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也凸显了白银作为西部新型工业重镇、产业转移承接基地、中部重要生态屏障和全省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因此,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为城市区志的主旋律,全面、客观、翔实、准确地记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城市区志的主要任务。要在总体设计上突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既要展示取得的成绩、推介成功的经验,也要全面记述改革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和不足,既要坚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要着重记述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是如何纠正和克服失误与不足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现阶段城市区志的编纂,要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为城市区志记述的主线,并将这一主线贯彻全书的始终。具体来说,要在谋篇布局上突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要用较大篇幅精心设计经济部类,再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各行各业的改革一一列出。要在排列顺序上突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要在篇、章、节排列上,尽量将记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内容排在其它章节之前。要对正文中不好编辑的有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散在“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处加以重点记述。

(三)城市区志创新要突出地方特色。

所谓地方特色,就是指此地由于自然与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区别于彼地相对稳定性的个性特点。城市区志只有各具特色,才能从共

性中寻求个性,才能把一地的精华提炼出来,进而揭示蕴含事物发展的规律。否则,就会陷入“千书一面”、“千篇一律”的泥潭。城市区志有“规”可循,有“矩”可蹈,但要勇于创新,敢于破格,才能突出地方特色。运用篇目升格前移法,突出记述地方特色。如白银区濒临黄河,自然条件优越,是甘肃省重要的反季节蔬菜和果品种植基地。因此,鉴于它的影响和地位,可将反季节蔬菜和果品种植从传统的大农业中分割出来,独立设置专篇。运用优势劣势分述法,如实记述地方特色。优势和劣势同属于地方特色。抓住本地的“资源优势”、“产品优势”、“交通优势”等等,求特不求全,就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特色。写劣势是为了正确认识劣势、改造劣势,变劣势为优势。在论述优势的同时又写劣势,可以提高城市区志的“资政”价值,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为全面认识地情、改变自然环境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敲响警钟,以便执政者与后人借鉴、改进。譬如白银地区在气候方面光照足、昼夜温差大、蒸发量大等特点,正好可以为旱作农业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有力条件。运用集中分散并叙法,准确记述地方特色。该综则综,该分则分,如对当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可作集中记述,对涉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可采用分散记述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反映地方特色。运用形象直观表现法,生动记述地方特色。如大量科学简明准确地使用地图、图表、图画(书法、篆刻、绘画作品等)和照片来反映本地自然生态资源优势、现代文明建设成果、地方土特名优产品及现今名人轶事等。运用详写略记并用法,翔实记述地方特色。对富有地方特色的项目可加大篇幅,不惜笔墨,详细记述。对存在的特殊事物,要用画龙点睛之笔进行重点描述。运用横向纵向比较法,充分记述地方特色。在实际表述中,可从实际出发,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结合,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比较,反映事物的深度和广度,展示本地的突出特点,求深不求细,使城市区志别具特色,各有千秋。

二、城市区志的编纂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区志记述内容要体现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体现党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理念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进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城市区志的发展创新,更是应该把为社会服务、为全体人民服务放在首位。城市区志要认真记述包括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择业、社会服务、社会教育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几乎所有内容。白银市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长期以来社会事业发展欠账较多,就业压力较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住房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白银区,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更大,更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城市区志的重点和亮点内容写实写好。

(二)城市区志记述内容要体现促进全面发展。

全面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目的。全面的发展观,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等必要条件。科学的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发展,并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全面兼顾构成的各个要素,正确处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市区志创新,

就是赋予了城市区志更多的服务功能。为政府提供服务,城市区志所发布的信息资料要详尽而完备,为政府决策提供详实的地情和科学依据,对政府宏观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经济建设服务,城市区志所发布的自然环境、经济信息等资料,要充分展示本地的经济状况,为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以及国际、国内各类商务服务提供准确的信息,体现城市区志在经济建设中架桥、铺路的特殊功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城市区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所发布的资料信息要贯穿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高尚的精神文明道德,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反腐倡廉、抵御邪恶、遵纪守法、表彰无私奉献的主线,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好乡土教材,为精神文明建设指引正确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城市区志要充分展示在资源方面,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且分布很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生态方面,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在环境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环境污染严重,“三废”问题十分突出的特点,展示一个城市区把改善生态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的成功举措和有益经验。

(三)城市区志记述内容要体现各项建设的协调发展。

保持各项建设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要统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协调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城市区志应汇集宏观的、综合的、高密度的、大容量的科学数据和信息资料,记载以政府行为和人民生活为主线,兼及社会各行各业的基本情况,其内容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本行政区的全貌。它储存的信息资料应具有辐射面宽、信息密集、覆盖范围广的属性,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需要编纂者加以进行甄别筛选,要使志书承载的信息能够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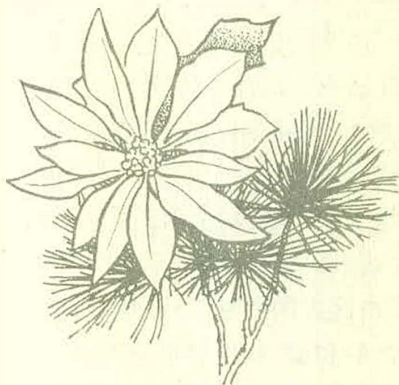
(四)城市区志记述内容要体现实现可持续发

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结论和基本要求。人类社会若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既要注重物资资源,包括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以及环境、能源等的可持续发展,更要注重人文资源,包括人才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知识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物质和人文资源的可持续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让一代接一代地都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享受可持续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城市区志要对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资源以及人类从事开发、利用、保护这两个资源的活动给予详细记载。“志”人与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演进过程,包括兴盛与衰落、发展与挫折、成就与困难,以“今天的实录,明天的镜子”,使人“闻而知之,知而明之”,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达到“志往鉴来、温故知新”的目的。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编修新方志至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意识形态深刻变化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人的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城市区志的编纂者也必然面对这些困惑,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能跳出窠臼,另辟蹊径,编纂出能够经得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城市区志。

(作者单位:白银市地方志办公室)



处理好历史争议人物 增强新方志的看点

魏柏树

翻开一部志书,人们往往最关注的是人物。人物推演着历史,历史选择了人物。社会是逐步推进的,历史人物总要受历史社会条件制约,在他们身上都有深深的历史烙印,他们服务于那个时代的政治体系,效忠于那个时代的政治上层建筑,有他自己的独特性。而志书是反映客观现实的,它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也不能违背当时社会规范的制约去记述。要写好一个人物,特别是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必须自觉地把握时代精神,辩证地、具体地分析,高瞻远瞩地统摄、驾驭材料,才能编纂出具有鲜明时代的方志。

在编纂《平凉地区志·人物》的过程中,有几个棘手人物,他们在全国来说,无足轻重,影响不深,可有可无,但在西北这个区域内却有一定的反响和震动。平凉的读者们掀开志书首先要看这些人是怎样写的?有些是党派问题,有些是民族问题。各有侧重,出发点不一样。它是一部志书的看点,就像一个刚烤熟的山芋既烫手又吸引人。读者通过这些记述来看一部志书的质量和可读性。写好了,就能为该志书提神,增加满意度,获得读者的赞誉;它更像是一个手艺人的绝活儿,精彩点不多,那么几下,足以看出他的精彩与否。面子活儿,代表性强,绝不可忽视,掉以轻心。

比如平凉有个回族人物穆生华,又名穆三,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第二代穆勒什德(导师、引领者)穆宪章之侄孙。早在清代平凉新民南路建有穆宪章拱北。时至今日,每年的忌日都有云南、宁夏西海固等地穆斯林前来祭拜,2011年专程祭礼者多达3.7万人,影响深远。穆生华早年学成后在秦安县莲花城杨家店子任开学阿訇,被尊称为“平凉穆三爷”。后任马化龙(哲赫忍耶学派第五辈教

主)在秦安、甘谷回民区的“热依斯”(教主之下管理一个区域教权的宗教职务)。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及固原、盐茶厅(海原)回民相继起义,穆生华随之参与其行动。

我们在写该人物时,把握了以下几点:

1.尊重历史,找准切入角度,实事求是,如实记述。对其所作所为,概述其过程,能省就省,该粗就粗。不在一些过激的细节上纠缠,抓住不放,浪费笔墨。交待事件全过程,不作评论、点评。如反映起义军在静宁扯弓塬与清军激战,隐去细节,只勾画概况:“腹背受敌,义军奋力突围,妇女也手执菜刀、剪刀相抗,宁死不作俘虏。跳崖落涧者数千人,所带家属生还者无几”。“此役双方伤亡甚重。”一些细节惨状一笔带过,不做描述。立场保持中正,笔法温和平淡,易于接受。我们体会这是记述敏感历史事实稳妥的做法。

2.参考其亲属所记“功德”材料,去其赞颂之词;又舍弃旧志书中“匪”、“逆”等诬蔑之语,使其符合历史史实,保持中庸。

3.为避免其事件引起回汉群众及信众情绪刺激,该记述的直抒其事,寓功过于实事之中。如:“同治元年十二月焚东关及太平、峪谷二桥”;双方“民众死者甚众”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无奈,是社会的悲剧。

对一些能激起强烈情绪的事实,隐其敏感之词语,使其保持中性。如:“二年八月十二日,平凉城陷,青藜与继室朱氏及子妇等皆赴井死。大书于壁曰:我与老妻死前院井,子妇及女死后园井”(引《平凉县志》);同治二年二月在静宁“屠掠城外未及逃避汉民殆尽”(引《平凉军事志》)等这些情节不予记载。

4.正面肯定其主流实质,增打“追光灯”,加强亮点,增强放大其复合多面性。如记穆生华起义后,“发出‘安民告示’,号召回汉百姓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互相仇杀。只杀‘灭回灭教’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民团头子。并约束义军不许烧杀抢劫、欺辱回汉百姓。”“树‘抗清复明’的旗帖,”“所发文书及安民告示均以明朝‘崇祯’纪年,不用清同治年号”等等。

记述另一个同治回民义军十八大营统领(后改为四大营)人物禹得彦时,除上述记述手段外,还有意把矛盾的对立面直指清廷腐败,勾结地方民团及汉族的一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对回民进行残杀迫害。征战过程中的打击对象引向围剿的清军,起义主旨定位“抗清”。但对其造成的破坏、损毁如实记述:“进占回中山后,烧毁王母宫正殿及香亭。”隐去在灵台“矫悍异常,墨抹黑脸,手持长矛,一个人驱赶数十个汉民百姓,斥跪则跪,哀乞饶命,滥杀百姓,如入无人之境,所过焦土”的过激情节。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事迹该记述的如实录入:“以个人修将军府为名,独资兴建华亭战乱后第一个清真寺——南寺。后在东关建北寺、东寺和安口西大寺。并积极支持在十二堡办义学,设私塾。华亭城内修文庙,他曾捐银数十两。”

成稿后首先征求回族文化人士的读后感觉,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记述失当的情节?合不合民族情绪和宗教的律条等等。投石问路,慎重对待,这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历史的长河犹如川流不息的泾水一样含泥带沙,也产生了一些有才无德、欺压良善、助纣为虐、滥发战端、虐杀无辜者,其丑恶行径就像一面镜子,使人醒警。譬如泾川旧县长成鸿志,系C·C组织成员,开展特务活动,组织反共宣传,成立防共小组,搜集情报,设岗盘查,搜捕中共党员。横征暴敛,抓壮丁,摊粮秣,民不聊生。借缉捕烟贩,私吞烟土,收受贿赂,利用征集军需贪污粮食抢占牲畜,利用侦破案犯,侵占民财,搜刮金银。劣迹斑斑,罄竹难书。最后遭镇压,确系罪有应得,他们给人们留了一部作官为人的反面教材。静宁旧县长王汉杰,参加国民党、和“复兴社”,在任期间,逮捕进步青年,杀害

进步人士,王汉杰称:薛天鹏经营分店,宣传抗日和开展文化工作活动是合法的,但他借此从事政治活动,我站在国民党党员的立场上,他是我的仇敌,决不能释放。你们给省政府的呈文,邹韬奋写给党政要人的信,都转到这里,要是薛至死不悟,即使专员想放,蒋委员长手谕要放,我也不能奉命。通过这段记述,才能看出他的死硬、顽固,侧面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的忠贞。王在静宁,注重植树造林,并亲自检查,栽得不深不稳者则以手杖鞭之,人称“王鞭杆”。另外,禁裹足,破迷信,补修道路,拆庙兴学,皆甚卖力。在记述此人时,功归功,过归过,各打五十,奖罚分明。儿子王为尧,接受进步思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渐与其父王汉杰断绝关系。参加中人国民解放军,部队到达云南玉溪地区,派往地方征粮工作,为保卫公粮不受损失,遭匪徒残害。父子二人,投身两个阵营,泾渭分明,互不株连,功过是非,各算各的帐。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不能用现在的政治观点去判别他的政治优劣。不苛求,不偏激。

我们的体会是:一、志书在写人记事,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时,要做到外延准确,符合历史真实,地方性是基础,科学性是指导,时代性是方向。因此,要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我们的地方志书编纂成为反映地方实情的、具有科学精神和时代特色的、经得起考验的方志精品。二、地方志编修中,特别是人物的编写,要提倡理论研究工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升华为理论,再反过来以理论指导修志实践,修志事业才能持续发展,方志的著述性才能不断提高。三、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方志工作者理应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弘扬先进文化,就必须创新。过去一些修志专家提“贵因不贵创”现在看不合时宜。目前,社会繁荣带来志书的高产,但让人耳目一新的优秀志书并不多见。社会不断演进,事类频增,观念日新,志书理当适应社会更易变通。

(作者系平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修志行文随笔

(续)

张志纯

承蒙《甘肃史志》编辑部的厚爱,在过去的两期上对我在修志中的浮浅体会,不嫌粗疏,不惜版面地和盘刊载,能与同行们交流切磋,这给了我再投稿的勇气,遂又产生拙见于此。

因为是“随笔”,所以将修志实践中的“随想”,“随意”地加以整理,观点难免偏悖,言词难免失当。而作为学术,可以争鸣。砖抛不出,玉就引不来,笔者的用心即在于此。

(续《甘肃史志》2011年第一期)

廿一、史志图片称谓应统一

当代史志部门和社会史志爱好者的著作中常出现这样的名词:“图片”“地图”“照片”“相片”“彩页”“彩插”“彩照”等;志书的“凡例”中将体例概括为“述、记、志、传、录、图、照、表”,其中的“图”为图片、地图,“照”即照片、彩页。这些资料加以分类,可归纳为“图”“照”两种,“图”含绘制的各种地图、曲线图、示意图、形象图等;“照”指用相机拍摄的各种照片。图片和照片实为形象化的一种浓缩载体,它们的形成手段尽管来自于“绘制”与“拍摄”两种渠道,但可统归于“图片一库”,为史志文字起到“相互照应,相互印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之效。鉴此,“图”与“照”两种之称,可合二呼一谓之“图片”。“图”包含了一切图纸,“片”包括了各种照片,“图片”一词可统揽许多意近名异的称谓。由此而言,笔者认为,把前述种种意思接近、叫法不同的称谓统一定名为“图片”,以免在书刊上出现称谓五花八门之嫌,力戒一个名字多种称谓,各人各书各叫不一的弊端。

廿二、史志表格的“备注”商榷

在以前出版印刷的史志类或其它书籍中的表格最后一栏大都标署“备注”。顾名思义,“备”是准备或预备,“注”是注解或注明,是留作填注说明性文字的空格。“备注”之栏适应于现行流通运作时

的统计表、登记表、花名册和各种清册等,其中的“备注”不仅必要,而且重要,非要不可,可填遗漏事项,可补未尽事宜,可注不惑事,可解不明事情。许多现行表册的“备注”里,不但对当时表中的统计数据和登记内容给予必要的说明,而且在事后表中出现需要更改、补遗的问题时可加注说明。由此看来,“备”之应该,“注”之必要,对表起到辅助作用。

换言之,“备注”一栏对临时性、流通性、变动型的表册是必要的,但对长久性、固定型的史志就不一定必要。因为:正式、正规出版的史志著作是一成不变定型之书,把“备注”的“备”字留在表中,显然是不需之字,书都印成了,该注的都注了,还“备”什么呢?倘若在读志用志过程中如发现需要再注的话,谁还在印刷品中去用笔涂鸦呢?在古今已出版的浩瀚方志中,谁见过在“备注”栏中“备”上一笔?所以在成型出版的志书中,无需再“备”,只留作“注”即可。笔者在《张掖地区志》的一切表格中,凡设置备注的栏目中只用“注”字,未用“备”字。

廿三、对简称“委”字应确切

在各级各类、各个时期的各种史志等出版物中,司空见惯“中央”“省委”“地委”“市委”“州委”“县委”“区委”……现实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这些

“委”都是党委,是对党委的简称,似乎人人共识,人人理解。然而,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想。“委”之委员会,是个统称,是种组织名称。这种组织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才能称其为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否则就是一条不规则或有缺陷的组织(机构)名称。确切的称谓是由党派(团体)—地方(建制)—组织(机构)构成,例如“中国共产党(党派)张掖地区(地方、建制)委员会(组织)”。前述“地委”等称谓(简称),只有第二、第三部分(例“张掖地委”),没有第一部分(党派),而这又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他是哪个党派的“地委”?“地委”等简称是笼统之称,各种党派都可用此称,比如共青团、民主党派,可称为“共青团张掖地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张掖地委”等。现实生活中,社会或官方约定俗成地众所周知“地委”就是地区党委。这在民间口语表达可以,但在一切文字载体上这种称谓是不能成立的。规范地说,就全称而言,三者必须都有,如“中国共产党张掖地区委员会”以简称而语,三者也须标全,如“中共张掖地委”“共青团张掖地委”。相应地说,单称“中央”也不确切,应先冠党派,如“党中央”“团中央”;更贴切的是“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地方史志中应使用周全称谓。

廿四、“他”与“它”的使用

翻开本地与外地的志书,跳入眼帘的“其他县”“其它县”“其它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单位”“其它单位”“其他活动”“其它活动”“其他民族”“其它民族”“其他文物”“其它文物”“其它农作物”“其他畜产品”“其他事业”“其它事业”等,“他”与“它”字交叉混用现象随处可见。字典对两字的大体解释的意思是:“他”称,指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它”称,指与人以外的一切事物。这一概念基本界定了两字的使用范围。

“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地方”,是人类居住生存的处所;建制(国、省、地、市、州、盟、县、旗、方、镇、村、社、居委会、街道等等),是人类活动的管理实体;民族、部落、家族、户口等,是人类群体与个体分类单元;机关、团体、单位、军队、学校、工厂、部门、组织等,是人们从事学业和公务的场

所;各种事业、集会仪式、访问视察、政治运动、示威游行、旅游休闲等,是人民群众和各类人士参与的活动……凡此种种,都应用“他”字来称。

“与人以外的一切事物”——太阳、月亮、星球、地球、卫星;山、河、江、湖、海、水、火、土;各种动物、植物、矿藏;建筑物、构筑物、器物、文物、衣物、食物、药物、财物、宝物;机械、设备、工具、用具;创造发明、科研成果、文化产品、生产成品等等,都是与人的因素以外的实物,应用“它”字去称。

廿五、起止号都应标数额单位和百分比号

在志书中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在论载起止数额时,有的起止数都标单位,如130元—150元;有的不标起只标止,如130—150元。在记述百分比起止号时有的起止都标百分比号,如xx%—xx%;有的不标起,只标止,如xx—xx%。两者相比较,无论数额单位还是百分比号,起止都标为妥,这样一目了然,不致产生歧义,不给读者留下疑问。

廿六、同义名称的联字应用括号

志书中常见有如下词组:“地市”“县市”“县旗”“县区”“乡镇”“人次”“场次”“X次”等,这种文字表述对当今机关工作人员或略有公务常识的人来说所谓“地市”就是当代省辖地级行政建制的地区和地级市,如张掖等地区和兰州等市;“县市”就是现时县级行政建制的县和市,如金塔等县和敦煌等市;“县旗”就是乌兰等县和额济纳等旗;“县区”就是民乐等县和甘州区;“乡镇”就是乡级行政建制的乡和镇,如山丹县的老军等乡和清泉镇;“人次”就是人数和人的次数;“场次”就是某一活动举行了多少场等等。且谁也清楚前后二字的等级是“两个肩膀一样齐”,属同一级别,同一含义,前者是什么建制(县),后者也就是什么建制(市),同等级。现时是这样,那么后世会咋样?当代的我们,要为后代的他们着想,尽可能地把他们容易产生歧义的文字处理确切,不致在望字生疑上苦思冥想。为此,凡前述同义名称的联用后字应用括号,如地(市),县(市),县(旗),县(区),乡(镇),人(次),场(次)等等。这是一种层次分明,级别显明的联名标法。

廿七、史志图片应有说明

在众多出版发行的史志载籍中的图片都有文

字说明,用极简明的言辞在图片旁边或下边说明其事物、人物、时间、地点、活动等项,这给现时和未来查阅利用者提供了依据和方便,为图赋予珍贵的存史价值,这是具有史学意识和历史观念者的责任所为,应向他们学习。遗憾的是,有些图片甚至某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图片,有的有说明,但只说其一,不明其二,使人不得全解;有的满卷若干图片不着一字一语,青一色图相,使人茫然。只说其一者,要么光有人物,没有时间与活动,例:“国务院副总理 XXX 来本县”;要么是概念不清的模糊语,如:“祁连山森林茂密”。不署说明的图片,在某种情况下不具备完整的资料性,因为它缺乏凭证参考和利用的依据。作为直观形象、真实写照的任何图片,是历史的可靠印记,只有贴切的文字说明,才有完全的存史价值,否则它的作用只存在一半。文字说明应具备基本要素,人文类图片包括形成时间,事涉地点,参与人物,活动内容等;事物类图片要说明事物的基本特征。

廿八、图表应编号

图片与表格是志书体例的组成部分,与文字内容密不可分。文字部分的顺序编号古今袭为定规,习以为常。凡书必有号,有号必有目,是成书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无可非议。今议之言是“图表编号”。在面世的志书中,有的有图表编号,有的没图表编号;编号者,有的正确,有的欠妥。图表既然是志书的构成部分,理所当然都要编号,给予应得的定位,为查找按号索需。《志》中的文、图、表三种载体应分别各起 1 号独立编号。文字部分的序言(含前言)与目录各从 1 号始编,正文从“1”开始依次类推编至末页;图片分综合性和专题性,综合性为行政区划、地势地貌等,专题性为行业门类。综合性图纸置于卷首,一般不编页号;专题性图纸数量较多,应编号定位;为与文字编号有所区别,图片编号应设立字头,如图 1、图 2……在图片不多的情况下,页码可通卷顺编,从 1 至末;也可按卷分层编,如上卷为图 1-1,图 1-2……下卷为图 2-1,图 2-2。表格编号也应有字头,如表 1、表 2……志书表格字头亦视数量而定,量少者可编通号,以 1 贯终;量多者分卷(编、篇、章)编号,如卷

一为表 1-1,表 1-2;卷二为表 2-1,表 2-2。同一表有若干张,应编续表;续表也应编号,如表 1-1-1,表 1-1-2。续号以波浪号区别,如 1-1~1,1-1~2。

廿九、戒用模糊语言

翻开有的志书,偶然有这样的句子:“X 月 X 日省上召开 XX 会议”“省上领导 XXX 来 XX 视察”“最近几年”“前几年”“近期”“不少人参加这项活动”“很多地方发生 XX 疾病”等等。志书资料以翔实、确切为贵,容不得含糊其词,要不得模糊之语。“省上召开”,很笼统,应标明召开会议的领导机关,如“省委召开”或“省政府召开”;“省上领导”也很抽象,应标明“中共甘肃省省委书记 XXX 来 XX 视察”;“最近几年”,没有时限,应标明具体时限,如“2006 年至 2010 年”,还有“前几年”“近期”等也与以上如出一辙。“不少人参加这项活动”,未标明确切人数,没道出什么活动,同样属于利用价值减半的“不健全”信息。为保证信息含量,应表明有多少人参加了什么活动,如“XX 县有五万多人参加了全民健身锻炼活动”;“很多地方发生 XX 疾病”,“很多”是未知数,使人不得其解,应有确实的具体地方,如“2011 年 3 月,青海省祁连县俄博乡、甘肃省民乐县南丰乡发生马鼻疽病”。

三十、志书人物称谓

地方志是人文载籍,涉及到不少人物。对人的称谓,口语是一种称呼,志书是另一种称谓。口语称呼可称 XX 同志、XX 先生、XX 老师、XX 教授;称呼职务,不管正副职,都笼统地称为 X 局长、X 处长、X 主任、X 书记等,这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称时是可以的,而入《志》称谓必须精确,笔者认为,一是《志》内直书其名,不加“同志”“先生”“老师”之尊称;二是对职务、职称的称谓,该正则正,该副则副,正副分明;三是单位与职务不宜联称,如“林业局长 XXX”“组织部长 XXX”,此称不当,应分隔系称,如“林业局局长 XXX”“组织部部长 XXX”。对副职亦应适得具位,如“林业局副局长 XXX”“组织部副部长 XXX”。

(作者系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古浪县志篇目

编首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编 自然环境

第一章 位置区域

第一节 地理位置

第二节 四至界限

第三节 县城概况

第四节 行政区划

第二章 地质地貌

第一节 地质

第二节 地貌

第三章 土壤 植被

第一节 土壤

第二节 植被

第四章 气候

第一节 气温

第二节 降水

第三节 日照

第四节 辐射

第五节 风

第六节 蒸发量

第五章 资源

第一节 土地资源

第二节 水资源

第三节 矿产资源

第四节 生物资源

第六章 能源

第一节 电能

第二节 石油成品油

第三节 煤炭

第四节 液化石油气

第五节 太阳能

第六节 沼气

第七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旱灾

第二节 洪灾

第三节 风灾

第四节 霜冻

第五节 雹灾

第六节 地震灾害

第八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质量

第二节 环境污染

第三节 环境污染治理

第四节 生态环境治理

第二编 基础设施

第一章 道路

第一节 铁路

第二节 公路

第三节 公路运输与养护

第二章 水利

第一节 蓄水

第二节 输水工程

第三节 调水工程

第四节 机井

第五节 人畜饮水

第六节 水土保持

第七节 水利管理与利用

第三章 电网

第一节 电网构成

第二节 农电管理

第四章 城乡建设

第一节 县城规划

第二节 县城建设

第三节 村镇建设

第四节 机构设置

第五章 通信

第一节 邮政

第二节 电信

第三编 居民生活

第一章 居民

第一节 人口数量

第二节 人口分布

第三节 人口结构

第四节 人口变迁

第二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姻

第二节 家庭

第三章 计划生育

第一节 宣传教育

第二节 生育管理

第三节 机构设置

第四章 少数民族

第一节 藏族

第二节 回族

第三节 土族

第四节 东乡族

第五节 满族

第五章 收入与消费

第一节 居民收入

第二节 居民消费

第六章 生活方式

第一节 衣食住行

第二节 交际方式

第三节 风尚习俗

第七章 方言

第一节 古浪方言与普通话推广

第二节 俗语

第四编 经济综述

第一章 建设成就

第一节 第八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

第二节 经济结构调整

第三节 主要经济指标

第四节 名特产品培育

第五节 扶贫开发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节 工业商业体制改革

第三节 财税体制改革

第四节 其他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章 经济管理

第一节 发展计划

第二节 统计

第三节 审计监督

第四节 工商行政管理

第五节 物价管理

第六节 质量技术监督

第七节 国土资源管理

第四章 财政

第一节 财政收入与支出

第二节 财政管理

第三节 财政投资

第四节 财政监督检查

第五节 机构设置

第五章 税务

第一节 国家税务

第二节 地方税务

第六章 金融 保险

第一节 金融

第二节 保险

第五编 农业和农村经济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区域

第二节 种植业

第三节 畜牧业

第四节 农业机械

第五节 农业综合开发

第六节 农村事务管理

第七节 机构设置

第二章 劳务经济

第一节 劳动力状况

第二节 劳务输出规模与收入

第三章 林业

第一节 森林资源

- 第二节 植树造林
- 第三节 果树
- 第四节 森林保护
- 第五节 机构设置

第六编 工业商贸

第一章 工业

- 第一节 工业规模与效益
- 第二节 工业企业
- 第三节 工业产品
- 第四节 工业企业管理

第二章 商业

- 第一节 商业企业管理
- 第二节 商业企业
- 第三节 集贸市场

第三章 供销合作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经营服务

第四章 粮油贸易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粮食收购
- 第三节 粮油供应
- 第四节 其他
- 第五节 票证管理
- 第六节 粮油储运

第五章 专控商品

- 第一节 药品
- 第二节 烟草专营
- 第三节 食盐

第六章 餐饮服务

- 第一节 餐饮业
- 第二节 服务业

第七编 党政群团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古浪县地方组织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古浪县委员会
- 第二节 中共古浪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 第三节 组织工作
- 第四节 宣传工作
- 第五节 政法工作
- 第六节 统战工作

- 第七节 党校工作
- 第八节 老干部工作
- 第九节 信访工作

第二章 古浪县地方政权

- 第一节 县人民代表大会
- 第二节 人大常委会
- 第三节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 第四节 人大代表选举

第三章 古浪县地方行政机构

- 第一节 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机构
- 第二节 施政方式
- 第三节 政府自身建设
- 第四节 基层人民政府
- 第五节 城关街道办事处

第四章 政协古浪县委员会

- 第一节 政协古浪县委员会组成
- 第二节 政协古浪县委员会全体会议
- 第三节 政协古浪县常务委员会会议
- 第四节 政协古浪县委员会内部机构
- 第五节 政协古浪县委员会重要工作和活动

第五章 群众团体

- 第一节 工会组织
- 第二节 共青团组织
- 第三节 妇女联合会
- 第四节 科学技术协会
- 第五节 工商业联合会
- 第六节 残疾人联合会
- 第七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六章 地方人民武装

- 第一节 县人民武装部
- 第二节 民兵
- 第三节 兵役

第八编 公检法司

第一章 公安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刑事侦查
- 第三节 治安管理
- 第四节 消防
- 第五节 道路交通管理
- 第六节 监所管理

- 第七节 武装警察部队
- 第二章 检察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检察工作
- 第三章 审判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刑事审判
- 第三节 民事审判
- 第四节 经济审判
- 第五节 行政审判
- 第六节 判决执行
- 第七节 其他工作
- 第四章 司法行政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法制宣传
- 第三节 法律服务
- 第四节 人民调解
- 第五章 法制与行政复议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行政执法监督
- 第三节 行政复议
- 第九编 科技教育
- 第一章 科技
- 第一节 机构与队伍
- 第二节 重点技术推广
- 第三节 科技建设
- 第四节 科技项目与成果
- 第二章 教育
- 第一节 幼儿教育
- 第二节 小学教育
- 第三节 中学教育
- 第四节 职业教育
- 第五节 成人教育
- 第六节 现代技术教育
- 第七节 教师
- 第八节 经费投入与学校建设
- 第九节 教研教改
- 第十节 机构设置

- 第十编 医药卫生
- 第一章 医疗卫生
- 第一节 医疗卫生机构
- 第二节 疾病防疫与控制
- 第三节 妇幼保健
- 第四节 卫生监督
- 第二章 食品药品监督
- 第一节 药品安全监督管理
- 第二节 药品市场专项整治
- 第三节 食品安全工作
- 第四节 机构设置
- 第三章 合作医疗
- 第一节 农村合作医疗
- 第二节 城镇合作医疗

- 第十一编 社会保障
- 第一章 民政
- 第一节 拥军优属
- 第二节 救济救灾
- 第三节 社会救助与福利
- 第四节 民政事务
- 第五节 机构设置
- 第二章 人事
- 第一节 干部编制与来源
- 第二节 工资福利
- 第三节 干部管理
- 第四节 机构设置
- 第三章 劳动
- 第一节 劳动就业
- 第二节 劳动保障
- 第三节 劳动争议仲裁
- 第四节 机构设置
- 第四章 安全生产管理
- 第一节 矿山安全监察
- 第二节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察
- 第三节 其他行业安全监察
- 第四节 机构设置

- 第十二编 文化体育
- 第一章 文艺

- 第一节 文学
- 第二节 书画摄影
- 第三节 戏曲音乐
- 第四节 群众文化
- 第五节 文化市场

第二章 文物考古

- 第一节 田野文物
- 第二节 馆藏文物
- 第三节 文物保护与修复

第三章 旅游

- 第一节 旅游工作
- 第二节 主要旅游景点

第四章 广播 电影 电视

- 第一节 电视
- 第二节 “村村通”工程建设
- 第三节 多路微波电视
- 第四节 广播电视宣传
- 第五节 电影
- 第六节 机构设置

第五章 地方志与地情书籍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地方志编纂及旧志整理
- 第三节 地情书籍
- 第四节 党史资料

第六章 档案

- 第一节 档案收集利用
- 第二节 档案管理

第七章 体育

- 第一节 学校体育
- 第二节 群众体育
- 第三节 体育设施
- 第四节 体育竞赛
- 第五节 机构设置

第十三编 人物

第一章 人物传略

第二章 人物简介

- 第一节 副地(厅、局)级以上人物
- 第二节 社会知名人士
- 第三节 脱贫致富带头人
- 第四节 高级职称人物

第三章 人物名录

- 第一节 正副县、处、团级人物
- 第二节 副高级技术职称人物
- 第三节 省级以上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

第十四编 乡镇

第一章 川区乡镇

- 第一节 古浪镇
- 第二节 大靖镇
- 第三节 土门镇
- 第四节 泗水镇
- 第五节 定宁镇
- 第六节 永丰滩乡
- 第七节 黄花滩乡
- 第八节 西靖乡
- 第九节 民权乡
- 第十节 裴家营镇
- 第十一节 海子滩镇
- 第十二节 直滩乡

第二章 山区乡镇

- 第一节 新堡乡
- 第二节 干城乡
- 第三节 横梁乡
- 第四节 黄羊川镇
- 第五节 十八里堡乡
- 第六节 黑松驿镇
- 第七节 古丰乡

附录

一、古浪县史略

二、碑文

三、专记

- (一)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
- (二)马路滩林场治沙造林记
- (三)八步沙与“六老汉”

四、补遗

- (一)诗词文翰
- (二)前志勘误

后记

索引

平凉历代府志简介

平凉府志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名佚。全书共36卷4册。主要编目:建置、山川、城池、公署、学校、关梁、祠祀、贡赋、兵防、水利、驿递、物产、风俗、古迹、封爵、职官、人物和艺术文。光绪时曾补修。北京、南京图书馆存抄本。

德顺州志 成书于元代,已佚。编纂者及志书主要内容无法稽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郭钺编纂,成书于明正德六年(1511)。已佚,内容无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刘默编纂,成书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已佚。内容无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李民圣编纂,成书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已佚。内容无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黄廷钰修,吴之珽纂。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志书14卷4册,主要编目有:疆里、建置、赋役、风土、典礼、官师、宦迹、选举、人物、武备、轶事、安定监、艺文。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王烜纂。成书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志书8卷4册,主要编目有疆域、建置、赋役、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集。

泾州志 泾州知州田一井纂修于明万历年间,已佚。

泾州志 泾州知州张延福修,州判李谨纂。清乾隆十八年(1753)修、十九年(1754)刊行。共2卷,主要编目有:天文、地舆、建置、赋役、官制、人物、选举、兵事、艺文。木刻本存泾川县文化馆,1980年重印石印本。

泾州采访志 泾州知州杨丙荣纂。清宣统元年(1909)抄本。志书1册,主要编目有:地理、城建、古迹、贡赋、鬻恤、祥异、风俗、兵防、驿递、职官、艺文。手抄本存甘肃省图书馆。

华亭县志 训导王金与贡生曹麒纂修,成书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据《平凉府志》卷十一记载,此志为华亭修志开端。后佚。

华亭县志 华亭知县佟希尧修,马魁选纂。清顺治十六年(1659)成书,志书2卷1册。内列方舆、建置、赋役、秩官、人物。此志昔遭兵燹,曾有散失。手抄本存甘肃省图书馆。

新集华亭县志 华亭县教谕赵先甲纂。仅1

册。清嘉庆元年(1796)成书。内列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手抄本存华亭县档案馆。

华亭县志(手稿) 贡生尚政治编纂。清宣统年间始修,仅见手抄本。内设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关梁、祀祠、贡赋、兵防、驿递、鬻恤、盐法、物产、风俗、古迹、祥异、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忠节、孝义、烈女、艺文、杂记等篇。复印本存华亭县地方志办公室。

增修华亭县志 县长张次房修,幸邦隆纂。共6卷4册。民国22年(1933)5月石印出版。内设地理、建置、政事、经济、礼俗、灾异、大事、名宦、人物、艺文10篇。志首有序文,凡例,志尾缀附录。较前诸志规模宏大,体例严整,内容详备。

幸邦隆还有《续修华亭县志(手稿)》,记载前志断限至民国38年(1949)的许多重要史料,并补正了前志中一些不确之处。但散失较多,20世纪60年代从废纸中拣得极少手稿。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柳仲庭编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成书。已佚。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武全文纂。清顺治六年(1649)成书,原抄本一卷。清同治八年(1869)重抄

三卷。存上海东方图书馆。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于元煜修，刘显世纂。分上下卷，附丙谷志一卷。清顺治十七年(1660)成书。上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物产、赋役、城堡7纲；下卷分学校、坛庙、寺观、官师、人物、利弊、灾异7纲。北京图书馆存刻本，上海、甘肃图书馆存胶卷。

崇信县续志稿 薛笃弼纂。清道光十五年(1835)成书。抄本。已佚。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庞笃补辑。清同治十一年(1872)成书。抄本。已佚。

崇信县志 崇信县知事张明道修。任瀛翰纂。志书4卷2册，民国15年(1926)编修。17年(1928)石印出版。全志分舆地志、建置志、经政志、官师志、选举志、学校志、武备志、古迹志、人物志、艺文志、及志余、轶事。存北京、上海、南京、甘肃省图书馆。崇信县档案馆、文化馆收藏。

庄浪县志 邑人马负图私人编修志书。明嘉靖四十五年(1556)庄浪知县窆文得、马负图草本，纂修成历史上第一部《庄浪县志》已佚。

庄浪县志 庄浪知县卫东鲁续纂。明万历七年(1579)成书。佚。

庄浪县志 庄浪知县王钟鸣修，卢必培纂。清康熙六年(1667)成书。七卷。存抄本。

庄浪县志 庄浪知县胡庚昌续修。清雍正元年(1723)成书。已佚。

《庄浪县志略》庄浪知县邵陆纂修。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成书，20卷。2002年庄浪县志办点校刊印。

庄浪县志略(抄本) 邵陆原纂，庄浪县丞耿光文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增订，全书20卷，今存。民国29年(1940)和32年(1943)，庄浪县两次组建修志机构，但仅草成人物志的《群材》、《义勇》等卷而夭折。

灵台县志 灵台知县张凤池修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书。仅见记载，志书无存。

灵台知县黄居中修，杨淳纂。共4卷，清顺治十五年(1658)刻本。分设方輿、建置、赋役、秩官、人物。原著仅存一部。1997年9月，郑行健校注后

内部刊印。

灵台县志 灵台县长张东野修，王朝俊等人编纂。共4卷6册，民国24年(1935)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卷一方輿图，卷二官师表，卷三风土志，卷四人物传。另附专集两册：上册载古迹风景图片66帧，下册收名人题字200幅。

平凉县志 举人郑濬、王安民编纂。共4卷2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书。分设图考、沿革考、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杂记。手稿存甘肃省图书馆。

平凉县志 平凉专员兼县长刘兴沛修，甘肃民政厅长郑濬、县志局局长朱离明编纂。共4卷2册。民国33年(1944)陇东日报社铅印。分设地理、赋税、物产、职官、建置、教育、风俗、人物、祥异、杂俎、艺文。存平凉市档案馆。

泾川县采访新志 泾川县长张振江编纂。民国19年(1930)抄本1册。分建置、职官、蠲恤、交通、礼俗、教育、方言、灾异、人物、兵事、轶闻诸编。手抄本存甘肃省图书馆。

泾川县志稿 邹光鲁编纂。23卷3册。民国34年(1945)编写，现仅存手抄本。内有：大事记、地輿、物产、职官、建置、民政、财赋、教育、建设、交通、政党、选举、人物、金石、文征、掌故、轶闻。手抄本存平凉市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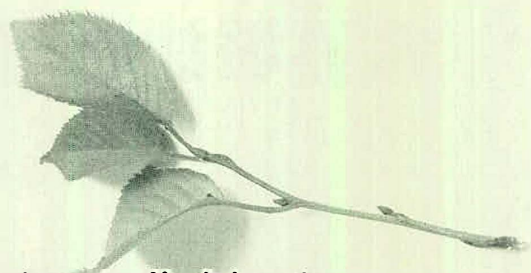
静宁县志 受庆龙、王尔全编纂，6卷。民国32年(1943)编写。篇目分列官师、人物、选举、军事、艺文、杂记。中途夭折，仅存半部手稿。

崆峒山志 庆州知州、邑人李应奇撰著。明万历年十三年(1585)面世。已佚。

柳湖书院志 河南白沟知县、邑人朱愉梅撰著。5卷1册。清嘉庆十八年(1813)成书。志书分列建革(附图)、形胜、条规、题咏、科第。存平凉市档案馆。

崆峒山志 平凉知府张伯魁撰著。清同治十一年(1872)成书。2卷2册。分列古迹、名胜、寺观、仙踪、隐逸、物产、诗赋、记论。存平凉市档案馆。1993年，以上二志由仇非标点刊印。

静宁罐子峡煤田地质志 王永焱编著。民国30年(1941)成书。散佚。



明嘉靖《秦安志》简介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 年),时任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胡纘宗丁忧归里,受秦安知县亢世英之邀,纂修秦安志。胡纘宗说:“吾志也,吾闻俟有是举非一日矣”,“遂许诺,阅月而志成”。胡纘宗出身翰林,学海渊涵,才华横溢,其经学和散文诗赋成就很高,尤长于方志,又加之其对家乡的深刻了解和早有这方面的打算和准备,因此志写得很快。该志于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付梓刊印,作序者是明代方志学家、陕西第一位状元康海。全志近 6 万字,有九卷八志,为建置、地理(分上、下两卷)、职官、礼制、学校、人物、田赋、艺文。分志均以小序缘起,后列条目,记述严谨,并有议论揭示得失,立意高远,文笔流畅驯雅,被誉为“一代佳志”。其艺文志中所收诗文,多为珍贵资料。时人引用明著名学者邵宝、席书、景昉、齐之鸾对胡纘宗所撰《安庆志》的评语,高度评价《秦安志》。谓其“文辞博雅”,“作述体备”,“文婉而章”,“事博而约”,“义温而直”,“古有承而今仅见”,“古之遗史也”。知县亢世英在《引》语中

说胡志:“文辞隽逸,理致渊涵,有沛然若江河处,有巍然若山岳处,而又游神木天,读中秘书者,自迥与人殊,而非俗手所可拟矣。”胡纘宗所撰《秦安志》现存有嘉靖十四年刻本,清顺治间增刻本、抄本,以及民国晒印本,但数量稀少,都已成珍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大连图书馆和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收藏的《秦安志》嘉靖十四年刻本,分别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入选文化部 2008 年第一批和 2009 年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天津、甘肃、山东省图书馆将收藏的嘉靖《秦安志》明刻清修本和上海、湖北等省图书馆将嘉靖《秦安志》手抄本都作为史部地方志特藏。台北图书馆亦将《秦安志》明嘉靖十四年刻本、明季及清顺治间增补本,作为善本收藏。1987 年,秦安县志办公室曾整理《秦安志》抄配本,整理本内有嘉靖十四年后的补续,故当据不是嘉靖十四年刻本,而是清增修本。另北京大学现存有嘉靖《秦安志》民国晒印抄本。

(秦安县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徽县城故址河池县城位置考

曹鹏雁

徽县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建置，渊源于汉代河池县。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武都郡下设置了其所辖九县中之一的河池县，县境在今徽县辖区内。关于徽县城故址汉代河池县城的位置，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在今徽县城西15里的银杏树乡银杏村一带，但近年徽县有人提出河池县城故址在今永宁镇的说法。依据各种史料记载与两地地形、河流、文物等证据判断，位于永宁镇的说法在文献、理论与实物方面的证据不足，在银杏树乡一带的传统说法证据充分。

徽县城故址汉代河池县城位于今银杏树乡银杏村一带有相关历史地理文献记载可以佐证：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述“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述“河池县：泉街水，入沮，合汉也。沮县：河池水所出东狼谷也。”

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水经注一卷二十一——漾水·丹水》记载：“《续汉书》曰：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浊水又东南，涇阳水北出涇谷，南径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之。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南径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以置戍。”

明末杨守敬《水经注疏》记载“仇鸠戍在徽州西。今有水出徽县西北数十里，即仇鸠水也，南迳河池县故城西。(守敬按：两汉、三国、晋，县并属武都郡。”《元和郡县志》“永嘉后，没於氐羌，县废。在

今徽县西十五里。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注》称水出河池北谷，河池在今徽县之西，今有田家河，出县东北，即河池水也)，南迳河池戍东，(守敬按：《地理志》，河池戍在河池县城中。)水出河池北谷，西南入浊水。”

成县在北魏时名白石县，成县东河古名白水，《水经注》称浊水。根据《水经注》与《水经注疏》的记载可知，由白石县浊水至两当水(故道水)之间，自西向东依次有自北南流的泥谷水、仇鸠水、河池水、两当水，这四条古河流与今天成县东河以东的徽县洛河、伏镇河、银杏河、嘉陵江完全对应。

据《水经注》等史志可知，徽县的洛河古名泥谷水，在今成县店村东界南流入红川镇。洛河下游为东西流向的红川河，东流至徽县栗川乡南境后与自北南流的伏镇河(下游即栗亭河)在合河口交汇，又经栗川乡元观峡东流。进入银杏树乡南境的河段又接纳了北来的李家河，再进入水阳乡南山胡家河地段转为南北流向，一路南入大河店乡境始称白水江，之后在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地界南入嘉陵江。这点与《水经注》“浊水又东南，涇阳水北出涇谷，南径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的记载一致。由于古代人们的地理知识有限，误以为白水东流进入白水江，所以成县的红川河与下游徽县大河店乡的白水江古代皆称浊水。但泥谷、泥水的古地名明显指向今泥阳镇泥阳川。

伏镇河的上游分别为西北侧的游龙河与正北方的榆树河，与《水经注》“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相附合。

源于徽县城西三十里以上紫烟峡（别名冻青峡、云烟峡）的徽县西河，明清之时称页水河，在今银杏树乡一带名银杏河，在唐庄、樊塆一带名罗家河，在城关镇桥西一带名西河，出城东南五里流入水阳乡牟家坝，经石家峡在嘉陵镇田家河汇入嘉陵江。这些现实地理与《水经注》“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之。”的记载完全吻合。与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注》称水出河池北谷，河池在今徽县之西，今有田家河，出县东北，即河池水也），南迳河池戍东，（守敬按：《地理志》，河池戍在河池县城中。）水出河池北谷，西南入浊水。”的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

地理上的山河布局，除非经历了强大的地质内力作用，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相对于几十亿年的地质历史而言，短暂的几百年之内山河布局不会有根本变化。因此由《水经注》、《水经注疏》中的水系记载与今天的水系记载对照可知：涇阳水即今流经江洛镇、泥阳镇的洛河；仇鸠水即今日的伏镇河、栗亭河；河池水即今日的银杏河；两当水即嘉陵江之两当段。河池水（今银杏河）经庆寿寺银杏树乡一带南流，过徽县城西南入石家峡，最终在嘉陵镇的田家河归入嘉陵江。

由“仇鸠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与“河池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戍东”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可知，公元970年以前的河池县就在银杏镇的银杏河西岸。

河池旧县在永宁镇的说法，源于个别人对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关记载的片面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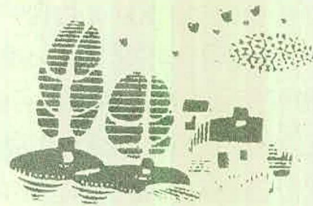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三》记载“凤州、河池：《禹贡》梁州之域。战国时为秦地，秦并天下为陇西郡。汉高祖分陇西郡置广汉郡，武帝分广汉、陇西郡置武都郡，领县九，其属有故道，河池二县，今州即二县之地也。管县三：梁泉、两当、河池。河池县东至州一百七十里，本汉旧县，属武都郡。……今县所处，谓之河池川，故取以为名。永嘉后，没于氐、羌，县名绝矣。后魏

于此置广化郡广化县，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凤州，仁寿元年改为河池县，复汉旧名，皇朝因之。固道水径县城西，去城三十步。河池戍，在县城……”故道即今两当县，故道水、故道川即流经两当县境的嘉陵江。因此，此处所说的“固道水径县城西，去城三十步。”的县城根据《水经注》与《水经注疏》的记载以及水系判断绝不是河池县城，而是古代的古道县城。“河池戍，在县城”这句话与《水经注》、《水经注疏》里的记载对照来看是一个笔误，其本意应该是“河池戍，在河池县城中”。《元和郡县志》里并没有关于永宁河的记载，若把永宁河认为是河池水，则《水经注》里的四条河与现实地理完全对应不上。

古代聚落与城市起源的区位因素一般有二：其一为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其二是交通枢纽。城市往往位于交通枢纽上，徽县的银杏树村恰好处在古代北通秦州，南通武都（今成县）的歧路口处。另外，银杏树乡银杏河两岸台地宽广，具有修筑城池的地理条件。据老年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前，银杏河一带河流较大，河滩两岸分布有许多荷花池塘，“农业学大寨”过程中才被整修成了地块，这些有“河”有“池”的地理信息与“河池县”的地名含义一致。银杏树乡一带不乏文物古迹，如作为汉代以来古道路——“故道”路标的“银杏树”，闻名而古老的佛教寺院“庆寿寺”，作为敬奉古河池水神的“水官殿”都遗存至今；徽县永宁河在永宁镇的地段，东岸地界不开阔，西岸地域狭小，不具备修筑城池的地域条件。在永宁镇也无相关的文物古迹可佐证其曾经作为河池古县的历史。

综上所述，古河池县应当在银杏树乡一带，并不在永宁镇。

（作者单位：徽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解读肩水金关汉简

桂霞 王兰

2011年8月,在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编纂的《肩水金关汉简》,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本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居延汉简研究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对于展示甘肃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地域文化品牌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肩水金关古遗址简介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了防御匈奴族进犯,西汉王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为进一步巩固边防,经营西域,在边地大规模修筑关、城、烽、堡等设施,并驻守戍兵,置官开渠,移民屯垦。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就建于这一时期。

按照国家文物保护区划,居延遗址现划分为甘肃、内蒙两部分。甘肃部分现今统称为“肩水金关古文化遗址”,其范围包含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三处古遗址。这三处古遗址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肩水金关故址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处的黑河东岸,为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一处出入关卡。肩水金关在行政上属肩水都尉府,是和居延都尉府相连的南北交通要地,是当时进出河西,通向南北的咽喉,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其主

要建筑为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大湾城故址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45公里处的黑河两岸,分东大湾城和西大湾城两部分。大湾城遗址由内、外城和障三部分组成。系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府所在地。地湾城故址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城东北151公里处黑河东岸。地湾城故址由3坞和1障组成,是汉代肩水侯官治所在地。

肩水金关汉简的发掘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发掘汉简10200枚。其中肩水金关故址出土汉简850枚。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汉简数量极少。汉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是连续的,汉宣帝时期的最多。发掘的诸多文物珍品中,有弓一件,其年代在新莽末或建武初。箭二件,三棱铜镞,其中一支箭的杆上雕刻“睢阳六年口”五字,属昭帝、宣帝时期;另一支残箭杆上雕刻“元凤三年,执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令史奉省……”此箭系由中央政府监造。转射一枚,此器与居延汉简记载的“转射”形制颇吻合,砌在坞顶的堞上,可承托弓弩向坞外左右移动发射,而不为外来箭镞所伤,此外,还可透过斜孔向外观察敌情。尺二件,边缘刻十等分,属昭帝、宣帝时期,墨线界格,属西汉晚期。信一封,为21厘米×16厘米见方的红色织

物,上方正中缀系,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尉荣信”六字。它既是通行关隘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志。麻纸一团,经修复展平,色泽白净,薄而匀称。与纸同一处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25年),其出土地层属于平帝建平以前。木板画二幅,一块用墨线勾出一只带翼的虎,作于王莽时或东汉建武初期。另一块西汉属昭帝、宣帝时期,画虽不精,系戍卒或下级吏员手笔,但作品古朴,体现了时代特征和风格。

1972年秋,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甘肃省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一带进行考古勘察。1973年和1974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破城子、第四燧、肩水金关三处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总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汉简19400枚。

1986年,甘肃省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2000枚。这些简的年号集中于公元前84—24年,属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残笔、皮革和织物等。

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

肩水金关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始于1973年7月至9月,历时75天。发掘结束后的初步整理和释文初稿依托甘肃省博物馆成立的简牍整理研究室实施。分为四步进行:第一步,拆包清点,清剔泥沙,对能够缀合的断简加以拼接;第二步,按出土时间、地点、探方、居位逐简进行编号;第三步,填写档案(包含编号、质地、尺寸、形制、草图、完残程度、文字、书体、格式、时代纪年、内容、校释者与校释时间);第四步,拍照和释文校正。

1978年后,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参与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工作。

1983年5月,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工作被列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在北京经过集体讨论定稿。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整理取得以下重要资料:文书类包括《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土民》、《大司农罪人入钱赎品》、

《盐铁令品》、《建武初期残册》、成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册、王莽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建武初期《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甲渠侯官《言府书》五种、建武初年《军情》简、《塞上烽火品约》、建武五年《居延令移甲渠迁补牒》、《侯吏广德坐罪行罚》檄、河平三年《斥免将军行塞所举燧长》简、《验问侯史无追逐器》简、天凤三年甲渠《米糒少薄》、建武五年《侯长王褒劾状》、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简类包括《相利善剑刀》、《算术书》、《九九术》、《苍颉篇》、《急就篇》、《论语》。历书类包括干支表、《历书》等。

肩水金关汉简的分类

肩水金关汉简质地分为竹简、木简两类。竹简占少部分,木简主要以当地所产的胡杨、怪柳(红柳)为原材料。肩水金关汉简是封建等级制度在文牒形式上的具体反映:有中央文书如诏书、制书等;地方文书如府书、应书、爰书等;记事簿籍如记载功名、奏事、吏卒名籍、粮钱帐务、兵械、邮驿等。一些简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肩水金关汉简的简文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符号、习惯语和常用词。如符号□、●、▲等,习惯语除燧名、部名、仓名、人名、职名等外,还有“不审日”(意思为某一日)、“爰书”(意思为辩书、证书)、“功令”、“秋射、都试”(意思即每年秋天的骑射会试)等。肩水金关出土的汉简依其自书名称,有牒、检、板、檄、契、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分类。牒,即牒书、通关文牒等。检,是一种书署形式,还可分为加封泥印钤者和不加封泥印钤而仅为器物文书标题的。板,就是上下两板相合,便于保密封检的重要机密文书。檄,即檄书,檄文,长度为23厘米左右,属于尺牍。重要的檄书,有封泥印钤,目的是为保密和引起重视。两行,即指简牍较宽,可书写两行字。“两行”一词见于简牍自书,其他历史文献绝少记载。册,即多枚简牍串编而成,一般都记录一个基本完整的内容。符,即凭证亦或通行证之类的简,如兵符、能证明持符人身份的标记符,以及证明记录吏卒巡察烽燧是否到界,仓库、邸阁值勤的凭证等。

肩水金关汉简的研究

1972年至1974年,甘肃省文物部门主持发掘甲渠侯官(破城子)、第四燧以及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8400多枚,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由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以《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为名出版。1978年,《文物》杂志第1期刊登了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写的《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一文和遗址、简册照片。同期《文物》杂志上刊登《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一文,对新出土的简牍作了较详细的分类介绍。1979年,《文物》杂志第1期发表了由甘肃居延简整理组整理的《〈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释文》。《考古》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由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组整理的《〈塞上烽火品约〉释文》。1980年后,国家文物局成立文献研究室调集全国著名专家和部分发掘工作者对肩水金关汉简依据照片和释文初稿进行再次整理校改。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合编的《居延新简》一书,书中公布了甲渠侯官和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简牍的释文,释文按原简出土地点及探文的顺序编号编写。1994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合编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一书,全面记载了1972—1982年间于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及卅井塞次东燧等遗址调查采集、发掘、复查新获简牍的全部简影、释文。2007年,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被提上议事日程。简牍保护研究工作者重新拍摄照片,力争用最清晰的彩色照片和红外照片,把原简原貌和文字信息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读者,并再次过滤和修订释文,力争把错释漏释消减到最低程度。2011年8月,《肩水金关汉简》与读者见面。

肩水金关汉简的学术价值

肩水金关汉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具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肩水金关简牍的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肩水金关汉简可把它归纳为七大类:第一类是简牍之制,如封简、检署、露布、版书、符券等;第二类是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如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贖、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史、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史与武史、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等;第三类是有关史事文件举例,如武帝诏书、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等;第四类是有关河西四郡问题,如四郡建制及福禄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等内容;第五类是边塞制度,如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等;第六类是边塞生活,如粮食、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古代记时之法、五夜等;第七类是书牍与文字,如书牍、“七”字的繁写、《苍颉篇》、《急就篇》等。

第二,肩水金关汉简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肩水金关汉简内容丰富,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它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涉及汉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

第三,肩水金关汉简科学发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的所需要的资料。

肩水金关汉简是以科学发掘而获得,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层位与地点的准确位置,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明其时代、地点与机构性质。如发掘记录、摄影、测量、绘图以及等高线测定等,都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和依据,科学挖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为史学、考古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桂霞,金塔县博物馆;王兰,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辨识 及碑文辨析

焦红原

2009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时,陇南文化部门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半块石碑,圆首长方形,残宽70厘米,高90厘米,厚18厘米,青砂石质,碑额及碑文皆楷体阴刻,碑额从右往左横书,碑文竖七行,其中五行字迹易辨识,明确可辨识的共43字。可辨识残存的碑记中,包涵了古代陇南诸如行政地理、茶马贸易、道路交通、关隘兵防等方面十分重要的信息,“茶马贩通番捷路”首次实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其历史考古和文献价值尤为重要,也使康县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惟一发现茶马古道碑刻的地方。破解、识别、辨析该碑刻,对研究陇南茶马古道文化,加强陇南茶马古道与西北、西南地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的联系,促进陇南茶产业及旅游业的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碑额辨识

发现于康县望关乡茶马古道遗址的半块石碑,外缘参差不齐,轮廓受损严重,有碑额,碑额横书,从右及左大抵4字,前3字可辨识为“察院明”,其中“察”字上半部残缺,“院”字右结构“完”字字头残损,但“察院”2字基本不影响识读,“明”字字迹笔画完整。第4字居残碑左上方碑头外轮廓处,由于受损严重,约略可见半笔横划与捺划,是什么字?赏碑者相互猜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要完成对碑额的辨识,必须首先破解此问题。

如果就此佚字,单独识别,显然困难重重。联系碑额前三字“察院”及“明”,字,我们似乎找到了破解此佚字的最佳途径。

考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察院,原为唐监察御史的官署名,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简称察院,清因之。御史出差在外,其驻节的衙署亦称察院;京师巡城御史称五城察院。另外,明代设巡按察院的官职,在各省置巡按御史一人,专以“察吏安民”,职权与汉代刺史相似。因为巡按全衔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故称为“巡按察院”,简称“察院”。察院是各道御史的衙门,各省学政最初多由御史出任,所以院试的考场也叫察院。

又据《汉书·韦贤传》说:“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宋敏求(1019~1079年)在其笔记《春明退朝录》(卷下)中也说:“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到了明代,官府通常把自己的“法令、规章制度等明确的文字记载”称之为“明文”。

此类文书国内多有发现,如九华山就有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华山察院明文禁约碑记》碑刻一通,碑文说:九华是佛教名山,佛门禁荤吃斋,不仅僧尼要恒持戒律,而且严禁山民游人食荤。但有达官贵人来山可以置办酒席,“差夫扛抬至山”,而僧伽奈何不得。也有“四处居民杂砌酒店,宰杀猪牛”的情况,都因僧人告状,被官府以“秽污佛地,贻害僧众”的罪名“尽行拆毁搬移”。云南玉溪市红塔区研和镇贾井赖井村,有一通名为《奉立察院明文》的石碑,立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碑头半月形,碑身长方形,碑缘阴刻波形二分

连续图案,碑文记载了“云南监察御使朱批示新兴州屯军张国翰控告李应时妄加粮额结案事”。

仔细分析碑额第4字,从约略可见的半笔横划与捺划,以及碑刻布局结构及汉字笔意,综合上述事例的相互辅证,笔者认为,“明文”是明代较为通行的一种文告方式,该碑额“察院明□”残缺之第4字当为“文”字,是无甚疑问的。故碑额全文该为“察院明文”。由此推断,康县《察院明文》成碑的时间亦不会早于明代。

二、碑文辨识

除碑额外,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正文,包括依稀可见字迹者,共七竖行。其中,第一行可辨识“巡按陕西监察……”6字,且“巡按”、“察”3字残缺严重;第二行“示知一应经商人……”,第三行“茶马贩通番捷路……”,第四行“旧规堵塞俱许由……”,及第五行“敢有仍前图便由……”,此4行字迹易辨识,共28字;第六行碑文“官兵(“道”?“通”?)同□(“放”?“旅”?)者……”,第3字,字迹模糊,似“道”似“通”,待进一步考证,第5字几不可辨,第6字,当地文化部门的同志初识为“旅”,经与前文文意联系,仔细辨别碑文,我认为此字为“放”似更恰当,整行可识为“官兵道(通?)同□放(旅?)者……”,共6字;第七行,处于碑额“察院明文”之“文”字正下方,看似有凿刻痕迹,然损伤过甚,只字莫辨。整块残碑,经仔细观摩,反复辨认,多次与同行协商沟通,推敲交流,除《察院明文》碑额外,目前,通篇可识别的正文大抵为:

“巡按陕西监察(笔者按:猜测此文后该坠“御史”2字)……示知一应经商人(按:猜测此文后该坠“等”字)……茶马贩通番捷路……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官兵道(通?)同□放(旅?)者……”等,共40字。

三、碑文辨析

“察院明文”之涵义,在第一节《碑额辨识》里,已有简要介绍,此不赘述。仔细研究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可识别文字连同碑额虽仅约略44字,但我们还是能从中获取大量极具史料价值的重要的信息:一是此《明文》与“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有关;二是《明文》是告诫所有“经商人”的;三是《明文》与“茶马贩”有关;四是《明文》明确指出

康县望关有一条“通番捷路”;五是此“通番捷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六是此“通番捷路”为过往民众所熟知。针对对碑刻文案认真识读后,衍生出来的上述诸种议题,笔者将不揣浅陋,逐一作简要的辨析。

1.“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与康县《察院明文》成碑时间

碑刻是在甘肃省康县望关乡的石猫梁上发现的,发现时据说被遗弃在望关茶马古道遗址旁,距最近的一户人家有一百多米远,分析石碑之所以残坏为半块,以及碑刻外缘及碑文第7行砸损的情况,估计曾经有村民把它当做石料用,却因石碑较大,搬运不易,好不容易砸断了,变成两块,砸碑的人看看破败的望关关隘,想起里面敬奉过的神像,却犹豫了:一来近旁的望关河谷,到处都有方便使用的好石头;二来不识字的村民茫然地看看碑上那些“神秘”的文字,心灵深处突然感到某种即将遭受天谴报应的可怕与“晦气”,因而,沮丧地将其丢弃,之后的岁月,再也无人关注这块“石头”,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被当地文化部门的同志“慧眼识金”。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之所以首先大胆推测碑刻残损的原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说:残碑遗弃的地方,就是石碑最初置放的地方。此碑刻长途移徙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更不可能有谁闲的无聊,千辛万苦地从今天陕西省的某地搬运块石碑过来,扔在甘肃康县望关的石猫梁上,就闲云野鹤地去游山玩水了。

然而,碑文首行文字破题便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明明在甘肃康县发现的石碑,前面我们也已经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此碑刻发现的地方,就是它最初刊立的地方,至少不会相去甚远。那么,这“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与陇南康县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要破解“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与陇南康县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对古代——特别是明代,陕西与甘肃的行政地理及中央王朝的监察制度要有一些必要的了解。

明王朝在全国设置了15个省级单位,包括:北直隶、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

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等，称为“两京十三布政司”。明朝实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宣德后，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此外，还有以监察御史为巡按，任监察之职的。今甘肃，特别是陇南全境，明代基本属陕西布政司巩昌府陇西县（包括秦州、阶州、徽州）所辖。正因之，在陇南康县出现镌刻有“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的“明文”，便不足为奇了。

史料记载，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均设有监察机关，即都察院。明代都察院下属有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平时在京城都察院供职称为内差或常差，如奉命出巡盐务即为巡盐御史，奉命出巡漕运即为巡漕御史，奉命巡按地方即为巡按御史，均称外差或特差。而监察御史奉命外出担任巡按御史则是外差或特差当中最多的一项任务。

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即有巡按御史之设，至永乐元年，遣御史分巡天下，成为定制。明代巡按御史在差遣点派、巡察事项、出巡事宜、回道考察等方面都有详细完备的遵循规则和比较完善的巡按御史制度，该制度在维护中央集权、整饬吏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的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命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却非常重大。《明史·志·第四十九·官职·二》说：“茶马（陕西）巡漕巡关……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箠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抵，讪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¹¹

明代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可见其位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

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

我们无法从“巡按陕西监察”这6字的碑记中，获得太多有用、有价值的信息，但考中国古代“巡按监察”制度，清顺治年间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之后虽然不再设巡按御史，但仍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农御史等职官，雍正年间还曾置巡察各省御史。

综上所述，即使碑刻第7行以后碑文失佚，又无碑刻刊立的落款及时间，但由于“清沿袭明制”，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康县望关《察院明文》的刊碑时间，早不过明代，晚不出清末。

2.《明文》是对所有“经商人”的一种“告示”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碑刻残缺，碑文语焉不详，人们对《察院明文》的性质亦含混不清，便很正常。

《明文》第二行，其实是整通碑文的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指明了，碑文“示知”——“明示”并“告知”的首要对象是什么人？即：所谓“一应经商人”——所有从事商品交流、商业贸易的人。

因此，通俗说，该《明文》就是“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对所有途径此地做生意的人的一种“告示”。

3.《明文》“茶马贩”与唐宋时期陇南的茶马贸易

陇南的马市开办较早，《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之十四·物产·马》援引《后汉书》说“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又《十国春秋·王建纪》说“王建以骑将起家，得蜀之后，于文、黎等州多市番马，十年之间，遂得马万余匹。”《宋史·志》对陇南武都（阶州）、文县（文州）、成县（成州）的“市马”记述更详：宋雍熙、端拱间（984—989），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则阶州、文州，市吐番马，取良弃弩，初以铜钱给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市帛、盐钞、茶及它物易之。其马以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为率。官给刍粟，纲送京师，或就配军，有券马、有省马、有马社、有拓买。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值自二万五千四百五十至万六千五百五十。课、自万三千四百五十至八千九百五十，凡六等。以第一等送京师，余就配诸军。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

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南渡后，文、阶有场，与黎、珍、叙、南平、长宁、西和，凡八场。其间，卢甘马岁一至焉，洮州马一月两月一至，叠州番马或半年一至，皆良马。乾道初，秦州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一千二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12]

陇南的茶马交易市场，最早出现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是年，北宋官府在岷县、宕昌、武都县等地设置茶马交易市场，进行茶马交易。”^[13]

一般认为，较可靠的茶学资料，最早出现在西汉，是王褒撰写的《僮约》。此文撰于汉宣帝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是唐代陆羽《茶经》之前中国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范文澜《中国通史》这样讲述：

中国特产之一的茶（《尔雅》称为檮[jiǎ]），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王褒《僮约》说“武都（甘肃武都县）买（当作卖）茶”。武都地方，氏羌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对于王褒《僮约》原文之“武阳买茶”范文澜解为“武都卖茶”以及将汉代“武都”（置所当在今西和县洛峪镇）理解为今“甘肃武都县”的学术问题，这里不做论证。武都地方氏羌杂居，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与西北游牧部落民族进行马匹交易，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茶马互市，却是不争的事实。

通常说，中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主要是指唐宋以来，我国西部与北部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性的贸易活动。

茶马互市最早出现在唐代，与饮茶风俗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唐代茶马贸易出现以前，中央各王朝主要是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草原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马匹的，这种贸易历史上叫做“绢马贸易”。北宋时期，茶马互市活动在甘肃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绢马贸易而成为各民族间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并且形成制

度，历代沿袭下来。^[14]

由于茶有助消化、解油腻的功效，特别受以肉类、奶酪为主食的羌藏等游牧民族的喜爱。到了明代，在西北互市贸易中，茶叶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明朝廷出于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方面的需要，推行严格的禁榷和专卖政策，先是设置茶课司，以确保有足够的茶叶进行互市交易；其次是置茶马司，专事茶马贸易。茶马司大都建在利于互市的汉藏界地带，设大使、副使等职，并建有专门的仓库，将所征茶叶储藏起来，以供易马。洪武四年（1371年）对川陕茶区和西北茶市实行全面禁榷垄断。洪武五年，明廷建立第一个茶马司——秦州茶马司，七年，设河州茶马司，十二年，置洮州茶马司。秦州马司因远离藏区，不便互市，于洪武三十年迁至西宁，改称西宁茶马司。明初岷州虽未设茶马司，但一直扮演茶马司的角色。直至万历二十三年才正式设岷州茶马司。茶马司设立后，明廷一方面大力招徕藏族各部前来互市，另一方面为保证官营垄断，“禁秦属军民毋得入西番互市”（《明太祖实录》卷106），以极力遏制民间茶叶的运销活动。再次，设监察官以巡理茶政。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遣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着为令”（《明史·食货四》）。^[15]

明朝的监察制度客观上对“私茶”屡禁不止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同时，茶叶为各族商人“视为利藪，竞相趋之”。洪武十七年（1384年），官府发兵缉捕，一次便抓获茶商140人，皆被谪戍充军。面对私茶贸易越来越猖獗，朱元璋气急败坏地说：“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贱马贵，不独国课有亏，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纓杂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其所以制夷哉。”（《明太祖实录》卷251）可见，“私茶”不仅有损于明廷在互市中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与明王朝的国防战略发生冲突。所以，明廷对于无视朝廷法令的私茶活动限制得非常严厉，接连下令严守关隘，禁止商旅私自贩鬻，规定凡“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明太宗实录》卷188）^[16]

康县《察院明文》在告诫“一应经商人”的同时,特别提到了“茶马贩”,虽仅寥寥3字,却充分说明,这条路上,从事茶马贸易的“茶马贩子”特别多。就《明太宗实录》“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的规定,联系“朱元璋气的急败坏”,以及《明文》第六行“官兵(“道”?“通”?)同口(“放”?“旅”?)者……”或许,我们已经读懂了“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对之前途径此地“茶马贩”导致国家茶叶专卖税收严重流失的严厉神情。

《察院明文》“告示”是特别针对“茶马贩”的,而该“茶马贩”的“告示”,以及“茶马贩通番捷路”,却首次实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也使康县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惟一发现茶马古道碑刻的地方,对于研究陇南茶马古道文化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及史料价值。

4.1 陇南的古驮道与“通番捷路”

陇南有极为特殊复杂的军事地理位置,这里不仅山大沟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河谷悬崖间,常有栈道凌空而起,斗折蛇行,蔚为壮观。阴平古道是陇南故道的典型代表;《西狭颂》摩崖石刻是陇南古代道路交通史上最为华美的篇章。这里也是西北连接西南以及陕甘茶马古道的重要交通枢纽。“1950年11月,甘川公路宕昌至武都段整修竣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汽车从兰州抵达武都。”^[7]此前,陇南的货物运输主要依赖于人背马驮。民国前,以武都为中心外延的驮道主要有五条:武都至成县、武都至西和、武都至礼县、武都至舟曲、武都至兰州等。这几条驮道途径的主要线路分别为:

(1) 武都至成县驮道。自武都起,经马街、安化、佛崖、歇马店、望子关到平洛,过犀牛江,经毛坝、小川至成县。再由成县起,经小川、纸坊,到西和、礼县。华双公路建成后,从成县起,到江洛镇,接华双公路北去到天水;东过徽县、两当,到陕西凤县,翻秦岭到宝鸡和西安。

(2) 武都至西和、天水驮道。武都起,经安化、牛蹄关、秦家河、昌河坝、大桥、洛峪、何坝,西和、长道、盐关至天水。从昌河坝分路,经小川至成县。

(3) 武都至礼县驮道。武都起,经马街、金厂,过雷家坝、龙林、石桥至礼县。

(4) 武都至舟曲驮道。自武都起,沿白龙江而上,经两河口,至舟曲。

(5) 武都至宕昌兰州驮道。武都起,经石门、清水子、邓邓桥、宕昌、哈达铺、岷县至兰州。^[8]

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驮道不一定是茶马古道,而茶马古道却必然是驮道。

我们以康县为例,东汉时期,康县的古驮道就已经存在,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部少数民族政权扩张不断引发战事,切断了陕西和四川经甘肃通往青海、西藏的贸易通途。陕西、四川、甘肃等地盛产的茶叶、药材以及土布、蚕丝、土纸等商品,无法运出进行交易,换不回自己所需的食盐和马匹等物,却促进了西南茶马古道的快速形成。明代,西北茶马古道再次疏通,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康县窑坪,逐渐由商队歇脚的地方演变成了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四川和陕西上来的商队由窑坪进入甘肃境内,南去四川成都和东去陕西汉中到湖北的商队亦在此分路。清初,陕川行商,陆续定居窑坪,使窑坪小镇从明代起到建国前,经历了570多年的商贸兴盛期。

解放前,康县亦有五条驮道,全长323公里。第一条西通武都,东至陕西略阳,是自古以来甘肃通往陕西、四川的要道。从望关经长坝、巩集过云台大山岔(散关)至窑坪出境,全长70公里,其中,大山岔至窑坪段18公里,早在汉建宁间,由武都郡太守李翕派员修整。第二条,望关经平洛,翻太石山渡西汉水通往成县,县境长32.5公里。此驮道在明代设置平洛驿时已骡马往来,但路况很差,特别是太石山段陡峭崎岖。1941年曾部分整修加宽,但仍不足两米。第三条,云台翻毛垭山过三官至岸门口,长30公里。第四条,云台至关沟门口,渡西汉水抵成县谭河,是解放前康县县城云台、岸门口及中部、南部地区通成县的要道。同治十年(1871年),白马关分州州判罗映霄督修谭河官渡后成为骡马驮道。第五条,从岸门口起,经嘴台、长坝到望关,全长48公里,是康县通往武都的必经之路。^[9]

而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大体上是从窑坪起步,过大南峪(古兰皋镇)、大山岔(古散关)、翻越

险峻的乔家山到关沟门后,经寺台、大堡、巩集,过菜籽垭、长坝、到望关岔路口,再向西,一条过歇马店、甘泉、翻米仓山、到武都后可西北去甘南,或经宕昌走岷洮北上兰州,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或从武都经古阴平道南下四川广元、成都等地。另一条路沿平洛河北去,从药铺沟翻太石山到搭船坝(大川坝),过犀牛江官渡到成县的小川,经西狭(著名的汉三颂之一《西狭颂》摩崖石刻所在地)后直至西和、礼县和天水一带。

对于身处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陇南自古就是白马氏、羌等少数民族聚集的“番”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陇南曾先后出现了由白马氏人建立的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和由羌人建立的宕昌国等5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无论从南向北还是从东向西,地处“秦陇锁钥,巴蜀门户”的陇南,途径这条“通番捷路”,无疑都是最省时、省力和最划算的。

5.“通番捷路”常有官兵防守

发现康县《察院明文》石碑的古遗址,现望关乡政府驻地,其西北100米处山垭的石猫梁,这里地势险要,自古就是陇南十分重要的军事关隘。望关,又名望贼关,望子关。《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二·关梁》引乾隆元年(1736年)《甘肃通志》说:“望贼关,在州北一百七十里。道出秦州要路,为州境险隘,有官兵防守。”^[1]2011年3月26日,在“康县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先期考察活动中,笔者在望关关隘遗址采访了当地老人蒲洽银(康县望关乡叶湾村人,60岁),据介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有座三层高的古门楼,门洞上的二层厦房里,一面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一面供奉的是周仓。上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时才给拆了。这说明,“文革”前,这里虽已无“官兵防守”,但这条茶马古道上的古关楼尚存。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在《察院明文》石碑发现的遗址东面山坡上,见到人工开凿的石阶遗存,有二十余级,长约11米,在西南面的山坡上,有台阶路和石砌路基遗存,长约20米。

“茶马贩”之“通番捷路”,以无比珍贵的石刻文献史料形式,强有力地证明了康县茶马古道在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无与伦比的重

要性,同时也反证了,从明代一直到清末,这里都有官兵严格防守的必要性。

6.“通番捷路”为过往商旅人所共知

虽然,《明文》第六至七行,由于碑刻残损,许多碑文已无法识读,第六行仅可辨认“官兵道(通?)同口放(旅?)者”6字,第七行无一字可识读,但综合《碑文辨析》诸内容,我们不难得出此“通番捷路”为过往商旅人所共知的结论来。

由于第六、七行可识读的文字,与碑刻前文衔接,文意多有唐突,理解较为困难,如果我们勉强将“官兵”、“同口放者”,与“通番捷路”、“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及碑刻遗失部分内容“通盘”联系,或许我们能够作出这样大胆的猜测:

望关茶马古道是陇南联系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的重要驮运枢纽,这条由官兵把守,著名的“通番捷路”虽然艰险,却因“便捷”省时,为过往商旅人所共知。由于原来的“捷路”需要翻山越岭(从药铺沟翻太石山到搭船坝),路面狭窄,且路况较差,后来,官府沿平洛河至犀牛江开辟了一条新路,并重新设卡,征收过往商贾商品贸易的税赋,严禁私茶贩运,而商人们出于人性本能,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愿走新路,仍明里暗里抄“捷路”,躲避关防,致使政府财税收入严重流失。鉴于事态不断恶化,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特在此刻石“告示”,即今之《察院明文》,昭告乡里,以通晓利弊,“震慑犯罪”。

上述推论,因《明文》碑刻残损,部分文案缺失,目前尚无史料可考,便姑妄言之,抛砖引玉,求教于博学。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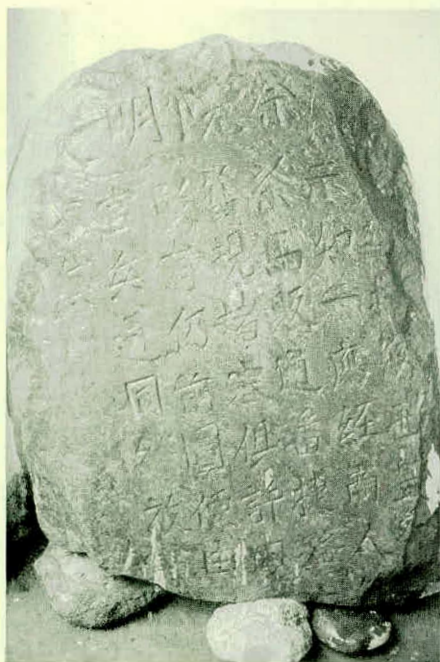
- [1] 清]张廷玉等.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P194.
- [2][10] [清]叶恩沛.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P94.
- [3][7] 8]《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编写组.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 P510P515, P45-46.

[4]胡小鹏.茶马互市[A].郭厚安.吴廷祯.悠久的甘肃历史 [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P134-135.

[5][6]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M]兰州:甘肃人

民出版社,2009.P142-147,P148-149.

[9]黄俊武.康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P275-276.



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残件



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残件拓片

(作者系陇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白银市方志馆 被正式列入“三馆一中心”规划

白银市方志馆建设项目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白银市志办的积极争取下,被市政府列入“三馆一中心”建设规划中。“三馆一中心”是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白银市方志馆设在图书馆内,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建立方志馆是妥善收藏、保护、展示历史文化资源的需要,白银市乃至甘肃省还没有一个专门陈列志书的机构。白银

市方志馆的建立,将是全省首家专业地方志管库,为实现方志资源共享、丰富白银市民的文化生活起到重要作用,也为繁荣白银的文化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方志馆建设进入初步设置方案阶段,市上领导要求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突出馆藏特色、丰富馆藏、科学配置,努力打造白银文化品牌。

中国航天第一港——东风航天城

王 兰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北部,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1992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发射中心视察,亲笔为发射中心题名“东风航天城”。

基地建设 195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集中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开始了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7年秋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决定筹建导弹、原子弹试验靶场。1958年1月,组成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兵种领导及苏联专家组等52人参加的导弹、原子弹靶场勘察队,分别对陆地和海上靶场场址进行勘察。在陆地靶场勘察中,勘察队员认为酒泉以北的金塔、额济纳旗一带地势开阔平坦,地质坚硬,远离居民区,气候和水源条件适宜,移民容易,不占耕地,能满足一般导弹试验的条件,同时认为酒泉农业基础较好,交通相对便捷,建设初期可以作为施工器材和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1958年2月,司令员陈士榘派工程兵军事建筑部副科长刘万通和国家地质部水文地质局局长率领1名工程师、7名技术员、2名化验员、2名苏联专家、1名翻译和从北京饭店抽调的1名厨师组成的水文地质考察队,配备8辆解放牌汽车、1辆吉普车来到酒泉。同年10月,考察队打百米深井100多眼,顺利完成水文地质勘察任务,为导弹基地建设立了第一功,勘察队向中央军委写出勘察报告。1958年3月27日,中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在酒泉建立。

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特种部队。将驻扎在朝鲜的二〇兵团、志愿军工程兵指挥部、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等单位撤回国内,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在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工程指挥部”,部队番号为“7169”。这支部队悄然进入金塔县北部戈壁,拉开大规模基地工程建设帷幕。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汽车运输部队和地方科研院校、建筑公司也抽调精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戈壁滩,投入建设“航天城”的战斗。基地第一任司令员由红军长征途中率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军团先遣团一营营长、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担任,原空军第三军政委栗在山任政委。基地建设初期,中央军委要求在三年内修建300公里铁路,500公里公路;架设2000多公里通讯线路,埋设几十公里电缆;建设1座大型机场,1座中型水库和1座发电厂;完成50多万平方米的营房、医院、科研机构等设施;建成导弹发射场、附属工厂、通讯设施、观察场所等。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地调集部队,集中兵力进行建设。从1958年3月30日起,先后有数万大军从全国向酒泉聚集,担负起试验基地建设的重任。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715个厂矿和各兵种通力协作下,仅用2年6个月,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竣工。

辉煌业绩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创建到发展、从奠基到辉煌,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过程,它凝聚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心血和汗水,是几代官兵用青春和热血在浩瀚的大漠戈壁上铸就的一座历史丰碑。在中国航天史上创下了十项第一:1960年9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下转第59页)

父亲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张凌青采访录

周学海

张一悟是甘肃建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甘肃籍最早的中共党员。86年前的1925年12月，张一悟与宣侠父、钱靖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从此，党在甘肃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在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断壮大。1949年10月1日，革命的烈火终于照亮了陇原大地，陇原儿女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客观、真实地反映张一悟从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过程，用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激励人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中共榆中县委党史办着手编辑出版《陇原火种——甘肃建党的创始人张一悟》。为此，党史办组织人员专程前往北京，采访了张一悟的女儿张凌青同志。已84岁高龄的张凌青同志虽然头发已经花白，神态略显龙钟，但思维清晰，十分健谈，眉宇间饱含着一种坚强、豁达开朗的气质，言谈中透露出一种对家乡的无限眷恋之情。话题说到她的父亲张一悟如何培养子女，她们一个个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张凌青若有所思，稍微停顿一下，像是极力在回味什么，而后向我们详略讲述了她经历的那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出生凉州

1920年，她的父亲张一悟在北京大学和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思想进步，成绩优异，深得革命先驱李大钊、恽代英的器重，1923年2月，恽代英即同意张一悟参加党的活动。

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张一悟再赴南京东南大学学习，结业后，按照李大钊、恽代英的安排回到甘肃兰州，发展党员，筹划在甘肃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张一悟先后在省立兰州中学、女子师范

任历史、国文教师。教学中，张一悟向学生讲授新思想、新知识，提倡白话文，并把自己带来的《新青年》、《向导》、《觉悟》、《东方青年》等进步书刊提供给学生阅读，受到学校封建守旧派的排挤。1924年携妻带子到凉州省立第二师范（即武威师范学校）任教。1925年初，张凌青（当时名叫张惠英）出生在凉州（今武威凉州区）。7月，张一悟回到兰州继续在从事教学。12月与随刘郁芬部队入甘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靖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任书记。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甘肃刘郁芬开始“清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11月23日，张一悟被迫离开兰州前往陕西，2岁的凌青与父亲分别，这一别就是11年。父亲走后9天，弟弟张华清出生了。不久，母亲带着哥哥张怀清、弟弟张华清回到榆中县城北关村居住。

宣传抗日

1934年，张凌青8岁时，由爷爷张继祖送到栖云镇女校上小学。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迹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这一年12岁的张凌青已经升到了5年级，班上总共有张凌青、谢宝锦、金尔莲、张芳和翟淑兰5名学生。学校采用复式教学方式的教学。8月，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榆中县长王云海之子女——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彰与作家吴渤先后来到榆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他们成立了“小小鲁迅图书馆”、“王氏小剧团”，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排演街头小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宣传抗日。张凌青第一次见到王德谦、王德芬是在8月的一个星期一早上，当时国民小学每周一是纪念日。栖云女校的各班学生集中在学校旁的金龙庙戏台前肃立、升旗，接着由值周教师领着背诵总理遗嘱

(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而后举行讲话。那次讲话的是王德谦和王德芬。王德谦往戏台上一站,师生们感觉眼前一亮,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只见王德谦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一套崭新的呢子大衣,围着一条鲜艳柔婉的围巾,戴着一双雪白的手套,这身简洁明快的西式装扮,在封建落后的榆中县城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师生们心里都称赞,给人一种精干、文质彬彬,绅士般的感觉。王德谦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保家卫国。这些平时校长都没讲过,师生感到很新鲜。

接下来,在上好文化课的同时,王德谦、王德芬和王德彰带着她们排练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不久,王德谦自己也自编了一出街头戏《兰州的生活》。排好后,小剧组利用集日在县城街头演出,积极宣传抗日。同时,王氏兄妹把《毕业歌》改编为《妇女进行曲》教大家演唱,歌词为“姊妹们,大家起来……”。剧中,王德芬扮演男同志——哥哥,张凌青扮演妹妹,配合的相当默契,不时博得观众的喝彩。

在演剧的闲暇时间,王德芬、王德谦教会了她们跳绳的游戏。由于栖云镇女校宣传抗日的戏演得好,文体活动好,县上在该校举办了一个示范班。县城附近各校校长、教师来校受培训。培训班结束时,张凌青作为栖云女校的代表在会上讲话,讲话题目是《不要辜负》,内容是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此后,学校组织学生多次在街道上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动员群众支持抗日救亡。

张一悟于1937年底从山东监狱出狱后,于1938年初辗转来到榆中。当时,张凌青曾见过父亲一次,但没有认出。那天,她和母亲在县城走亲戚,路上见到一个面容憔悴、精神疲惫、留着长胡子的人,母亲给她介绍,这就是你大大,但张凌青感到很陌生。由于2岁时父亲离家搞革命,至今已11年了。父亲待了几天,炕都没有睡热,就又急急忙忙地走了。

奔赴延安

1939年7月,张凌青从栖云镇女校6年级毕业。当时父亲在兰州,得知女儿小学毕业后,十分高兴,带信让她到兰州去上学。当时,在兰州住的

爷爷、奶奶、小叔张恒德一家,她的父亲、哥哥另外住。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兰州领事馆中文教师,一边搞党的地下工作,哥哥张怀清在领事馆搞勤杂工。因为日机三天两头轰炸兰州,兰州的大学城已搬至各县区。在省政府旁有一个女子职业中学,张凌青就在这所学校上学,课程主要是国语、算术、地理、公民和技术课。开学前,张一悟领张凌青在榆中县城中街子的一家生活书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上海出版的《中国妇女》,一本是谢冰莹写的《冰融新从军日记》。

到兰州后,上课之余,张一悟教张凌青尽快学会三件事:一是抽时间阅读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主要内容是大革命时期的妇女,怎样行军打仗的事;二是教她洗衣服,怎么洗,怎么漂,怎样就算干净了,怎么晾晒,怎么叠放;三是晚上给她讲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中国社会二十讲》两本书,增加她的社会知识,引导她如何正确认识社会。有时还讲怎么跳交谊舞。其实这一切都是张一悟为送张凌青去延安做准备,而这一切张凌青压根就不知道。9月的一天,父亲把张凌青和张怀清叫过来交待,由哥哥张怀清带妹妹去照一张合影,后由哥哥请张凌青吃顿饭。

听说要照相,张凌青非常高兴,以前只听大人们说过,从来没见过,想到就要把自己的像照在一张小纸片上,既新鲜又高兴,尤其是还要下馆子,多么好的事呀!张凌青穿上自己最帖身的一套旗袍,梳好头,便与哥哥一起照了张合影。尔后,哥哥带她在小吃摊吃了一碗面片。一碗面片在物质极为丰富的现在不值得一提,但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了。

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父亲已经给她收拾好了行李。张凌青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父亲要送她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做的准备。

天空全黑下来后,大哥把她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临行前,张一悟送给女儿一支“新民”牌钢笔,给了13元钱以备急用。八路军办事处人很多,大多是军队的领导干部、首长,还有一些伤病员,他们有的是到苏联、新疆去,有的是回延安,大家吃饭都用小脸盆,最好的菜是炒鸡蛋。9月10日,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周仁山、张义合带领从苏联来

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同志(据说是在苏联留学)和她4个人,从兰州出发,起程前往延安,出发时还照了一张相,可惜在山东突围时销毁了。

一上公共汽车,张凌青才发现,别人都穿军装,只有自己穿旗袍,好在票员是张凌青的干姐夫。他问,去什么地方,张凌青随口答道,去榆中,实际票是去西安的,她怕暴露,好在票员也没再问。颠波了一天,黄昏时车到平凉,晚上住宿休息。周仁山和张义合住一间房,张凌青和那位女同志住一间房。国民党军队在平凉设卡子查得非常紧。晚上查房时,他们先突然断电,尔后突击检查。电刚一断,张凌青就赶紧跑到周仁山的房里,当时周仁山正读报纸。国民党士兵反复盘查,问张凌青到什么地方去,张凌青回答到延安去。士兵又盘问为什么去延安,张凌青机智地回答:“回家。”士兵又问张凌青爸爸是谁,张凌青急忙回答:“是伍修权。”显然,士兵知道伍修权,但他的孩子怎么说话是兰州口音,产生疑问,于是又问:“你怎么说的是兰州话?”张凌青忙应付:“我妈是兰州人。”士兵虽有疑虑,但又找不出什么破绽,就放了过去。敌人走后,周仁山夸张凌青随机应变,机智勇敢。

第二天一大早,接着赶路,中午时分就到了西安七贤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这里,办事处给去延安的人都换便装发军装,看到那些又大又肥的军装,再看看自己合身紧凑的旗袍,张凌青没换服装,只要了一条皮带。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张凌青见到了陈成义的女儿陈瑛。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旁边有一个大公园,名叫革命公园。里边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是一处休息纳凉的好去处,许多市民中午时分在这里纳凉。第二天一大早,陈瑛拿着歌本约张凌青到革命公园去学唱《国际歌》。张凌青便与陈瑛一同来到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学唱歌。中午时分,突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传来,西安城响起凄厉的警报声,人们纷纷往防空洞跑。想到公园里没什么,张凌青和陈瑛并没在意。

没想到,多架飞机直扑公园上空,在公园上空投掷了大量炸弹,大树被连根拔起,尘土遮天蔽日,公园里的房屋炸飞。只听轰的一声,张凌青和

陈瑛背靠的大树被一块大弹片拦腰斩断,张凌青从没经历过这种场面,顾不上隐蔽,拼命跑出公园,直往不远处的八路军办事处跑,炸弹在她的左右不断的爆炸,忽听有人喊:“小鬼!小鬼!往这边跑!”张凌青按照提示跑到了防空洞。事后,才知是汉奸告密,日军飞机专程来炸八路军办事处,把所有的炸弹全投进了旁边的革命公园。张凌青听后好不惧怕,总算捡回一条命。

黄昏时,陈瑛约张凌青到公园看看,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树木断了、房屋塌了,死尸横七竖八……

当时,正值宋庆龄给延安捐献了许多棉花。周仁山、张义合与司机商量,在棉花车箱里,用棉花垛围了一个小洞,让张凌青钻进去,掩护着开向延安。一路上国民党军队查得很严,司机尽量避开县城、城镇等要塞,顺利到达了延安。

到延安后,张凌青改名杜群(由于张一悟外出进行革命活动时,很少顾及家里,兰州中外大药房老板杜猷康的妻子秦仪贞受党组织安排,帮助照顾张一悟的家庭及子女,孩子们与秦仪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亲切地称她杜伯母,改名时想念她,就改名杜群。)初到延安,张凌青感到一切都很新鲜,窑洞、小米粥、八路军战士高昂的斗志,边区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但自己很是难堪,因为不论是学校学生,还是机关工作人员,大家一律穿着军装,只有自己一人穿着旗袍,十分显眼,而延安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当时,从延安到敌占区去的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换便装后前往,到延安的人,也在办事处换军装前行。张凌青后悔自己任性在西安没有领军装。过了好长时间,她才想法找了一套军装。她感觉自己一下子溶入了这生动活泼的巨大的力量中。

张凌青到延安后,由于聪明机灵,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字也写得秀气,被组织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速记班学习速记。毕业后,分到西北局任速记员。

当时,高健君也在西北局工作,一有空张凌青就去找高健君,他乡见到老乡,张凌青感到十分亲热。

在延安,张凌青还遇见了舅舅傅唯义,表哥傅

克刚和同乡裴罗克。当时傅唯义和裴罗克正在上卫生学校,一天,从报纸上得知张一悟把女儿张凌青送到延安后(原来张凌青到延安不久,在武汉出版的《革命日报》头版就报道了“共产党员张一悟送女儿到延安”的消息),想方设法找到了张凌青。并把她叫到卫生学校,问寒问暖,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后来,傅唯义赶赴前线,临行前,专门给张凌青送了一套军装,张凌青和裴罗克把舅舅送了15公里,才挥泪告别。从此,她又认识了同乡裴罗克。

在延安时,杜伯母(秦仪贞)仍十分关心张凌青的生活,曾想办法给张凌青带去了一件马夹和一套绸子衣服,因为大家都穿军装,不便穿,张凌青保存了好长时间,后万良才夫人生了孩子,缺少衣服,张凌青知道后将这些衣服送过去,改做孩子的衣服用。

不经意间,几年已过,离家久了,孤身在外,张凌青想念妈妈、哥哥和弟弟,想念父亲和爷爷,她把这一切都写在信中,并在信中放上了自己的一张小照片。正巧,高健君奉命到敌占区去(兰州、榆中当时都属敌占区),张凌青于是给高健君捎去了写好的信。

信中,张凌青详细介绍了延安的生活工作情况,并表达了思念家人,想回家乡的念头。几个月后,张凌青收到分父亲的回信。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她,在非常时期不能随便写信,一来暴露了自己和家人,如果不慎,会给家里带来灾难,二来给捎信人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严肃批评她幼稚的想法和做法,鼓励她不要留恋家庭,向先进看齐,向组织靠拢,早日加入党组织,做一名勇敢的新社会有为的新女性。由于父亲的教导,此后张凌青再没有给家里写信。

转战山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凌青被调入山东解放区工作,任山东省公安厅速记员。在山东省公安厅,组织了一个速记班,张凌青任教员,专门培训速记员。不久,国民党撕毁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全面向解放区进攻,山东首当其冲,省政府、公安厅临时转为支前委员会,随军转战。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群众接待转送救治伤病

员。整个山东战场上,青壮年全部支援前线,运送粮食和弹药,妇女和儿童转送伤员。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又是国民党进攻的重点地区。这时,张凌青被分配到一所野战医院,随军转战,她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定陶、鲁南、莱芜、孟良崮、鲁西南、兖州、济南等大战役。

随着战局的变化,组织安排张凌青等一批女战士以难民的身份,从威海坐船转移到大连,从大连上岸后,经过苏联红军的哨卡,隐蔽在当地的一个红光公司。不久按组织调配,辗转到了辽南解放区,在辽南公安处工作,接着沿鸭绿江到辽东通化,在辽南公安处辽东公安分局工作,营口解放后,又调到营口公安局工作,最后调到山东省公安厅。1950年张一悟在大连养病期间,张凌青和丈夫周明用积攒的津贴买了一块手表,专程看望父亲。看到女儿已从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身经大战的革命战士,张一悟十分高兴。拿着女儿送的手表,他百感交集,为了方便起见,他让女儿换了块怀表。11月,张一悟从大连回兰州经过沈阳时,伍修权专门宴请了张一悟,经过北京时,专门到已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儿张凌青处住了几天。看到女儿、女婿,他十分高兴,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进步,搞好工作。

外交风采

沈阳解放后,张凌青又从营口市公安局调入辽宁省公安厅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筹备成立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当时,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的张闻天奉命调外交部工作。周明、张凌青等随同调入外交部工作。在外交部工作后,张凌青深感知识欠缺,需要加强学习。经组织同意,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学习,后转入中国外交学院专供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随丈夫一同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任秘书和翻译。从南斯拉夫回来后,张凌青再度进入中国外交学院学习英语和法语,结业后,随丈夫周明在外交部亚洲司、礼宾司、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非洲司等单位工作,一直任秘书和翻译,直到1983年离休。由于张凌青学习刻苦,知识渊博,在各个岗位都圆满完成了所负责的工作,得到领导

的器重,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悠悠思乡情

张凌青虽经常在外工作,但十分想念家乡,不时通过报纸、收音机和亲人的信件了解家乡榆中的变化,了解家乡的人民,并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办些事。1983年,榆中县旅游局负责人找到她,请他们协助联系让胡耀邦总书记为刚刚开放的兴隆山旅游景区题词。他们多方打听,找到杨静仁夫人吕平,通过杨静仁,请胡耀邦为兴隆山题词“陇右名山”。1984年,县委、县政府请他们为顾问,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张凌青和周明应邀回乡探亲,参加了兴隆山山会和太白泉竣工仪式。

期间,张凌青专程到兴隆山烈士陵园和张一悟墓为革命烈士和父亲扫墓,并救济了生活困难的护陵人。

县政府在北京成立办事处后,经常联系看望她,她们也力所能及为县上办些事。

在张凌青客厅摆放着一盆花,由于长期没有换土,长势不太旺盛,她说,别的花都可以换,这盆花不能换,因为这土是榆中家乡的土,这花是家乡的花。一股思乡情油然而生。张凌青深情地说:“家乡来了人我没别的要求,最好给我带一盆花或者一把土,我看到花、土,就如同看到了家乡的人民。”2002年4月、2008年4月,县委党史办前往慰问时,给她详细介绍了榆中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给她送上了《榆中县志》、《榆中史话》、《榆中解放五十年》、《历史的足迹》、《高擎党徽的人们——榆

中人物选辑》、《中国共产党榆中历史简编》等榆中史志书籍和《中国共产党在榆中》、《陇上英烈张一悟》、《奋进之路》等电视片,给她送去了家乡的特产。她非常高兴,并一再要求来人给他多讲讲家乡的变化。张凌青虽已84岁高龄,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下楼,但她始终关心着家乡。她希望县委党史办公室和县地方志办公室多出一些反映榆中悠久历史和经济建设的书籍,使更多关心家乡的人了解榆中,更希望开发利用好兴隆山和革命烈士陵园,让青少年都了解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无限的怀念

84岁高龄的张凌青说,在她的一生中虽与父亲离多聚少,相聚很短,但父亲对她的要求很严,对她的教诲很深,是父亲把她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使她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不论在青少年时期参加青年抗战团榆中支团宣传抗日救亡,在延安革命圣地学习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东,还是在公安战线上,还是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父亲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时时激励着她不断进步,她的父亲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父亲,也不愧为青年的优良导师。1951年父亲去世时,她正在坐月子,无法亲自为父亲送行。多少年来,这些一直困扰在心里,她时常教育子女一定要学习爷爷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作者系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接第54页)事处。三是激励革命志士继续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1917年11月,在孙中山的号召下,甘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知识分子响应全国范围内的护法运动,发动了维护民主共和、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武装起义,被称为甘肃的护法运动。因起义准备不足,甘肃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但这次甘肃近代史上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促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四是辛亥革命带来了思想上的解

放。至高无上的皇权被推翻,甘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一批革命青年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再认识,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踏上寻求救国救民的新路。1919年,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发生。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甘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步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里程。

(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论甘肃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

李荣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辛亥革命的首次起义成功。随后,辛亥革命风云席卷全国。在甘肃,许多革命志士揭竿而起,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

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会党起义遍布全省各地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饱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甘肃各族群众奋起响应辛亥革命,爆发了一系列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1911年11月,毗邻陕西的灵台县佃农蔡普民发动陕甘边境会党60余人,在胡家店举行起义。接着,宁州帮会首领彭四海等人聚众数百人在早胜镇起义,响应陕甘革命军。在河西,凉州齐振鹭在狱中继续与帮会联络,筹备起义。在陇南,文县王洪巽集合农民千余人,捣毁县税局。

遍布甘肃各地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反动派的镇压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沉重地打击了甘肃境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加速了清王朝的彻底覆灭。

二、秦州起义成为甘肃响应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在甘肃所有受辛亥革命影响发动的武装起义中,秦州起义最为重要。

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宣告独立。但甘肃政权仍然被清朝贵族把持着,前后两任陕甘总督升允、长庚都是封建体制的忠实护道者。他们不仅疯狂反扑,镇压甘肃各地起义斗争,而且积极策划并组织军队向陕西发动进攻。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长庚等人对此消息秘而不宣,继续组织力量进攻陕西革命军。在这关键时刻,同盟会员、原清军统

领黄钺于3月11日在秦州正式宣布起义,并在秦州各界人士支持下,宣布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领导的秦州起义在甘肃首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扭转了封建顽固派疯狂破坏陕甘革命运动的严重局势,粉碎了封建顽固派企图拥戴清帝偏安西北、把甘肃作为复辟大清王朝基地的反动阴谋,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赵惟熙为署理甘肃都督,成立甘肃军政府,陕甘总督被废除。由于秦州起义和甘肃临时军政府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起义中未能发动群众,在封建势力的多重压力和袁世凯的逼迫下,表现出了妥协。最终,黄钺宣布取消独立,解散甘肃临时军政府。封建官僚和军阀势力重新执掌了地方政权,甘肃社会又陷入了封建官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但秦州起义作为全国辛亥革命运动中西北地区最有影响的一次起义,既是影响甘肃历史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辛亥革命的首次起义成功。随后,辛亥革命风云席卷全国。在甘肃,许多革命志士揭竿而起,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

三、辛亥革命在甘肃的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在甘肃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政体发生改变,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彻底被推翻,甘肃随之进入民国时期。二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1912年11月,有1000余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其中有些人就是同盟会员,国民党甘肃支部相继在甘肃各地设立办 (转第53页)

辛亥革命在甘肃最壮丽的一幕

秦州起义

办军民各政。”

顺应了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因而深得民心。3月13日,在当地各界人士的赞助和支持下,秦州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推举为军政府正都督。

临时军政府成立后,黄钺立即通电中央及各地,并先后颁布了《甘肃临时军政府法约》《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和《实行政策》。打开黄钺亲自编写的《陇右光复记》一书,可以看到这些“约法”的具体内容,“约法”规定军政府“以维持救济人为宗旨”,兴农工,办教育,革除清朝陋习,维护地方治安,这无疑赢得了民心,秦州老百姓拍手称快。

就在秦州起义8天之后,即3月19日,兰州赵惟熙见大势已去,投机革命,也在兰州宣布独立,成立了一个“甘肃军政府”,并于所谓起义的当日,用快电电告北京袁世凯。

有文章认为,当时秦州没有电报局,发电报要到千里之外的西安;且交通不便,须得步行。再者黄钺起义后首先只向孙中山、黄兴等通电。因而,袁世凯收到赵惟熙的电报时,黄钺所发电报还未到达。所以袁世凯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并根据赵惟熙一面之词,指责黄钺领导的秦州起义为非法,勒令黄钺取消甘肃临时军政府。

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历史画卷里,甘肃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发生于1912年3月11日的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在甘肃最壮丽的一幕,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次起义。在它之后,中国全面实现了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陕西成为北方地区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西安起义后,清廷陕甘总督长庚为堵截陕西义军,防止革命在甘爆发,组织东征军分三路向陇东、陇南扑来。

11月,甘肃督练公所军事总参议黄钺受派前往陇南布防。黄钺是湖南省宁乡县人。此前,由于受到革命党人黄兴等人的影响,1906年,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已经对革命深怀激情。

长庚起先让黄钺统带骁锐军十营,兰州道彭英甲对长庚说:“黄是革命党。”长庚半信半疑,但不便收回成命,减黄钺的军队为六营。黄钺表面上是为堵击陕西革命军,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揭竿起义。到达秦州后,黄钺一面派人同陕西革命军联系;一面和当地有革命思想的人士、进步青年、开明士绅和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积极为起义作准备。

黄钺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只有秦州宣布独立,才能牵制攻陕的甘军,遂于1912年3月11日果断起义。战斗打响后,起义军分4路很快占领了筹防局、州署衙门、游击衙署和军械火药库,黄钺亲自率兵攻占巩秦阶道道署。

一个叫王煊的人在著作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起义的全过程:“壬子正月十五前,乘组织秧歌社鼓,遮掩耳目,钺每早率队往来校场校阅,十五后改由中和门进城,经过街市,仍到校场,一连几天。到三月十一日早六时,率队入城,分作三股:一股入游击衙门,杀游击玉润(满人);一股入贡院内,有洋炮一营,存单响毛瑟二百支,来复枪、开花炮及刀矛等军器完全收了;一股入州衙,知州张庭武被虏。钺又提刀单身入道署,约道台向柴起义,向允赞助,就在道衙成立军政府,并收了新招防营的后膛枪械。黄自任甘肃临时都督,向为副,刘文厚为招讨使,魏绍武为使署参谋长。立八大处,分

赵惟熙电告中说：“甘肃已承认共和，黄不应独立，应即征讨。”“甘肃早已宣布共和，本署都督奉袁大总统命令，委署甘督，自应谋治理之统一。黄钺在秦独立，囚禁官吏，戕杀武员，实属违背共和，应调驻秦州军队以资镇摄。”

黄钺几次发电辩解，秦州独立是代表甘肃省对于各省而独立，但不言对清廷独立，因他早知已经共和了。又质问兰州是真改革，抑未改革？军政不整，财政不理，交通不讲，实业不修等语。

两方文件往还，在承认共和的迟早、独立的合理不合理上争辩，相持了三个月之久。黄钺据理力争，但坚持数月之后，感到希望渺茫，最终妥协。

1912年6月7日，甘肃临时军政府和甘肃军政府正式签订了《和平解决条约》，黄钺宣布取消独立，解散甘肃临时军政府。至此，秦州起义后的发展情况和辛亥革命在全国的结局一样，以失败告终。封建官僚和军阀势力重新执掌了甘肃地方政权，甘肃社会又陷入了封建官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

“甘肃响应辛亥革命的起义最先在秦州爆发并不偶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甘肃中医学院经贸与管理系主任云立新说，处在甘肃最东端的秦州，即今天的天水地区，离兰州较远，交通不便，省城对其的控制力较弱，反之当时

陕西起义的风潮却能很快波及。同时它向来被称为甘肃“南入川，东通陕”的门户要道，再加上邻近经济文化较甘肃发达的关中地区，得风气之先，民主革命思想传入较早，青年深受影响，很多人同情和向往革命，从而造就了起义爆发的人和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甘肃本地人士萧润生、董戒、张衍荪在整个起义中出力最多。参加秦州起义的天水人魏绍武、汪剑萍、张锦堂、刘铭玉、王汝翼等爱国志士，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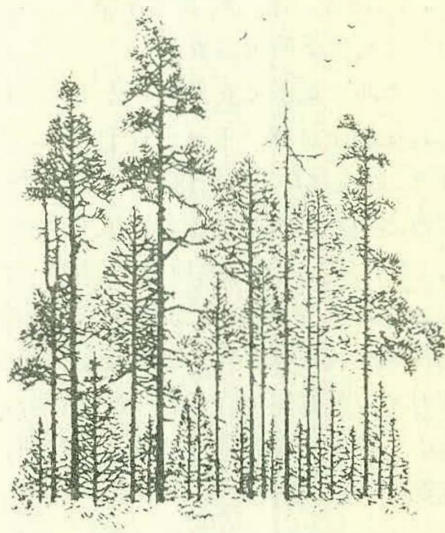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李荣珍说，爆发在甘肃大地上的这场起义绝不是可有可无，它不仅有力地策应陕西的革命军，极大地破坏了在甘肃的清朝反动势力镇压陕西起义的图谋，粉碎了封建顽固派企图拥戴清帝偏安西北、把甘肃作为复辟清王朝基地的阴谋，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

“由于黄钺领导的秦州起义和建立的甘肃临时军政府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起义中未能发动群众，对封建势力表现了极大的妥协，终于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李荣珍说。

秦州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辛亥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陇原儿女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崇信史志网』开通

12月1日，由崇信县委党史办主办的“崇信史志网”(<http://www.chongxin.gansu.gov.cn/dsb/>)开通，这是平凉市开通的首家县级地方史志网站。“崇信史志网”目前设置史志动态、史志知识、政策法规、史志成果、精彩视频、公文发布、史志图片、崇信史事、崇信山水、崇信人物等16个栏目，全面反映了崇信县史志工作最新信息和工作动态，从不同侧面反映崇信县过去和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光辉里程，有力提升了崇信县对外宣传的影响力。



一野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 西南军区进军西藏记事

荷 重

2011年5月,是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西藏的和平解放,结束了近代以来西藏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大业,也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8月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和随后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令,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部队,即着手从青海、新疆进军西藏事宜。后经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调整部署,决定由西南军区二野第十八军为入藏主力,从四川经昌都进军西藏,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部队予以配合。遵照党中央指示,一野暨西北军区积极修筑青藏公路,从北线配合昌都战役,由新疆进军藏北阿里,护送十世班禅进藏,为配合西南军区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

修筑青藏公路

地处西南边疆的西藏,与祖国内地远隔万水千山,交通不便。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解决交通问题。1950年4月,毛主席向进藏部队发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令。彭德怀要求西北进藏部

队做好在青藏高原修筑一条公路的准备,并向驻防青海的第一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任务。一军当即调遣近万名官兵,以王尚荣副军长任总指挥,开赴施工战场。一军党委在筑路命令中强调:修筑青藏公路“不仅为保证我骑兵支队进军玉树,支援解放西藏,而且对今后开发青海、繁荣国民经济和保卫国防,更有重大意义。”参加筑路的指战员,不惧高原缺氧、雨雪袭扰、施工器材短缺的不利条件,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挖运土方79.7万余立方米,修建涵洞901孔,新建公路605公里,于9月中旬胜利完成湟源至玛多黄河沿段的修路任务。一野首长嘉勉筑路部队“发扬了高度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同在战斗中杀敌一样,解决了历史所未曾克服的淤泥、崎岖、荒漠地区筑路的困难,为人民国家创造了建设的奇迹。”

在青藏公路修筑过程中,筑路部队得到了青海各级政府和各族群众的有力支援,共运粮115万公斤,食油2.8万公斤,干菜116万公斤,盐1.9万公斤,以及牛肉干、草料和大量生活日用品,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工程完成后,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军区特在日月山、鄂拉山、三塔拉、长石头山等处树碑,志记修路官兵的功绩。

从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

遵照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央西北局决定,以第一军骑兵支队(亦称青海骑兵支队)、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之一部,从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以配合西南军区第十八军等部队从西康、云南的进军。

1950年6月18日,由一军从骑兵团抽调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的青海骑兵支队,由孙巩支队长、冀春光政委率领,与玉树干部大队从西宁出发,长途行军830多公里,于7月24日进至玉树。根据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青海骑兵支队归属昌都战役北线作战集团,由第十八军五十二师统一指挥,参加西南军区发起的“昌都战役”。10月7日骑兵支队从玉树南下,与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在巴塘会合,两支兄弟团队密切协同,并肩作战,继攻取囊谦(今青海玉树州囊谦县)、在昌都西北要隘类乌齐歼灭藏军第七代本(相当于团)一部之后,又以日行85公里的强行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在人马掉队严重减员的不利情况下,于18日先敌4小时抢占恩达,次日又占领控制昌都西南的宗驿山垭口,截断了藏军西撒拉萨和南逃的退路。昌都地区的解放,打开了我军进藏门户,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以军事力量抗拒解放西藏的图谋,也为其后《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青海骑兵支队返回玉树归建。

1950年春,新疆军区奉中央军委、西北军区命令,由第二军组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担负进军西藏阿里地区的任务。为查明阿里地情,探察进军线路,给后续部队入藏建立前进据点,该师一团由7个民族135人组成的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7月31日从于田出发。先遣连在既无向导指引又缺地图参照的情况下,边侦察边前进,顶风冒雪,横越昆仑,经改则、多木,于10月底进抵阿里地区的扎麻芒保。之后,奉命“转入过冬备战”。11月大雪封山,道路阻塞,后勤补给困难,先遣连以地窖避风寒,以打猎顶粮缺,以麻袋片补军装,并挤出部分生活用品接济当地贫苦藏胞。由于气候恶劣,营养不良,许多战士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又无医药救治,时有人员病亡,军马倒毙。先遣连在藏北阿里

高原坚持十个月,共有37人牺牲。李狄三也因病逝世。1951年1月,新疆军区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记功,授予“进军西藏英雄连”称号。

1951年5月6日,该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子明率领由师侦察连和1个加强骑兵连组成的先遣支队,在军地千余人的兵站线后勤保障下,向阿里进发,28日与先遣连胜利会师。后在安子明的统一指挥下,跨越冈底斯山主峰脚下的冰河和海拔7000多米的东君拉达坂,到达普兰。阿里地区噶本(相当于专员)率人与安子明会面。7月15日在普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和解放军纪律。尔后部队回师北上,于8月3日胜利抵达阿里首府噶大克。

护送十世班禅进藏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地方政教的两大领袖。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离间,两大活佛之间产生了极深的隔阂。九世班禅于1923年愤而出藏,1937年圆寂青海玉树。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1949年8月在青海塔尔寺坐床后,也一直驻锡在青海。保护、争取和团结班禅,是促进西藏上层内部团结,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举措。

兰州战役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习仲勋:“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问题的准备”。为此,彭德怀指定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要求“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并对如何对待保护班禅,争取和团结班禅及甘青境内藏族同胞,作了具体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针对班禅多次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愿“待命返藏”,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的爱国意愿,对如何护送班禅进藏问题向西北局作出指示。1950年1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范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甘肃和政人,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为助理代表,与班禅代表一起研究部署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的。1月31日,周恩来面示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派给班禅的干部、医疗队、卫

队、警卫营等，须在3月以前准备就绪。8月12日，由范明和慕生忠（一野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率领的西北局西藏工作委员会以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名义与以计晋美为主任的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率1300多人的第一批入藏人员，从西宁出发赴藏。为保障独立支队行军安全，一军派出1个骑兵团的兵力从右翼掩护到通天河。独立支队沿途战胜洪水、震灾和高山险阻，于11月4日进驻藏北重镇黑河（今那曲），12月1日到达拉萨，与十八军胜利会师，并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12月15日，班禅从塔尔寺到西宁辞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专程从西安赶到西宁送行，青海各族各界代表举行了欢送大会。19日，班禅及行辕主要官员和随从人员共342人，由牙含章率部队护送入藏。班禅一行先乘汽车到达海西香日德，1952年1月12日离开香日德南下，经鄂陵湖、扎陵湖、曲麻莱，过通天河，越唐古拉山，于3月底安抵黑河，4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和僧俗群众热烈欢迎。当日下午，在布达拉宫日光殿与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

性会见，恢复了昔日的友好关系。6月23日，班禅驻锡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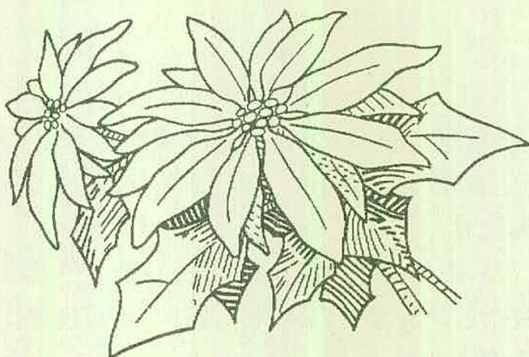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②《新疆通志·军事志》

③《青海省志·军事志》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秘书处原处长）



（上接第48页）一枚近程导弹；1960年11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中程导弹；1966年10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次导弹携带核弹头的“两弹结合”；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1975年11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1980年5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1981年9月，在中国首次以“一箭多星”方式，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1987年8月，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一次为国外卫星提供卫星搭载服务；1999年11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这里进行第一次飞行试验，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2003年10月15日9时整，航天员杨利伟搭载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飞入太

空，16日6时23分成功着陆；2005年10月12日9时整，“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搭载费俊龙、聂海胜两名航天员成功发射进入太空，经过115小时32分钟的太空飞行，完成了中国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后，“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4秒，“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搭载翟志刚、景海鹏、刘伯明三名航天员成功发射进入太空，经过2天20小时27分钟的飞行，完成了中国航天员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仅倾注了航天创业者的聪明才智，也饱含着地方人民群众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共建国防的乐章。

（作者单位：金塔县地方志办公室）

甘肅省民國大事記(1931—1934年)

民國20年(公元1931年)

1月

8日 國民黨甘肅省政府改甘肅農工銀行為富隴銀行。資金150萬元,將前西北銀發行之1元、5元、10元鈔票,共100萬元,加蓋富隴銀行印章,繼續流通。

15日 國民黨政府任命潼關行營主任顧祝同為甘肅省政府主席,未到職。改任馬鴻賓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

2月

1日 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令。除廣州中山大學外,其它中山大學一律更改校名。省政府遂改“蘭州中山大學”為甘肅大學。

2日 國民黨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派馬文車、嚴爾艾、譚克敏、劉秉粹4人為視察員來甘活動。

是月 劉志丹領導的農民武裝自陝北來到合水縣固城川,與趙連璧、周守孝的隊伍會合,共400多人,整編為4個連,劉任總指揮。不久,在寧縣張皮塬被陳珪璋部謝紹安旅打散。

3月

是月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田昆山、凌子惟、馬文車、楊集瀛、張豹呈5人為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成立委員會,進行黨務整理工作。

△ 共產黨員梁干丞來蘭,進入鄧寶珊部開展革命活動。

4月

11日 馬仲英據張掖後,於3月在張掖成立

“河西省行政委員會”,自任主席。是日,馬步芳部由扁都口突擊馬仲英,激戰於民樂縣三堡。馬仲英敗走酒泉、玉門、安西。後應哈密維族上层人士加尼牙孜之求,率部進入新疆。

15日 馬步芳部在甘州鎮守使署院內,砍殺馮玉祥舊部旅長雷振邦等220餘人。

5月

2日 隴南14縣群眾代表通電控訴馬廷賢屠殺人民,苛徵稅捐等罪行。國民黨中央派赴甘肅視察員嚴爾艾查報。嚴受馬重賄,顛倒事實,為馬掩飾,馬反被潼關行營主任顧祝同任命為隴南綏靖指揮。隴南14縣人民又控嚴於監察院。

是月 劉志丹奉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利用與陳珪璋警衛團團長劉保堂有深交關係,去平涼陳珪璋部開展兵運工作。陳委劉為11旅旅長,率200餘人駐防寧縣。

6月

29日 陳珪璋部13旅旅長高廣仁,設謀繳收劉志丹部的槍械。劉志丹的“兵運”活動再次失敗。

7月

是月 潼關行營改編甘肅軍閥各部為國民黨政府部隊。以陳珪璋為新編13師師長、魯大昌為新編14師師長、雷中田為暫編第7師師長、馬步芳為暫編第9師師長。

8月

5日 國民黨政府任命馬鴻賓為甘肅省政府主席。

25日 国民党政府军暂编第7师师长雷中田与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委员马文车发动政变,扣押甘肃省政府主席冯鸿宾。27日宣布成立“甘肃临时省政府”,马文车代理省主席,雷中田任甘肃省保安总司令。史称“雷马事变”。

9月

9日 马仲英为新疆省盛世才部击败,率部退回甘肃酒泉,与马步芳达成协议,以安西、敦煌、玉门、酒泉、高台、鼎新、临泽7县为驻防区。翌年,马仲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暂编36师师长。

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甘肃各地人民群众集会游行示威。

是月 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创建了中共在甘肃的第一支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编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

10月

8日 北洋军阀吴佩孚自1927年失败后潜居四川。吴乘甘肃政变之机,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抵兰。雷中田、马文车拨专款3万元设“吴上将军行辕”迎接。经吴佩孚调解,雷中田释放马鸿宾,马遂回宁夏。

12日 陕北游击支队到达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与南梁游击队会师。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对游击队进行整编,分为两个支队,由谢、刘分任队长。共约五六百人。

11月

是月 西安至平凉公路修成通车,开始利用汽车捎带邮件。

12月

3日 杨虎城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出任“甘肃宣慰使”,率部入甘。孙蔚如部联合陈珪璋部,击溃雷中田部于定西、会宁间。7日,雷中田逃往四川。7日,孙蔚如、陈珪璋进驻兰州。吴佩孚、马文车逃往北京。“雷马事变”平息。

12日 孙蔚如在兰州成立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8日 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决定,将原农工、富陇两银行发行之钞票,每1元抵0.15元。并限于1933年5月底,由省政府以现金兑换回笼,停止流通。同时,决定由甘肃省平市官钱局发行定期流通券,并停止富陇银行业务,由孙蔚如成立的陕西省银行甘肃分行发行1元、5元、10元面额银元券,总额38.5万元。并将西北银行未发行的10枚、20枚铜元券,加盖印章,作1角、2角使用。

△ 孙蔚如改《新陇日报》为《西北新闻日报》。

是月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甘肃大学为省立甘肃学院,设文学、法律两系;艺术、政治及医学专修科。次年秋,又增设农学专修科。

△ 川军邓锡侯师长黄隐率4路支队并联合甘肃讨逆军第4路司令史鼎新等部,会攻天水。马廷贤败逃宁夏后只身走天津,残部为马鸿宾收编。

△ 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在兰州成立。邓宝珊任主任。该部有共产党员葛霁云、周益之、邓鸿宾、陈云樵、杨子实、杨嘉瑞等,分布在大本营和步兵学校。

△ 中共陕西党组织派孙作宾等一批共产党员随孙蔚如师同来兰州,在孙部所属军官学校建立支部,进行革命活动。

是年

△ 中国国医馆甘肃分馆在兰州成立。医务人员13人,牛载坤任馆长。之后,柯与参、牛孝威、王仲英等相继任馆长或副馆长。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

1月

8日 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刘分任正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随后,部队开赴宁县山嘉塬。2月12日,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9日 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孙

蔚如令陇东 12 县供应新编 13 师陈珪璋部给养；河西 16 县供应新编 9 师马步芳部给养；陇南及临洮、定西、洮沙等 9 县供应新编 14 师鲁大昌部给养。从此，各该师在划拨供应各县的横征暴敛，成为合法化。

2 月

15 日 甘肃省气象测候所成立，正式开始气象观测。以后又陆续在天水、岷县、临洮、甘谷、平凉、靖远、庆阳、武威、张掖、敦煌等县设立气象分所。

20 日 孙蔚如伙同杨子恒诱杀陈珪璋于兰州拂照楼。驻兰陈部孙志远旅被缴械，陈部总参议秦钟岳同时被杀。陇东为陕军所控制。

3 月

22 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正宁县寺村塬建立了甘肃境内第一个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同时建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杜邦兴任总指挥。

25 日 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决议：驻陇南陕军及绥靖司令部月需经费银币 12 万元，由甘肃省署按月支付。

是月 孙蔚如成立甘肃清乡总局，划全省为 10 区，设清乡分局。

4 月

2 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派在 17 路军警备第 3 旅唐嗣同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习仲勋、刘林圃、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杰等，利用该部 2 团 1 营调防之机，组织 200 余官兵在两当县城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5 支队。部队在转移途中遭敌袭击，起义失败。

13 日 共产党员曹定侯、陆子江领导杨虎城 17 路军干部教导队毕业学员 300 余人，在泾川县凤翔路口起义。队伍向陕甘边转移途中，被国民党政府军和民团打散。

26 日 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规定：本

省在外省留学生由政府补给官费的学校有清华、北大、朝阳等 36 所大学中甘肃最需科系 35 个，初助官费学生每年为 96 名。5 月又规定：甘肃每年公费选送国外留学生人数为：欧洲 8 名、美国 4 名。1934 年 2 月，又定欧洲为 12 名、美国 6 名、日本 16 名。

30 日 国民党政府为遏制陕军在甘势力，以“军政分治”为由，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迫孙蔚如通电撤销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

5 月

5 日 靖远兵暴爆发。谢子长、焦维炽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在靖远与打入甘肃警备第 3 旅的共产党员张东皎、王儒林等策划举行暴动。但因事泄，计划被打乱，是日仅由吕振华等率 200 余官兵仓促起义，并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4 支队。不久，受国民党政府军追击而失败。

10 日 划临洮县西地设洮西设治局。1933 年 2 月 21 日，改名康乐设治局。1940 年 11 月 6 日，改为康乐县。

17 日 甘肃省民众教育馆陈列之珍贵历史文物“新莽权度”被盗。计失：标准铜杖 1、铜钩 1、二钩 6 斤，3 斤铜环各 1、篆文图样 1。后在天津海关查获，由北京博物馆收藏。

18 日 甘肃开辟第一条空中航线。由中德合营的欧亚航空公司将上海—南京—西安的航线延伸仲到兰州，每周往返一次。

25 日 国民党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函请国民党甘肃省查禁《新国民》等进步刊物。

30 日 谢子长、王儒林、杜润滋等重新聚集力量，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谢子长任总指挥，在靖远、会宁、榆中、景泰等县交界地区活动，并发展到 400 余人。7 月 23 日，被国民党政府军优势兵力“围剿”，部队被打散。

7 月

9 日 驻合水县西华池的国民党陆军新编 11 旅特务营第 1、2 连，在中共党员高鹏飞、曹胜勇等率领下起义，在宁县盘克与陕甘游击队会合。

△ 甘肃省银行发行兑换券。面额分 1 元、5

元、10元三种。

8月

是月 共产党员卢纪民等策动杨虎城部17师50旅补充2团2营500多人在定西岷口起义,编为人民革命军。马济人任司令,卢纪民任副司令。在向陕甘边区转移途中,于清水县关山被尾随的青海职业土匪打散。

9月

7日 兰州附近及泾川、崇信、华亭、平凉、天水、清水、秦安等县发生霍乱,死亡甚多。

△ 驻陇南陕军杨虎城警备1旅旅长马青苑部哗变,“拥蒋反杨”,杨虎城令杨子恒率部击溃,马只身逃往南京。

是月 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及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先后查禁《心声》、《两个策略》、《锻炼》、《红旗报》、《机关会刊》、《铁流》、《新创造》、《中日评论》、《怎样干》等多种刊物。

10月

22日 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及全体委员,以财政等问题无法解决,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提出辞职。

23日 共产党员李良、刘杰三、李华锋发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的军士队,在平凉蒿店镇暴动,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7支队。后遭当地民团袭击而解散。

11月

15日 甘肃学院、省立一中、兰师、女师、工校、农校、五中等七校教职员,开展索薪罢教斗争。17日,1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捣毁财政厅长谭克敏住宅。省府邀请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调停,并撤销谭克敏职务,允发清各校欠薪,与此同时,天水第六师范学校教师举行罢教;陇东留北平学生发表宣言,表示响应与支持。

12月

24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西宜君

县转角镇,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

25日 18时45分,玉门发生里氏7.5级强烈地震。震中在东97°0′、北纬39°9′玉门西南朱家戈壁一带。被灾的有玉门、金塔、酒泉、鼎新、临泽、高台、张掖、敦煌、安西9县及嘉峪关、肃南地区,玉门昌马盆地,土地隆起,山崩地陷,房屋摇倒十分之九,挖出尸体278具。其他各县均有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波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

是月 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常黎夫任秘书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长,马豫章任组织部长。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扩充游击队,领导武装斗争。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

1月

31日 国民党甘肃省决定,红水县改名为景泰县。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因各地军队截留财税,财政问题无法解决,且地方派系斗争复杂,穷于应付,托故去南京。主席职务由省府委员邓宝珊暂代。

2月

是月 甘肃机器制造局拖欠工饷七八个月,职工派代表向军械处长张子林索要欠薪,张态度傲慢,激起工人罢工。罢工坚持10多天,迫使当局补发欠饷,撤销了张子林职务,取得胜利。

3月

8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西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秦武山先后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哉、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

9日 国民党甘肃省以兰州人口稀少,财政困难,无设市条件为由,报准行政院撤销兰州市政筹备处。

30日 国民党甘肃省通令,中等学校“四

二”制改为“三三制”。

是月 根据中共甘宁青特委决定,王儒林以“绥靖公署招募专员”身份,在靖远招集起义失败后流落的战士,并招募新兵。中旬,在园子岔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

△ 中共甘宁青特委派贺晋年、崔仰亭、郝新亚等,在兰州策动邓宝珊部水北门驻军一个排起义。到达皋兰县后长川与西北抗日义勇军会合。

△ 国民党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查禁《前路》、《真报》、《青年书信》、《红旗》、《新中国》等刊物。

4月

5日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

6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通令停止使用银两,改用银币,并规定兑换标准为白银7.15钱折合银币1元。

是月 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皋兰县红砂岷遭国民党政府军甘宁青“三省联军”疯狂围攻,伤亡严重。郝新亚、吕振华等35人被俘,在兰州遭杀害,孙作宾、李慕愚等被营救脱险。

△ 蒋介石偕宋美龄视察“新生活运动”来到兰州。

5月

是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梁干丞、张德生到兰州参加甘宁青特委工作。梁任军委书记,张负责组织工作。

△ 马仲英率部万余人二次入新。

△ 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鲁大昌部团长何戒僧,在文县碧口策划起义,事泄被杀。

7月

1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由朱绍良继任。

28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省委成员杜衡叛变,供出党在甘肃的秘密组织,设在兰州广武门菜根香酱菜园、辕门印依轩照像馆、木塔巷山

东会馆等处的中共甘宁青特委机关被破坏。张德生、常黎失等转移;梁干丞、谢冠军和进步青年康雨农,于31日被捕、经过两个多月的酷刑审问,康雨农死于狱中。10月19日,梁干丞、谢冠军被杀害。

是月 兰州发生霍乱,死者甚多。

8月

20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西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0月4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总参谋长。

9月

28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驻甘绥靖公署成立,朱绍良任主任,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撤销。

是月 在兰州设立无线电台,安装功率500千瓦电台1座。

△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机关报《西北日报》在兰州创刊。至1949年8月21日兰州解放前夕停刊。

10月

18日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部攻克合水县城,歼敌200余人。

11月

3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成立红42师;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一、二、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8日 红42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下辖3、4两个团,王世秦任3团团,黄罗斌任政委。

是月 合水、庆阳游击队成立。

12月

1日 邓宝珊任国民党政府新1军军长,在兰州就职。

26日 国民党甘肃省改拉卜楞番兵司令部为拉卜楞保安司令部,黄正清任司令。

是月 据调查,兰州时有西医师35人,药剂师38人,中医35人;公私医院10所,床位74张;西药房10处、中药铺30处。

△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成立。并先后在天水、酒泉、武威、岷县、平凉等县设立机构。

△ 中国国医馆甘肃分馆开办国医研究会,推举柯与参、王钧臣、王翼之常务理事。同时编印《中医月刊》。

是年

△ 年底,习仲勋在南梁开展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宣传革命真理,在南梁金岔沟组成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在四合台村建立了南梁山区第一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并发展农民武装。

△ 马步青在武威县城三皇台建立电灯厂,安装1台12千伏安蒸汽发电机组,1945年停办。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

1月

8日 红42师师长王泰吉调职,刘志丹继任师长,下旬师党委在合水连家砭召开会议,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

2月

25日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成立。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由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3月

12日 中央特派员吴越向中共中央呈送《西北工作报告》,概述了甘宁青特委工作情况、领导方式,初步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

14日 国民党政府颁给拉卜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辅国阐化禅师”称号及册印。

22日 国民党甘肃省令全省分三期筹设县参议会,限9月底完成。

26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永昌设立马场。

是月 蒋介石调集8个团1万余兵力,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魂第一次“围剿”,刘志丹率红42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转至外线作战。4月2日,在合水县西华池歼灭王子义团的两个营及团直机枪连600余人。

△ 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在华池荔园堡寨子湾成立。设立造币厂,发行用布制作的“苏币”。当年发行的面值分1角、2角、5角三种;1935年又发行面值1元的。种。同时,发行“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券”(1元苏币兑银元1元),为了苏币便利流通贸易,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明令禁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和地主豪绅的“帖子”等货币在苏区流通,并在荔园堡设立了贸易集市,为促进根据地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条件。

4月

13日 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由杨虎城陪同来兰州视察。

△ 国民党甘肃省制定修筑甘陕、甘新、甘青、甘宁、甘川(二条)六大公路干线工程计划。但一直未完全修通。

5月

5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布特派大员巡视地方制度。派宋子文到兰州巡视。

10日 国民党甘肃警备第2旅驻宁县一个团和陇东民团谭世麟部1000余人,窜入南梁根据地,烧杀抢掠。仅在华池县阎洼子村等地就活埋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

22日 红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陕甘边特委工作,张秀山任书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42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6月

是月 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在甘肃甘坪寺设立畜牧改良场。选育优良羊种千余只、牦牛百余

头、马 60 余匹。并在兰州设通讯联络处。

△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庆北（今华池县中部地区）办事处成立。同年 12 月成立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时撤销。

△ 国民党甘肃省府，从本月起办理保甲制度，限至 1935 年 9 月底分四期完成。

7 月

28 日 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红 26 军 42 师党委在阎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回顾了南梁根据地创建以来的革命斗争，研究了今后工作。同时，陕甘边特委还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巩固与扩大红军，普遍开展游击活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任务。

8 月

1 日 西北防疫处在兰州成立，设兽医门诊部，并制造兽用血清疫苗。

9 月

18 日 国民党甘肃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兰州成立。

△ 国民党政府甘肃农民银行在兰州成立，第一期资本 25 万元。后奉财政部令停办。

是月 兰州商人张宜伦等集资 10 万元，创办华陇烟草公司，甘肃首次生产机制纸烟。

△ 国民党甘肃省府拨款 30 万元，恢复兰州织呢厂（前甘肃制呢厂）。生产各种呢毯，主要供应西北各地驻军之需。

10 月

9 日 国民党甘肃省第一次县长会议在兰州召开。主要议决内容有：皋兰等 13 县先行建立保甲；训练行政警察队，令各县实行强迫男子剪发、女子放足等。

20 日 地方武装郭宝珊率所部 120 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进入庆北苏区，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任司令。

是月 月初，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在华池荔

园堡成立。先后举办 3 期培训班，共培训军队、地方干部 200 多名。

11 月

4 日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扩大红 26 军、巩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及发展群众武装与深入土地革命等决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主席，朱子清任总指挥。

△ 华池县荔园堡的转嘴子创建了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所新型小学——列宁小学，贺建德任校长。学生免费上学。

是月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在南梁何沟门成立。

△ 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县紫坊桃树咀成立。

12 月

21 日 兰州至银川长途电话正式通话。

是月 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公布，1933 年底止，甘肃造林株数为 44.169 万株，全省森林面积 2.2851 亿余亩。

是年

△ 甘肃境内第一个黄河水文站在兰州设立。

△ 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创办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创办机关刊物《红色西北》。

△ 据统计，甘肃全省本年种植大烟 49.3315 万亩，鸦片产量达 148 万两。

△ 夏镇原县平泉青年农民王子厚、联络南三镇 400 余人围攻县衙，抗捐抗税。

△ 共产党员柴宗礼组织西北人民自卫军，在榆中、陇西、渭源、定西、天水一带活动。

△ 共产党员江致远、刘贯一利用关系，先后到兰州西北日报社任社长和编辑，在报社建立党的特别小组，从事地下工作。次年秋，特别小组遭破坏，刘被捕。

方志学家傅学礼生平考述

杜志强

傅学礼(1496-1565),字立之,号彭原,甘肃庆阳人,嘉靖五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是古代甘肃优秀的方志学家,其《(嘉靖)庆阳府志》二十卷是今存寥寥可数的明代甘肃府志之一、最早的庆阳府志。不过傅学礼生平却鲜为人知,不仅史书,就是地方志也不为立传,学人在介绍《(嘉靖)庆阳府志》时,有些记述为“生平事迹未详”[1],即使是当代学人整理该志,对其生平也只是一语带过[2],这是令人遗憾的。今检十六卷本《赵浚谷集》,其中数篇诗文提到了赵时春与傅学礼的交往,还有一些专门记载傅学礼生平的资料,如《寿傅宪使叙》、《祭傅彭原文》、《傅彭原墓志铭》等文。根据这些资料,足以较为详细地描述傅学礼的生平;但目前相关研究着尚未关注到这些资料。兹依据赵时春的记载,结合其他资料,分阶段考述傅学礼生平,及其与赵时春的交往,并附带考察《(嘉靖)庆阳府志》的著录情况。

一、傅学礼生平、仕履

(一)家世与出生

傅学礼高祖傅亨,曾祖傅森,均耕田养家;祖父傅得才被选为府吏,仕至巨鹿县主簿;父亲傅杰赐封给事中,母亲王氏赐封宜人。据赵时春记载,傅学礼先世仕元,坟墓在“故彭原县之东,每祭必焚羊首,可测其族类矣”[3],可知傅氏世代居住于彭原县城附近,这也是傅学礼号“彭原”的原因;彭原为中古时期的陇东重镇,故址在今庆阳市西峰区彭原乡东部,汉宋之间一直是州县治所,元初废。至于傅氏“每祭必焚羊首”的习惯,应当不是汉

族的祭祀风俗,联系起他们“先世仕元”的经历来推理,傅氏应当不是汉族血统;赵时春也说“可测其族类”,可见他对傅学礼的“族类”也心中有数,只是用了委婉的方式表述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傅学礼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地傅氏就没有关系了。

傅学礼生于弘治九年(1496),正德十四年(1519)中陕西举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位列三甲第一百七十一名[4],同举进士的还有邻郡平凉的该榜会元赵时春,同乡、同榜、同朝为官的经历,使二人定下了一世交情,子女通婚,往来频繁。

(二)在朝为官时期

根据《墓志铭》记载,傅学礼在中进士后的十五年间先后担任八任京官,级别均较低,其大致过程是:

1.任行人司行人。明中期行人司长官正七品,行人正八品;傅学礼最有可能任的职务是行人。

2.任刑部给事中。任职行人司三年后,“为刑部给事”。按:“刑部给事”应指刑部给事中;明代六科给事各设都给事一人,正七品,下设给事中若干人,从七品;傅学礼由正八品的行人升为从七品的给事中。这期间,他与同榜进士屠应竣有交往,屠应竣是刑部尚书屠勋之子,其《兰晖堂集》卷三有《赠傅封君,时封君在京师,与其子给事学礼同陞谢》一诗:“之子登青琐,分章下紫房。拜恩同礼数,侍从有辉光。世济衣冠盛,朝分剑佩行。过庭论谏草,持以报君王。”这应当是傅学礼父亲被赐封之后,屠应竣写的祝贺诗。

3.外贬为清丰县丞。《墓志铭》云：“余先以言忤太宰汪公，除名，后公为刑部给事，舆论病太宰，太宰遂肆黜言官，谪公清丰县丞。”赵时春所言“太宰汪公”指吏部尚书汪鋐，是大礼议中坚定支持张璁的人，因大礼议而被朝廷舆论所不满，于是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汪鋐大肆贬黜言官。由此推理，傅学礼在大礼议中与赵时春一样，都不赞同汪鋐、张璁。赵时春罢官在嘉靖九年，则傅学礼之贬当在嘉靖九年略后。清丰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县丞为正八品。

4.守丧。嘉靖十四年，傅学礼奔父丧，守丧三年。

5.任国子监助教。嘉靖十六年，傅学礼为父守丧期满，出任国子监助教，级别从八品。这期间，赵时春于嘉靖十九年任翰林院编修，未满一年，即因上书被罢官。

6.任工部都水主事，时在嘉靖二十一年，官阶为从六品。

7.任户部员外郎，时在嘉靖二十四年，官阶为从五品。

8.任兵部武库、武选郎中，官阶为正五品。此次晋升，是吏部尚书熊浹荐举的结果；时间当在嘉靖二十四年，因为熊浹此年年底罢官，由此可知，傅学礼任户部员外郎时间很短即迁升。

9.守丧。嘉靖二十五年奔母丧。

10.任礼部精膳郎中。服丧期满，于嘉靖二十八年任礼部精膳司郎中，官阶正五品。

可以看出，傅学礼任京官时期仕履迟滞，十五年中从八品迁升为正五品，中间两次奔丧，还被外贬为县丞。

(三)任地方官时期

1.任山东按察副使。嘉靖二十九年，傅学礼官居五品已五年多，遂被提升为山东按察副使，正四品。本年，赵时春被第三次起用，任兵部职方主事；次年，赵时春任山东德州民兵佥事，与傅学礼同时任职于山东，遂定儿女婚姻，傅学礼之子傅中聘赵时春仲女。嘉靖三十一年，赵时春升任山东兵备副使，有《书寄傅郎》一诗，是寄给傅中的，诗云：“甲

榜同而父，忧违二十年。典兵瞻泰地，持宪浴沂天。重结诗书好，夙将道义光。已欣春澹荡，犹怅隔风烟。”[5]卷五

2.任山西布政使参政。时在嘉靖三十一年，官阶从三品。次年，赵时春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二人又同官于山西。这期间有一件事情埋下了傅学礼被罢官的根源：大同镇军饷涨价，大同巡抚侯钺要求山西巡抚赵时春接济，赵时春主张给粮，而参政傅学礼则坚决反对，最后赵时春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即山西境内距大同近者输粮，远者输银，解决了这一争执。巡按御史因此弹劾傅学礼，严嵩对赵、傅二人均不满，于是他们很快被罢官。

3.任湖广按察使，官阶正三品；时在嘉靖三十二年秋。有意思的是，傅学礼冬天刚刚上任，即被罢官归里，其原因当与他在山西参政期间拒绝接济大同军饷有关。表面上看，从从三品升至正三品，官阶增高，但不阅月而罢，显然这是对即将罢官的人的一种荣誉退休手段。赵时春亦于三十二年冬战败，次年春天“以原职回籍听调”[6]，二人再次相继回乡。

傅学礼四年间三任地方官，居正三品，级别不可谓不高，可是相比较而言，赵时春任职的巡抚尽管官居四品，但因带都察院衔，且有节制三司的权力，所以不论是实权，还是影响，都要比傅学礼大。傅学礼在地方官任上没有特别突出的政绩。

(四)罢官家居时期

嘉靖三十二年初春，傅学礼、赵时春先后回到庆阳、平凉，之后他们交往频繁。嘉靖三十四年，傅学礼六十寿辰，赵时春作《寿傅宪使叙》一文，在祝寿的同时，赞誉其“自持以正”“内无所愧”的气节。三十五年，赵时春作《寄傅郎守中》诗三首，中有“一别三年久，相望两地赊”[7]，应当是指从三十一年山东见面之后的三年多时间内未见面。

嘉靖四十年春，傅学礼偕傅中一起赴平凉为傅中娶亲，居住一个多月后返回。同年五月，赵时春母亲去世，傅学礼作祭文哀悼，其文已佚。嘉靖四十三年，赵时春前往庆阳，拜谢、探望傅学礼，居

月余而归。

嘉靖四十四年春，傅学礼七十寿辰，赵时春作《寿傅彭原七十》诗二首，并派长子赵守岩赴庆阳祝寿，可是赵守岩还没有到达庆阳，傅学礼就去世了。赵时春遂作《祭傅彭原宪长文》，并应傅中之请作《明湖广按察使彭原傅公墓志铭》，在记述傅学礼生平的同时，赞许其人格，对其人生际遇也表示了深深惋惜。其子傅中“少俊，能文而遭家贫艰苦，其族兄守德实左右之”，可见，傅学礼身后也是清贫、冷落的，这可能也是其诗文没有刊印的主要原因。赵时春在《墓志铭》中没有提傅学礼的著述情况，令人遗憾。

二、傅学礼与《(嘉靖)庆阳府志》

傅学礼主纂《(嘉靖)庆阳府志》二十卷，其流传过程颇为曲折。由于在傅学礼之前有韩鼎修纂的《(正德)庆阳府志》，所以《明史·艺文志》只著录韩鼎《庆阳府志》十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为：“王福等重修《庆阳府志》，嘉靖间。”[8]张维《陇右方志录》著录为“嘉靖重修《庆阳府志》四册”，注云：“佚，明嘉靖三十六年庆阳王福等修。”[9]按：黄虞稷、张维的著录是错误的，《(嘉靖)庆阳府志》修于嘉靖三十六年，该志今存于日本东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藏有胶卷，修纂者是梁明翰、傅学礼等人，王福没有参加，王福参加的是陈震、王福修纂《(成化)庆阳府志》，该志早佚。

后来，张令瑄系统纠正了目录书关于傅志著录的错误。张令瑄是张维之子，1988年他见到了《(嘉靖)庆阳府志》的胶卷，遂在《三陇方志见知录》中对于庆阳府志进行了详细考证，足以补其父《陇右方志录》中的错误。根据张令瑄的考察，《(成化)庆阳府志》是周时雍修，王福、陈震纂，《(正德)庆阳府志》为韩鼎修纂，期间傅学礼曾为韩鼎誊录全稿，张鹏翰曾为润色文稿，《(嘉靖)庆阳府志》为梁明翰修，傅学礼主纂，张旗、孙倌、徐登等人参撰，时在嘉靖三十六年，傅学礼罢官回乡刚满三年；该志以韩鼎志为底本，增补润色而成。这个结论可以成立，因为《(嘉靖)庆阳府志》前有成化、正德二志的序，末尾有傅学礼《后记》，这些都是可据

以考察的具体资料。

有意思的是，《(嘉靖)庆阳府志》后附录张鹏翰之子张旗《后记》一文，该文大力表彰张鹏翰在修志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傅学礼《后记》对张鹏翰只一语带过的表述明显相悖。今天来看，张旗《后记》有为父邀功的嫌疑，张鹏翰当时年事已高（张鹏翰为正德六年进士，假定他中进士时年二十，那到嘉靖三十六年他已六十七岁了），应当不适宜参纂或主纂府志，故让其子张旗参纂；《(嘉靖)庆阳府志》的主纂者应是傅学礼。至于傅学礼《(嘉靖)庆阳府志》的优点与不足，张令瑄有很好的分析，兹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 [1]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下册)，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 [2]傅学礼等纂、庆阳地区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整理《(嘉靖)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 [3][6]赵时春《浚谷文集》十卷，明隆庆刻本。
- [4]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5][7]赵时春《浚谷诗集》六卷，明隆庆刻本。
- [6][8]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9]张维《陇右方志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三辑第二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

兹附录赵时春《明湖广按察使彭原傅公墓志铭》原文：

明湖广按察使彭原傅公墓志铭

呜呼，余忍执笔铭吾彭原公哉！公以弘治丙辰生于庆阳，余以后公十三岁生于平凉，古为同郡。公以正德己卯举，余以嘉靖壬午举，相继以诗魁本乡，丙戌遂同举进士，公为行人司官京师，盖无朝不同者三年。余先以言忤太宰汪公，除名，后公为

刑部给事，舆论病太宰，太宰遂肆黜言官，谪公清丰县丞。乙未，丁封君忧；此岁，余哭先翰林，遂同忧。公以丁酉稍迁国子助教，间一岁，余为编修，其再起又相先后。余再废者又十年，公乃以壬寅迁都水主事，乙巳进户部员外郎。太宰熊公察廉，称其贤于朝，迁兵部武库、武选郎中。丙午，丁太宜人忧。己酉，复为礼部精膳郎中。庚戌，以久次升山东按察司副使，余亦三仕为兵部职方主事。次岁王正，遂僉公司事。公一子中，遂聘余仲女，数拜先太孺人。壬子，同公为副使，冬末，公迁山西参政，余以癸丑二月巡抚山西，秋暮，公迁湖广，冬甫及任，遂去，余亦以其时俟代。甲寅春初抵家，又同也。辛酉春，公以中来取女，及拜先太孺人焉，阅月而归。未几而予哭先妣，公为祭文寄哀焉。甲子闰月，乃往庆阳报拜，亦阅月而归。乙丑惊蛰日，公年登七十，三月八日余为诗寿公，遣长子守岩往拜。十二日，暮宿镇原，乃闻公以是戌无疾化去矣。婿中乃以公墓室勒文来请。

呜呼！稽公与余交好之笃如此，虽哀不能文，其文安忍辞！按公常言，其先世仕元，有号平章，虽失世系，然坟次具在，去府南九十里，故彭原县之东，每祭必焚羊首，可测其族类矣。公号彭原，不忘本也。今公乃与配骆宜人葬府南十里蒲川右山之上焉。彭原省入安化，故为安化之北管人。高祖亨，曾祖森，皆隐田里，大父得才选为府史，有才能，仕至鉅鹿主簿。父杰，以公封给事，母王，封太宜人；是生公。

公性安静，然乐善嫉恶本于天性，而发言必信，以故爱惜善类，必明辨小人之所以中伤者，又荐达之不少置，沉浮三十年，公论归焉。故蹶而复兴，其在工、户、武库，出纳唯谨，绝侵耗，武选少革抑曰：“彼先世以身殉国者也。”山西督粮，值大同军饷踊贵，巡抚侯公奏请山西输粟，余欲与之，公坚持不可，巡按御史深不乐余，反病公。余乃定以州县近五百里者输粟，五百里之外输银。盖边人饶田，牧运纳近易而银难得，平潞道远，业商贾而银易致，且边军兼得粟银，则食与用交足，军民具利也，故监司侯皆报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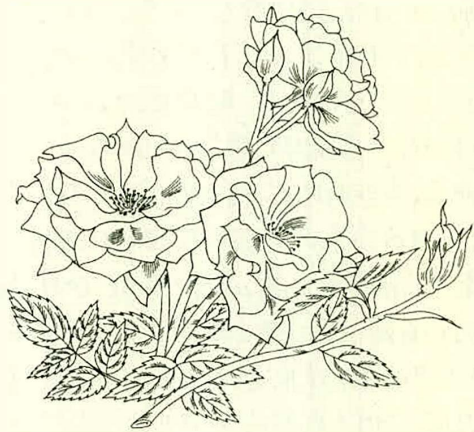
御史颇郁郁。余置便门于台侧隙地以练兵，莅台事则启台门而扃便门，暇治兵即启便门而扃台门。公偕内人拜先妣，必由便门，议者弗察也，意其必由台中门，遂以两端劾公，太宰李公、元辅严公方忌公与余，故相次罢去，犹以余虚名动人，但听调而已。

公未没之先三日，昼见绛衣使召置南岳，遂辞谢阖城人。其日饮，县官拜所奉神，先祠毕，阖门独寝而终。家素无所蓄，终亦不及家事。呜呼！死生之际大矣，唯不戢于人伪者知之；如公之所存可易能哉！公初娶于骆，次娶于黄，娶连皆无子，乃纳侧室王，王生子中，中卜以是年冬暮归公于大宅。中少俊，能文而遭家贫艰苦，其族兄守德实左右之。女长适潼关指挥使孙某，早寡而有子，其志操可称，故少傅虞坡杨公以女妻之。仲适游击将军刘世贞，亦哭公，未几而没。次适某，咸早没。以中之才，所遭如是，必振励攻苦以大其门，余之望也。铭曰：

天与之，人夺之，终必予之。实为善，名为恶，终必无恶。非耶？是耶？何四十年之久而一朝异耶？文胡为乎？君子于存亡去就之际亦何易乎？

《浚谷文集》卷十

（杜志强，甘肃静宁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献、陇右文献研究，发表过专著《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



甘肃辛亥革命领袖——慕寿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联合会党举行起义。与陕毗邻的陇东、天水等地人民奋起响应。原陕甘总督升允从长安逃到平凉（后赴兰驻总督府）与时任陕甘总督长庚勾结，联合甘肃满族贵族和封建官僚、军阀，聚集反革命力量顽固对抗，并致电清政府忠心“勤王”，组织“勤王”之师，企图迎清帝来兰州偏安西北。这样就形成了甘肃在辛亥革命史上反动封建势力与民主革命势力激烈斗争的特殊局面。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中，涌现出了一批如黄钺、王之佐、李镜清、慕寿祺、水梓等领袖人物。近年，在甘肃近代史研究中，慕寿祺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和贡献往往被他的学术成就所湮没。先生不但是近代甘肃的一位学者，而且是甘肃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

慕寿祺，字子介，号少堂，镇原县平泉镇古城山人。生于1874年11月12日，卒于1947年12月3日，他是甘肃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博古通今的知名学者。他出生于书香之家，父慕璋，清光绪时举人，历任宁夏固原学政、西宁教谕、宁灵厅教授。寿祺赋性聪颖，勤奋笃学。幼随父读书，受到良好教育。

1903年考中举人，次年被甘肃高等学堂聘为历史主任教员兼经学分教。1908年赴京考职，以“二等试用”签分四川试用盐大使，未赴任，同年以劳绩保荐知县分发山西，再次辞任，仍供教职。由于他教学成绩卓著，在学界声名远播，全国教育联合会遂委派他去东南各省考察学务。他在北京、天津、武汉及浙江、荆楚、齐鲁等地拜访名流，关注时政，目睹列强横行，朝廷腐朽软弱和东南各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坚定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志向，亲自参与所到各地教育界反帝反清斗争。途径安

徽时结识了张掖举人、候补同知王之佐，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遂经王介绍加入同盟会，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回到兰州后，向甘肃教育界提交《调查录》8卷，针砭旧教育积弊，提出一系列改革方略，其真知灼见被甘肃教育界同仁誉为“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

1910年，甘肃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寿祺顺应时势，欲从法制入手，弃教执法，出任兰州地方审判厅刑庭主任推事，考取甘肃省第一届最优等法官。是年，清廷为形势所迫，就国体颁发“诏征国民意见书”，甘肃省封建官吏中的顽固势力操纵舆论，反对共和，诬陷革命党人。在一次集会上，寿祺拍案而起，痛斥顽固派，致书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提出实行共和的六条主张。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就大势所趋而论，宜改为共和政体，与东南各省合而为一，为陇上民主进程放一线光明。虽未奏光复之功，实已明改革之理，使后世羲轩桑梓亦有人焉。”

1912年2月，陕甘总督长庚封锁消息，对清帝退位诏书秘而不宣，继续坚持进攻陕西国民军。寿祺多方奔走，倡导建立甘肃省临时议会，26日集结兰州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王之佐、邓绍元、水梓、聂景阳、马福祥等28人，在甘肃政法学堂集会。形成三条决议，要求总督长庚宣布共和，停止攻陕，采用民国年号和公元纪年。在水天甘肃临时军政府和省内进步人士及民众的压力下，兰州遂于3月15日通电承认共和，24日，甘肃临时议会在兰州文庙教育会旧址举行成立大会，推举临洮人李镜清为议长，刘尔忻、张林焱为副议长，慕寿祺等30余人为议员。甘肃布政使赵惟熙窃取甘肃都督后，向袁世凯进谗言，诬陷天水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黄钺“为匪为逆”，调集军队讨伐。寿祺力主

正义，联络议会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竭力呼吁“黄钺此举为促进共和，与无故捣乱者不同”，终于在议长李镜清、天水士绅张世英等调停下，使这一事件和平解决。

1912年4月，寿祺与邓绍元以“开通风气，启迪民知”为宗旨，捐资邮购京、津、沪、汉、穗等地出版的《民报》、《革命军》等进步报刊，在兰州庄严寺（今兰州晚报社）开设阅报社，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日日盘桓其间，“好之如饥渴”，“深宵赶读者颇不乏人”，打破了甘肃封闭沉闷的政治空气。议长李镜清因办事认真引起当局忌恨，仅任职4个多月即被反动当局密谋追杀于临洮老家，政治环境顿呈险恶，全省震惊，议员人人自危，纷纷离省躲避。寿祺义愤填膺，即刻联络在兰议员致书省都督府，要求严惩凶手，亲自起草文告，谴责反动政客卑劣行径。并召开公祭大会，亲书挽联“身后真诚烈士传，抚今追昔，足令我辈心寒，万里怀长城，叹英雄草草收场往事空怜檀道济；陇头渐开自由花，即果溯因，都是先生手种，十年同树木，看大家翩翩莅会无人不念李临洮！”寿祺挥泪宣读祭文，揭露当局“今则报章虚构事实，酿成鼓吹之官场”，“鹬蚌相争，甘送渔人之利”，“处处金戈铁马，耗尽小民之脂膏，时时手枪炸弹，了却伟人之性命”。寿祺侠肝义胆，远见卓识和追求民主的大无畏精神给时人以极大鼓舞。

1913年寿祺出任甘肃省公署秘书长、民政署秘书长等职。同年10月，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中国国民党议员资格，袁为拉拢寿祺，在致甘电报中称寿祺为“甘肃国民党领袖”，寿祺不为所动，遂招袁忌恨，1915年1月罗织罪名，密令甘肃省高等检查厅拘押慕寿祺进京，交军警执法处审讯。寿祺通晓法律，驳斥所诬罪状，力陈古今兴亡之道，共和必成，民主必行，帝制必亡，博得法官同情和敬仰，认为他是饱学之士，匡国良材，绝非投机政客，作恶营苟之徒。加之兰州、北京舆论哗然，朋友多方营救，军警执法处遂于6月宣布“人甚和平，无罪释放”。次年回兰即被排挤出政界，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兼国文教员。1921年春，任甘肃公署第三科科长，10月，甘

肃省第三届议会改选，寿祺当选为副议长，1924年4月，省议会派寿祺列席北京参议院会议，常期驻京，次年任善后会议代表、参议院参政，为甘肃争取英国庚子赔款奔走。

1929年任甘肃通志局总纂，出任甘肃省政府顾问，先后弹劾贪官污吏1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寿祺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倡言“共产党学说创自马克思，继之以列宁，遂轰动全球”，“共产党所至之处不妄杀人，已而称红军，其宗旨以联络中国国民党及各界一致抗日”，“国共合作乃秦越一家，同心救国。”寿祺的进步言论受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赞赏。1945年4月，他主持创办《拓报》，宣传民主进步思想，颇受读者欢迎。

寿祺博古通今，最喜以文会友，常与有识之士往来，爱字善写，联诗对句，畅谈古今，评说中外，苦读经史，著书立说。以他主笔，与焦国理等合纂《重修镇原县志》共20卷，比较客观完整地记载了镇原民国以前的历史。他还著有：《甘宁青史略》（40卷）、《经学概论》讲义、《小说考证》、《十三经要略》、《求是斋集句诗抄》、《求是斋丛稿》、《西北道路志》、《歌谣汇选》、《陇上同名录》等29部之多。他在甘肃有“学富五车，才储八斗”之赞，且家中藏书甚多，1952年其家属向甘肃省人民政府捐赠各种图书数万册。

寿祺集政治、军事、学术才能于一身，终未能一睹新中国之曙光。1947年12月病逝于兰州，安葬于兰州龚家湾南坪，终年73岁。2002年族人迁先生及其家属遗骨回原籍安葬，并刊石树碑。



甘肃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 就业援助保障工作纪实

赵淑琳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文县、康县、成县、徽县、西和县、两当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人力资源系统办公设施、设备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影响到正常工作的开展。一些企业厂房、设备、生产原料因地震造成的破坏,停工停产,造成部分企业职工下岗失业。

5月14日,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迅速行动,建立抗震救灾工作机制,全面安排部署了全省劳动保障系统抗震救灾工作,下发《关于全省劳动保障系统支持地震灾区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对口支援陇南市、甘南州劳动保障部门开展抗震救灾工作;要求灾区劳动保障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及时了解掌握本系统受灾情况,认真落实受灾群众的有关劳动保障优惠政策;要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认真做好抗震救灾期间的农民工工作。

5月15日,甘肃省劳动保障厅制定下发了《关于在抗震救灾中全力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受灾地区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保障因灾受伤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障待遇,切实做好抗震救灾期间的工伤认定和待遇支付工作,

积极为受灾群众提供免费职业培训和小额担保贷款,优先安置受灾的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认真做好农村受灾人员转移就业工作。要求灾区劳动保障部门要尽快摸清在本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及伤亡情况,想方设法解决好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对有返乡意愿的灾区农民工,要积极提供交通上的便利,保证他们顺利返乡;对灾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要协调有关部门照顾好其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生活。全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大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力度,及时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为了做好甘肃省地震灾区就业再就业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甘肃省制定了地震灾区就业援助工作具体方案。主要内容有: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灾后重建工作,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灾区就业援助,维护灾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权益。为受灾对象提供就业援助和就业服务,帮助实现就业再就业。援助对象为地震受灾的城镇企业职工、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未就业人员、新出现的零就业家庭人员、失去土地农民、进场务工农村劳动者以及其他急需援助的失业人员。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陇南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矿山冶炼企业停产,部分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停业,造成部分人员失业,城镇企业职工、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未就业人员、新出现的

零就业家庭人员、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急需援助，全市共有地震受灾的城镇企业职工 1981 人，未就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13000 人，新产生零就业家庭 621 户，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 12053 人失业。

针对出现的大量失业、就业困难的严峻形势，陇南市劳动保障部门按照“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就业援助”的工作思路，制订了具体方案，采取了有力措施：一是成立了市就业援助领导小组，建立了就业援助工作“一把手”责任制，确定分管局长和主办人员主抓灾后就业援助工作；二是市、县（区）就业服务机构开展了对新产生的失业人员、企业因灾停产停工职工人数、地震造成的失地农民、新产生的零就业家庭等情况的摸底调查，同时，对受灾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建立了台账，实行了动态管理；三是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提高失业人员技能和就业能力；四是开展职业介绍工作，为失业人员寻找就业岗位，举办了大型招聘会，扩大异地就业，与深圳富士康等 81 户企业签订了用工协议；五是开展劳务派遣，与陇南市移动公司、电信公司、烟草公司等 12 家单位和企业签订劳务派遣合作协议，派遣受灾人员从事驾驶员、营业员、话务员、投递、后勤等工作；六是落实小额担保贷款，为地震失业的城镇企业职工、未就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新出现的零就业家庭人员发放小额担保贷款，鼓励和扶持他们自主创业；七是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按照省厅要求把就业困难人员（不含志愿者）正在参与的抗震救灾工作，如卫生防疫、伤员看护、物资搬运、抢险抢修、环境清理、雇工、治安维护等纳入公益性就业岗位认定范围期限三个月；八是认真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五补贴”政策，为受灾的就业援助对象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职业介绍，积极鼓励扶持单位和企业开发公益性岗位，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

甘南州也积极部署地震灾区就业援助工作。为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中的舟曲县就业援助工

作，2008 年 5 月 31 日，甘南州劳动保障局、财政局联合成立了地震灾区就业援助领导小组，制订就业援助方案，建立就业援助责任制。劳动保障和财政局主要领导，深入灾区“援助对象”较多的企业和社区，实行“一对一”援助，及时为受灾群众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明确就业援助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列支，由财政部门实行专户管理。舟曲县政府制定了舟曲县震灾就业援助工作具体方案和成立了震灾就业援助领导小组。

二

通过积极的就业援助政策，陇南市从汶川大地震后到 2009 年年底，共开发公益性岗位 2478 个，安置就业援助对象，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 1291.3 万元；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1141 人，落实培训补贴 1421.64 万元；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6929 人，落实鉴定补贴 167.83 万元；开展职业介绍 45367 人，落实职业介绍补贴 632.35 万元；共有 33 户企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960.4 万元；为 2882 名受灾人员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507.25 万元；共派遣 690 多名受灾人员到该市 12 家大型国有企业和省属行政事业单位就业；安置新出现零就业家庭 621 户，实现了动态清零。

陇南市还对受灾地区促进就业实施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即：受灾地区的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实体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招用当地因暴洪灾害失去工作的人员，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按实际招用人数和实际工作时间予以定额每人每年 4800 元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甘南州按照就业援助方案的要求，2008 年 6 月，经舟曲城关镇东、西城社区摸底登记，共登记受灾的就业援助人员 355 人，其中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 192 人，企业下岗职工 91 人，城镇退伍军人 5 人，新增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67 人。7 月上旬，按照登记人员的就业求职意向，安排 155 人

由城关镇管理,为城关镇受灾群众搭建活动板房,帮助受灾群众开展灾后自救和重建家园;安排200人到环卫队,由环卫队管理,到城区开展各街道环境清理和环境卫生保洁,时限为3个月,月岗位补贴540元。8月底为每名援助人员发放岗位补贴1620元,总计发放57.51万元。

2008年6月下旬甘南州为鼓励受灾劳动者自谋职业,投放担保基金20万元。7月份为47名下岗失业、领取《再就业优惠证》、从事国家规定微利项目个体经营人员发放小额担保贷款94万元。总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00万元,财政贴息3.86万元。

2008年6月份,舟曲县为3户企业370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共计87万元。其中县粮贸公司153人,发放失业金43.45万元;供销社51人发放失业金14.75万元;铁合金厂143人发放失业金20.5万元;其它单位11人发放失业金7.9万元。2008年累计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153人,其中上半年安置97人、下半年安置56人。均安置在环卫队,从事城区环境卫生保洁工作。2008年舟曲县继续落实“4050”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对已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失业人员,达到年龄条件的128名“4050”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28.365万元。

2008年为帮助受灾乡镇劳务输转和农民工技能培训,劳动保障部门扶持舟曲县曲瓦、大川、大峪等乡开展药材种植、土木建筑瓦工等技能培训资金5万元,培训农民工和药材种植户300多人。扶持县职教中心举办家电维修、农用车维修、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资金3万元,培训失业青年和农民工108人。扶持龙舟大酒店举办培训酒店管理、客户服务、餐厅服务、保安培训班一期,培训城乡失业青年200人,扶持资金4万元。

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陇南文县劳动保障局与深圳市联合举办远程“见工”招聘会。大地震中,文县是陇南市受灾最严重的县。地震发生后,文县劳动保障局积极与外地用工单位联系,组织城乡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积极开展灾后生产自救。2008年6月16日,文县劳动保障局与深圳市联

合举行了远程“见工”招聘会,全县140名大中专毕业生、职业中学应届毕业生和城镇失业人员利用地震后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对口援建的远程“见工”网上招聘系统,与深圳三家企业在系统视频上直接进行了洽谈,有70名求职者被现场录用。

地震也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造成影响。为了帮助甘肃省地震灾区大中专毕业生充分就业,河北、辽宁、山西、新疆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积极开展了就业援助行动,动员用人单位挤出就业岗位。其中,来自河北省的128个用人单位计划提供200个就业岗位。首批来自甘肃地震重灾区陇南市的52名高校毕业生拿到了他们的就业合同书,进入对口支援甘肃灾区就业的河北省各大企事业单位工作。山西省193个用人单位计划提供1072个就业岗位。此外,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部门签订了协议,组织100名甘肃地震灾区的高校毕业生到新疆就业。此次就业援助计划采取双向选择,由毕业生自愿报名,用人单位考察毕业生的档案,最终确定人选。

在拓展省外就业渠道的同时,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人事部门连续三年扩大政府购买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的数量,主要用于扶持受灾严重的陇南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实现重灾区大学毕业生全部就业。

此外,甘肃省选拔高校毕业生从事“三支一扶”和“进村(社区)”服务计划政策也向陇南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倾斜,2008年陇南市计划增加300名,甘南州计划增加70名。两市州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和“进村(社区)”计划,可以不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由所在市县根据需要直接考核配置。

2008年9月18日,对口援助陇南市的深圳市在陇南举办“广东深圳·甘肃陇南劳务合作招聘会”,现场签约4097人。

2009年4月23日,甘肃和深圳联合在甘肃地震灾区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举办了对口就业援助劳动合作招聘会,深圳市30家企业提供18249个就业岗位,平均工资达到1600元,以实际行动帮助地震灾区完成重建。

自2008年7月甘肃省人民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对口就业援助协议以来,目前已启动实施了3期对口就业援助。通过两省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劳务工作机构的精心筹划,通力合作,截至2009年2月底,共安排组织甘肃省近8000名灾区劳动者赴深圳就业,为扩大灾区就业,弥补群众受灾损失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省内未受地震影响的甘肃省平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伸出援助之手,2008年8月30日,平凉人社局所属的亚东技校和扶贫技校分别面向灾区招收100名、80名未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进入扶贫技校,接受为期1—2年的技能培训。主要开设数控车工、电子计算机、电焊、厨师、美容美发等专业。在校学习期间,免收学费、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由学员自理。

三

陇南市小燕子家政服务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春英对陇南市(区)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她说,“5·12地震”后,我们小燕子家政服务公司在市、区劳动部门的支持下,把特别困难的零就业家庭人员吸收到我们公司,帮助他们介绍工作,增加他们的收入。上级部门也给我们一些政策的支持。我们2008年到2009年培训的零就业家庭人员每人政府部门都给予300元的培训补贴。这些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一部分已经被输送到北京、深圳等地进行外出务工,一部分在本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率达到了85%以上。2010年我们又培训了484人,根据本人意愿,本地安排了84人,其余400人都被输送到了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这些人的平均培训费用是人均900元左右,除政府补贴的300元外,其余的全由公司解决,参加培训的人员不用掏一分钱。没有政府部门的资助,我们不可能培训、输出这么多人。

陇南金道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王虎有对政府对劳务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中心成立刚两年,专门做劳务输出,“5·12”地震后,农村因房屋倒塌、开裂,修房盖房,资金紧张,我们就下村

下社联系这些群众,外出就业挣钱。市上和区上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强。这两年,从我们这里成功输出的就有1100多人,我们输出劳务一人,劳动保障部门给我们补贴资金是150元。经过我们的回访,输出的劳务工资很好,利润也好,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满意。多亏了劳动局及市上的支持。

一些得到就业援助再就业的下岗人员,也对政府的就业援助政策很满意。原陇南市植物油库的下岗职工芦娟说:“我现在从事个体职业。地震下岗之后,2008年市劳动局再就业促进中心给我们下岗职工提供了一笔小额贷款,对我能从事个体劳动有一定的帮助。2011年的销售额预计能有20多万元。我返还了到期的5万元贷款,政府对于返还及时的经营者继续使用贷款。不管是领导还是工作人员,对我们都非常关心。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陇南市渔业站的下岗职工祁丽说:“地震下岗后,没有职业,开了一家化妆品店。开始的时候资金周转不灵,2008年劳动保障部门提供了一笔2万元的贷款。有了这个贷款后,周转就灵活了,生意也慢慢大了,一年能挣10多万元。去年还完贷款以后,又继续给我5万元的贷款。政府对我们这么大的支持,感谢政府”。

现在城关镇钟楼滩社区劳动保障站工作的关大山说,我以前是零就业家庭,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人有稳定的收入,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5·12”地震还造成住房受损,好在国家给了我们每一户6000元的维护资金,所以我们基本上自己没花钱就把受损的房子修好了。地震之后,我了解到国家对像我这样的零就业家庭有扶持政策,于是向区劳动保障局写了申请,把我的情况实实在在向他们作了反映。区劳动保障局的领导非常重视,到我家实地了解情况后,安排我进入了社区劳动保障站工作。现在我每个月有800多元的工资,收入虽然少但是比较稳定,心里感觉还是踏实了许多。我非常感谢区劳动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非常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是这个好政策的的确的受益者!

(作者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

金塔县方言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积淀和地域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金塔县方言(以金塔县金塔镇音系为基本方言),属中国汉语系西北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兰银官话河西片音系,和普通话语法结构相同,语音稍有差别,词汇差异较大,文白腔调声韵大体一致,发音短促低沉。金塔县境内,语音大体可划分为5个方言板块。东坝片(东坝镇、大庄子乡、三合乡)略同于酒泉市区口语,西坝片(中东镇、古城乡、西坝乡)发音带“郎lan g”声。鼎新片(鼎新镇、航天镇)接近于张掖市口语。主要是有些单词声母“知zh、蚩ch、诗sh”发音时变为“哥g、科k、佛f”。韵母“哀ai”和“耶ie”颠倒使用。羊井子湾乡居民全系移民,操原籍方言。

语 音

金塔县方言和普通话接近,有一些字读音和普通话有差异,主要是声母、韵母有变音。

金塔县语音共有23个声母。其中:22个为辅音声母;一个为零声母。与普通话相比,多了一个齿唇浊擦音声母[v]。凡金塔县语音中齿唇浊擦音[v]作声母的音节,在普通话中全读作零声母[u]起头的音,如:文[vn41]、窝[vo44]、外[vε24]、味[vei24]等。和普通话比较,声母“知zh、蚩ch、诗sh”变为“资z、雌c、思s”;声母“讷n”和“勒l”大多不分。鼎新片(鼎新镇、航天镇)把声母“知zh、蚩ch、诗sh”变为“哥g、科k、佛f”。

金塔县语音的韵母有32个,与普通话相比少了七个。在金塔县语音中,前鼻音[n]和后鼻音[ʔ ㄤ]相混,前鼻韵母en[ʔ ㄤn]、in[in]、u en[uʔ ㄤn]、ü n[yn]和后鼻音韵母en g[ʔ ㄤʔ ㄤ]、j ng[iʔ ㄤ]、on g[uʔ ㄤ]、ion g[yʔ ㄤ]相混,多读作后鼻音韵母。如金塔县语音中“分”和“风”、“人”和“仍”、“贫”和“平”、“民”和“明”、“温”和“翁”、“轮”和“龙”、“晕”和“拥”等相混。东坝片(东坝镇、大庄子乡、三合乡)韵母“哀ai”和“鹅e”颠倒使用,鼎新片(鼎新镇、航天镇)韵母“哀ai”和“耶ie”颠倒使用。

普通话有四个调类,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普通话相比,金塔县语音只有三个调类,即阴平、上声、去声,较普通话缺乏轻盈、委婉、抑扬之感,特别是声调单调、平板、低沉生硬,高扬转降

金塔方言浅释

桂发荣

的变化不显著。金塔县语音的调值,和普通话的调值差别较大。普通话的阴平为高平调55,阳平为中升调35,上声为降升调214,去声为全降调51。金塔语音的阴平为半高平调44,上声为半高降调41,去声为半低升调24。古入声字在普通话中分别归入了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而金塔县语音中则分别归入了阳平和去声。古入声清音和次浊声母字在金塔县语音中读去声,调值是24,全浊声母字在金塔县语音中读阳平,调值是41。

方言小区

东坝片:“白”普通话读bái,方言读bé;“迟”普通话读chí,方言读cǐ;“生”普通话读shēng,方言读sēng;“街”普通话读jiē,方言读gāi;“脚”普通话读jiǎo,方言读juè;“麦”普通话读mài,方言读mè;“鞋”普通话读xié,方言读há;“杏”普通话读xìng,方言读hèn;“志”普通话读zhì,方言读zǐ。

西坝片:“拿”普通话读ná,方言读lá;“奶”普通话读nǎi,方言读lǎi;“两”普通话读liǎng,方言读niǎng;“内”普通话读nèi,方言读lèi;“女”普通话读nǚ,方言读lǚ;“柳”普通话读liǔ,方言读niǔ。

鼎新片:“白”普通话读bái,方言读bié;“掰”普通话读bāi,方言读bié;“创”普通话读chuàng,方言读kuàng;“麦”普通话读mài,方言读miè;“熟”普通话读shú,方言读fù;“双”普通话读shuāng,方言读fāng;“种”普通话读zhǒng,方言读gòng;“勺”普通话读sháo,方言读fè;“死”普通话读sǐ,方言读

sh ĭ ;“瓜”普通话读 zhu ǎ ,方言读 g u ǎ 。

语 法

金塔县方言和普通话相比,语法差别不大,差异细微。现摘录数例:

“娃子”做词尾,构成表示小,表示喜欢的词。

例:女婿娃子——女婿。

“开”、“打”做语助词,放在动词之后,可以构成表示时间的名词性词组,含有假设意。

例:种开(打)麦子把化肥一手溜上。煮开(打)羊肉了放上些姜皮子。

动词也可以带宾语。

例:干开(打)活了细点。

金塔方言中的量词有“个”化的特点。

例:“一个牛”、“一个耳朵”等。

动量词可以用“个”代替。例:“发了个言”等。

对话句子中主语和宾语倒置。

例:牛我喂上了。——我把牛喂过了。作业我写完了。——我写完了作业。

动词加“哩”、动词加“的”重叠,表示动作的连续。

例:坐的坐的睡着哩。说哩说哩哭啥呢。可用“着哩”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中。

例:树长着哩。——树在长。

“带”用在第一个动词谓语之前,表示行为的附带性。

例:带放牛着割上些草。

“咋”做补语。表示动作有连续性。

例:菜咋得个,你尝咋。你把土打咋。

形容词做谓语,要对形容词谓语给予修饰限定。普通话多用状语的形式来处理,而金塔方言中多用补语的形式处理。

例:丫头俊得歹——姑娘很漂亮。房子高得歹——房子很高。瓜甜得歹——瓜很甜。

金塔方言中形容词的形式非常丰富。

例:“红”,就有红的、红红的,红艳艳、红堂堂、红丢丢、红拉拉、红溜溜、红赤赤等多种说法。

词 汇

金塔县方言(以金塔镇音系为基本方言),保留了不少古词语,与普通话词语相比,词形不同而

意义相同的词汇较多。现摘录部分。

名 词

挑担:民间两婿俗称。

恶索:垃圾的别称。

垢痂:泥垢,污垢。

磨道:磨面房。

铺衬:做鞋用的旧布片。

骚胡:公山羊。

套簧:驴拉石磨时所用的工具。

伢猪:公猪。

撩襟:衣服前襟。

街门:院子门。

动 词

啞:吸。例:啞奶。

喋:吃。例:一顿喋了五个馍馍。

啖:吃。例:瓜子儿是啖嘴的。

糜:1.系上,接上。例:把断绳子糜上。

2.拴住。例:把驴糜到地埂上。

挈:拿、举、扛。例:挈口袋。

刁空:抽空儿。

搁络:和别人相处,搞好关系。

经侑:喂养牲畜。

拉拔:抚养。例:把娃娃们拉拔大了。

撕挖:拉住、拉拉扯扯。

形 容 词

砣码:厉害,声势大。

干散:精干漂亮。

暮囊:行动迟缓。

肚子胀:生气,互相闹矛盾。

急挖:心里着急,骚动不安。

没治:太差劲,没办法。

握也:井井有条,妥当,好。

停当:妥当,顺当。

麻利:利索,动手快。

没意打思:不好意思。

代 词

那们:傍指代词的复数。

这些:近指指示代词。

人家:傍指别人;指自己,相当于“我”。例:你把人家的书弄脏了。

多大:什么时候。

(下转第 80 页)

兰州市地方志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台

2011年8月1日,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印发《关于兰州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1—2015)的通知》(兰政办发〔2011〕212号),要求各县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县区、部门、单位实施本规划的计划 and 措施,力争在“十二五”时期使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为指导和促进兰州市地方志事业未来五年的科学发展,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编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要求,结合兰州市地方志工作的发展实际,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大量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划。

规划的编制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二是与时俱进、力求发展的原则;三是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原则。规划编制还注意了与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划的衔接。为制定好“十二五”发展规划,兰州市地方志经过深入实际、多方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兰州市地方志科学发展的规划,该规划以服务兰州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题,以“资政、育人、存史、服务”为目标,坚持思想性、系统性、资料性相结合的科学体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衔接体系,坚持编修本级志鉴与方志丛书相结合的志鉴体系,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志鉴发展框架。

“十一五”规划期间,兰州市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史志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1355”发展思路和国家、省上有关地方志发展的要求,以创新精神和求实作风,努力

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县区两级地方志工作队伍基本稳定。二是地方志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三是地方志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四是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成果显著。“十一五”期间完成了《兰州年鉴》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七里河年鉴》编辑出版3卷;《兰州通志》完成编纂、初审和复审工作;第二轮《永登县志》、《皋兰县志》、《西固区志》、《城关区志》完成编纂任务,其中《皋兰县志》、《西固区志》已出版发行。同时,各县区编写、出版、发行了《兰州史话》、《皋兰史话》、《永登史话》、《榆中史话》和《城关史话》,编辑出版了《永登人物传略》、《皋兰人物传略》和《榆中人物传略》。据统计,全市地方志共编纂出版各类图书47种。五是对兰州文化的宣传进一步广泛深入。积极参与兰州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提供了17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5000多幅图片资料和14套影像资料,参与策划拍摄了有关历史文化的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9种47集,其中3种12集被中央电视台播放,对于宣传兰州、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建设文化兰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六是市、县区两级地方志机构办公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地方志工作,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要求,推进依法修志,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改进方法,高质量、多形式、宽领域地为兰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服务,为实施“再造兰州”战略,实现率先跨越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十二五”规划总体任务是全面完成全市第二轮两级志书的编纂、审定和出版任务；继续开展《兰州年鉴》编辑工作，启动县区级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完成《兰州大辞典》的编纂、审定和出版；积极开展旧志整理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积极推进兰州方志馆和兰州方志网的建设，为全社会提供网络化、数字化服务。

“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一是《兰州通志》完成终审、修改、出版、发行工作。二是积极推进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兰州新区开展地方志工作。三是《兰州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要实现规范化、法制化，努力做好发行、宣传、使用工作，促进各县区政府启动县区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四是《兰州大辞典》完成编纂出版和发行工作。五是首轮《兰州市志》原定70卷（73册），后调整为59卷（册），一些重要的专志被撤并。为了保证《兰州市志》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十二五”期间要重新启动编纂已撤并的11卷专志，例如《人口志》、《轻纺工业志》、《政权志》、《政党志》等。六是积极推进兰州方志馆建设，使其成为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向专家学者提供研究所需基础

性资料的重要文化设施，积极推进兰州方志网建设，向社会提供网络化、数字化的咨询服务。七是整理、校注、出版《重修皋兰县志》等兰州珍贵的历史文献，编写出版《兰州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10册、第三辑10册，尽最大可能发挥地方志事业的社会效应。八是大力开展地方志专兼职人员的培训工作，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市、县区两级专职地方志工作人员需重新调配充实，所需兼职修志人员要通过多种途径发展和培养，建立健全地方综合年鉴通讯员制度，确保史志、年鉴资料的报送、收集渠道畅通。

“十二五”期间，兰州市地方志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要实现发展目标，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二是努力强化依法修志，着力营造编修氛围；三是加大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财力投入，确保各项目标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四是加快史志工作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修志人员素质。全市地方志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工作责任感，统一思想，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共同推进兰州市地方志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杜勇利）

（上接第78页） 那些呢：远指指示代词。

量词

桃：用于线之类。例：一桃子蓝线。

苗：根。例：一苗绣花针。

躔：遍，次。例：米淘了两躔。

疙瘩：用于块状东西。例：一疙瘩铁。

圪截：段、截、节。例：一圪截松木。

轱辘：圆形的一段。例：一轱辘榆木。

副词

光：净，只是。表范围。例：光玩不学习。

慌：很，厉害。表程度。例：清早上冷的慌。

临完：终了，例：先割麦子，临完了再拾麦穗。

表时间。

委实：确实。表肯定。委实把人冷的发抖。

行火：表示较高程度的副词。例：雨下行火了。

着实：很，非常。表程度。例：着实唱的好听。

到竟：到底，究竟。语气副词。

本当：本来应当。表肯定。

一搭里：一块儿。表范围。

介词、连词

问：向，朝，介词。例：问他借钱。

打：从，介词。自从。例：一打上次来再没去过。

虽说：连词，虽然。

（作者系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2011年全省修志人员培训班 在广西师范大学举办



开班典礼

为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高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2011年甘肃省修志人员培训班于9月17-26日在广西桂林市举办。全省部分市（州）、县（市、区）志办以及有关单位的史志、年鉴编纂人员，省直修志单位负责人、业务骨干，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有关人员共134人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班是全省二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后，由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协调在省外高校举办的第三次专业培训。这次培训时间长、规模大、规格高、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学员们一致认为，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思路，明确了方向，提高了修志业务理论素养，增强了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掌握了修志业务的知识，提高了修志业务的水平，为培养修志业务骨干，在全省建立一支高素质修志人才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甘肃省史志办领导为培训班题词



学员认真听讲

李德奎

摄影作品赏析



玛曲湿地



加油



和睦